中共50年

作者：王明

目录

跋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丛书信息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共 8 册), 这套丛书还有《郑超麟回忆录（上下卷）（现代稀见史料书系）》,《我的回忆（上下卷）（现代稀见史料书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内部发行）》,《中国纪事》,《双山回忆录（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等。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03-01

印刷时间： 2004-03-01

页数： 298

印张：

开本： 32 开

装定： 平装

印量：

原价： 30.00 元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2004-01-01

册数：8

简介 ? ? ? ? ? ?

东方出版社 2004

按收藏人数排序 / 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序

延安日记

译者： 吕文镜

作者： （苏）彼得.弗拉基米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0001-1-1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弗拉基米夫，苏联人。1942 年至 1945 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我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同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我党的整风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党同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苦笑录》

作者： 陈公博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0001-1-1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苦笑录》，作者陈公博，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脱党。参与汪精卫汉奸政权，1944 年 11 月汪精卫死后，任"南京政府"代主席。本书记述其 1925-1936 年的经历，叙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本书写成后，陈公博"知道出版是无期的"，其家属将原稿赠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封存。后由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

中共 50 年（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译者： 徐小英

作者： 王明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3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中共 50 年》，作者王明，又名陈绍禹，中共早期领导人。1925 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取得领导权。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建国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主任。1956 年去苏联。本书是王明去苏联以后坚持其反动立场，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而撰写的。通过此书，人们可以认识真实的王明。

《我的回忆》

我的回忆（上下卷）（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作者： 张国焘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4-01

郑超麟回忆录（上下卷）（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作者： 郑超麟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0001-1-1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作者郑超麟，早年参加中共，1923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上海地委委员、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9 年因参加党内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他是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前被蒋介石政权两次逮捕，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监禁。1979 年出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本书回忆录部分写于 1945 年；《陈独秀与托派》写于 1980 年。本书对中共早期领导人及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亲历资料。

双山回忆录（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作者： 王凡西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3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双山回忆录》，作者王凡西，早年参加中共，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1930 年被开除出党。作者在 20 年代中期留学苏联时，即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9 年被遣送回国后，又从事党内反对派组织活动。作者毕生认为，苏共早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真理在托洛茨基一边；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残酷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模式的破产，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应该将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中国纪事

译者： 李逵六

作者： [德]奥托?布劳恩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0001-1-1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中国纪事》，作者奥托?布劳恩，1932 年由苏联来我国，中国名字叫李德、华夫。在中国期间，他积极推选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1939 年回苏联，后回民主德国。本书主要记述 1932-1939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况，均有所评述。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内部发行）

译者： 奚博铨

作者： [美]盛岳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0001-1-1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作者盛岳，原名盛忠亮，又名伐樵，1923 年至 1926 年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宣传部秘书。1926 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1934 年回国，被捕后叛变，进入中统当了特务。全国大陆解放后逃往海外。这是盛忠亮用记述亲身经历的形式，搜集大量有关资料写成的研究性的回忆录。本书对莫斯科中山大学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对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中共党内托洛茨基的形成等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

出版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社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主要有《中共50年》(译者： 徐小英作者：王明)《我的回忆》(上下卷 作者： 张国焘)、《双山回忆录》(作者： 王凡西)、《中国纪事》(译者： 李逵六作者： [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华夫)、《郑超麟回忆录》(上下卷 作者：郑超麟)、《延安日记 》(译者： 吕文镜作者： （苏）彼得.弗拉基米)《苦笑录》(作者： 陈公博)，《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内部发行）》 等等，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内部)，有控制范围地供有关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考，对现代史和党史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不少专家反映，这些人的回忆录，虽然囿于其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及当时的历史原因，都有不少歪曲史实、吹嘘自己、攻击他人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闻、亲见，可以使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把握和认识的复杂性，使研究者更加深入细致地去考察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由于以上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

《中共50年》是其中一种。(本书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是叛徒王明把他自己从1971年至1974年所写的几篇东西拼凑而成的。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污蔑，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供研究者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通过本书，人们可以认识真正的王明。

这个译本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俄文版译成的。书中脚注凡未注明“译注”者均为作者原注。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徐小英、王淑秋、李冬生、张鼎芬和戴世吉。

东方出版社

二00四年三月

前言

东方出版社为适应广大领导干部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人员的需要，将出版《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包括《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延安日记)([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纪事)([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华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美]盛岳)、《苦笑录》(陈公博)、《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中共 50 年)(王明)。这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我们党历来重视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学习、研究与教育。这不仅要通过正面的、写得比较好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出版物来获得，也需要通过那些即使写得不好、甚至对历史有所歪曲，但毕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那些有影响的出版物来了解。

有比较才有鉴别。要认识历史的真实和科学的真理，需要多渠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反面教员的作用，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史料编刊社曾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其中就有上述著作。人们俗称为“灰皮书”。

上述著作，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当时的历史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不少吹嘘自己、低毁他人、曲解史实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闻、亲见，只要通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3 就能够去伪存真，剔芜取菁，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更加深入地去考察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纠正或补充若干历史细节。这些年来，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文献与人物的研究者，很重视这些“灰皮书”提及的若干重要史实。在经过分析研究和考证辨伪后，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重要著作涉及的某个事情的论据，因而加以采用。就我所知，这套“灰皮书”出版 20 多年来，还未听说有不赞成在有控制的范围内出版它的，也未见到它有什么不良反映。

历吏又过去 20 多年了，一代新人已成长起来。许多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一批青年学子也在从事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何况我们面临的 21 世纪，对历史文化信息的需求显著增加，学术界对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已大大深入。许多方面都迫切需要这一类书作为参考资料。面对图书市场的这种需求，东方出版社推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实为应时之举。我祝愿新的“灰皮书”的出版获得成功，并希望进一步解放思想，组织有关力量，出版更多有价值的“稀见”书系。

石仲泉

2003 年 8 月 10 日

作者的话

本书第一编《中国共产党 50 年》和第二编《“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是 1971 年为中国共产党 50 周年而写的一篇长文的两个部分。第三编《“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于是年秋完稿，目的在于揭露毛美关系“突然转变”的内幕。遗憾的是，由于作者病情恶化，所有这些手稿当时都没有定稿。后来，一俟健康稍有好转，作者便继续修订手稿。第四编《“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于 1974 年初完稿。

把这四份手稿汇编成一本书，是符合事件发展的逻辑的。

大家知道，毛泽东成为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叛徒，绝非偶然，这是他长期以来一贯进行罪恶勾当的结果。在注定他蜕化变质的那些事件的链条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前半期进行的反动的“整风运动”，以及六十年代后半期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以变换了的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毛泽东正是由于完成了反革命政变，才成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和反动势力的宠臣，而在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人、全体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运动的角度来看，他是可耻的叛徒。连他自己也感到他处于完全孤独的境地，因为，甚至他过去那些最亲密的追随者也离弃了他。这就使他不得不于 1971 年春送别斯诺时痛苦地承认，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为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而写的。其中考察了以下一些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成了“孤僧”；毛的十大关于内外政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为什么吹捧秦始皇、攻击孔子和滥用鲁迅的名义；毛泽东在“批林批孔”幌子下发动第二次“文化革命”。

最后，作者相信，“孤僧”的命运只能是“彻底、干净和全部”①失败。这种前途无需论证，因为它已由历史注定。中国共产党人、全体中国人民一定会摆脱毛泽东的反动统治，建设自己光辉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并永远掌握中国的命运。这个结论是从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得出的。

1974 年 3 月 23 日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 50 年

1971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五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马克思殆宁主义的政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苏联共产党的全面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斗争，这一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困难和英勇的，是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是合法的和非法的。

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激烈斗争中，在非常残酷的白色恐怖和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的条件下，成长出了无数杰出的战士和民族英雄，其中许多人为党和革命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①

党成立后不久，在反对北洋军阀悠意横行的京汉铁路“二七”(1923 年)大罢工期间，罢工者和他们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所固有的那种大无畏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例如京汉路铁路工人工会主席林样谦，当敌人砍断他的左臂，威释势下令复工时，他声言：“头可断，工不可复里”林祥谦英勇地牺牲了。维护罢工工人权利的施洋律师同样宁死不屈。

1925---1927 年革命时期，在举世闻名的“五卅”反帝运动中英勇牺牲的有：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领导人顾正红，上海大学学生示威游行和有五十万工人参加的上海总罢工的组织者何秉彝，上海总工会主席刘华。①

在同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有：《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一名著的作者、万县反帝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著名经济学家漆树芬；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罗亦农和赵世炎；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党内第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之一、党的卓越的领导人李大钊；著名团长蒋先云，他这个团的大多数战士是共产党员，这个团经过英勇冲杀攻占了由奉系军阀重兵驻守的郑州要塞；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郭亮；妇女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汉口市委书记、党中央委员向警予；深乎众望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五四运动”(1919 年)的领导人之一肖楚女；1921 年的共产党员马骏，他初期搞回民工作，后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被捕并牺牲；广州起义主要的军政领导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党中央委员张太雷，以及其他许多同志。

在 1928-1937 年土地革命和局部抗战时期：1925-1926 年省港大罢工的著名领导人苏兆征被选为(广州起义时)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②他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长期积劳而病故；张昆弟(广东省委书记)和王兰英(音译，广东省委妇女部部长)矢瘫勇就义；由于叛徒告密而英勇牺牲的有：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和着港天罢工的组织者、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肃反斗争的负责人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江西省委书记张国庶和他的妻子、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晏碧芬；“立三路线”时期，数百名党的优秀军政干部被派往各大中城市组织起义而英勇牺牲了，他们当中有吴振鹏、毛春芬、刘云、陈其科、贺昆墉、王步文、陈德征、胡静斋、童日昌、王赤平、林承萃、唐玉昆江人运动的著名领导夫‘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中国共青团的领导人林育南和李求

实；文艺界党的工作者、著名文学家胡也频和柔石；年轻但很有名望的中国无产阶级诗人殷夫；著名的党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组织者、党中央委员挥代英幸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二军政治委员鲁易；中共广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壮族妇女运动领导人莫凭栏；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童长荣和伯阳；满洲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何思美；参加吴淞抗日战争、上海工人义勇军部队指挥员傅维玉和他的副手孙小宝；中国工会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二七"大罢工(1923 年)和省港大罢工(1925-1926 年)的著名组织者、党中央委员邓中夏；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华全国工会委员会主席陈原道；江苏省委书记翻上海市委书记黄励；苏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副书记、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沈泽民；反"立三路线"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天才的群众组织者何子述；红五军团军团长赵博生；察绥抗日同盟军二军军长、察绥抗日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人吉鸿昌；中国第一位无产阶级作曲家聂耳；苏区中共中央湘鄂西地区分局书记夏曦；党的著名领导人和文学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瞿秋白；中共一大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局局长何叔衡；中共中央特科(保卫科)行动队领导人钟云(音译)，他在同叛徒和敌特的英勇斗争中屡立战功；潜人敌特机关进行反间谍活动并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钱壮飞；赣东北苏区创始人、红十军军长方志敏；红七军军长寻淮洲；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红五军团政治部丰任刘伯坚；狭北苏区创始人、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秀第五军团军团长、红军西路军的代总指挥董振堂；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殷鉴和其他许多同志。

1937-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中国工人运动和党的著名领导人、新四军副军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新四军著名的支队长罗炳辉与彭雪枫①；广东省委书记、红军老战士张文彬；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部部长陈潭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兼军长杨靖宇；第三军副总司令兼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柴世洪；抗日女英雄、团政委赵一曼和其他同志。

在 1946-1949 年暂时和平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同志中，1946 年牺牲的有：党的著名领导人秦邦宪(博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央委员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他们于 4 月 8 日同一天逝世;；1947 年牺牲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朱瑞和其他同志；1949 年牺牲的有：四川省委领导人和四川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著名活动家罗世文和车耀先，以及其他许多同志。

’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志，只是为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献出了生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代表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还有许多苏联的国际主义战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在革命岗位上的全体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二十八年英勇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锤炼出了数百万党和非党的革命战士，造就出了数以千计的党的领导核心和骨干。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当时就能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大军的、人数众多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数亿中国人民，在苏联的全面支援下胜利地完成了中国革命，不仅解决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务，而且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下的壮丽篇章，这就是对世界革命

运动的辉煌贡献。

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以列宁式的国际主义者为先锋的苏共中央的支援下，彻底战胜了各种类型的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因而克服了困难和障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27 年夏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1928 年春夏克服了中共中央十一月(1927 年)全会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29 年秋粉碎了托陈取消派；1930-193‘年战胜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罗章龙反革命派别活动。极其重要的是在各个时期，特别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同毛泽东的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反党、反苏和反人民的路线及政治方针进行了长期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只是因为这样，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且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同时必须指出，列宁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战胜了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这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方面。历史真相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比如，毛泽东在 1935 年于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篡夺了党的军权，在这以后，他就使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在四十年代的前五年，毛泽东开展了反动的“整风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方面都遭受了从未有过的严+重损失。在 1949 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偷换了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毛泽东通过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冒险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把中国引上了政治反动和经济崩溃的道路。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沦于贫困状态。毛泽东的内外政策，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建立在反苏反共的基础上，最终导致了他打着“文化革命”旗号而完成的反革命政变。这一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灾难，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反帝斗争以及和平运动遭到了严董的损失。①

最近三十年来，即从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部加以歪曲、颠倒和伪造。1971 年 7 月 1 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牢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就是根据毛泽东的个人指示撰写的。这是一篇新的、集谎言和诽谤之大成的社论，是对中共历史的进一步伪造，是沿着反苏反共和吹捧毛泽东的道路前进的新的一步。只有恬不知耻的人才能发表如此荒谬而不成体统的文章。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只字未提牺牲的革命英雄。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叛徒不愿意，而且从道义上说也没有资格悼念英雄。

毛伪造中共历史的基本内容是，竭力把列宁主义思想和列宁主义路线在中国的胜利，说成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的斗争史，以及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在苏共与苏联帮助下取得的光辉胜利，被他描绘成他个人事业的历史。他本人那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政策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把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推到别人头上，而且还不断伪造“罪行”，好像这些“罪行”是党内他的那些政敌犯的。毛泽东力图用这类方法来抬高自己、贬低并污辱别人。毛泽东千方百计并经常伪造中共历史的目的在于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和反苏，在于用反革命的毛泽东主义来偷换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于神化他个人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他就利用这种权力在国内制造背叛党、背叛国家和背叛人民的暴行，在国际舞台上则

采取可耻的行动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为讨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反动派捞取“资本”。从 1966 年起，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烟幕的掩盖下完成了反革命政变。近年来，他公开走上了民族叛徒的道路，竭力同帝国主义势力接近并合作。这样，他的真面目尽管处心积虑地加以掩饰，仍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为了弄清毛泽东如此堕落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必须更详尽地探讨他的背叛行为的历史根源，这些根源同当时的事件，即他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正像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表明的，“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清楚地了解了这个运动，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文化革命”。

第二编 “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

毛泽东于 1941 年夏末到秋初利用德国侵略者进攻苏联和苏联军队的暂时失利所形成的国际局势，以及当时他在中共中央内部所能拥有的相对优势的力量，依靠由他这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亲自管辖的中共中央警卫团，开展了一场从 1938 年秋就在秘密筹备的“整风运动”。

运动从 1941 年秋到 1945 年夏一共进行了四年。这四年可分为五个时期：

1.“整风运动”的准备(1941 年 9 月一 1942 年 2 月)；

2.“整风运动”(1942 年 2 月一 1943 年 7 月)；

3:“抢救时期”(1943 年 7 月一 1944 年夏)；

4:“翻案和恢复名誉时期”(1944 年夏一 1945 年春)；

5.“总结时期”(1945 年春一 1945 年夏)。

第一章 第一个时期——“整风运动”的准备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采取了以下一些准备措施。

第一节 通过阴谋活动和强制手段停止发行延安党的所有报刊

这些报刊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共中央杂志《解放》和《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妇女工作的杂志《中国妇女》，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青年工作的杂志《中国青年》，党中央的文艺杂志《中国文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刊物的编辑工作是由王明、洛甫①和凯丰领导的。继续出版的只有毛泽东直接控制的《八路军杂志》。②此外还创办了一份新的日报《解放日报》，这也是由毛泽东掌握的。

第二节 解散学校

毛泽东把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转移到了晋察冀边区，强行解散了延安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因为他害怕在其中学习的革命青年反对“整风运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名义上继续存在，实际上那里集中了许多干部准备进行“整风运动”。

第三节 提出毛泽东主义同列宁主义相对抗

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决定出版了《马恩列斯论中国》的文集(其中包括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文件及其他文件)和初名《六大以来》后改名为《两条路线》①的第二个文集(其中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文件和若干党的领导人一除了毛泽东还有王明、博古和洛甫的著作)。这都被用于完全特定的目的：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提出一个命题，似乎“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所有其他的文件和著作都是错误的”。

从 1941 年 9 月起，毛泽东在同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个别谈话中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此类谈话，毛泽东同我进行过多次，其中有一次是这样进行的：

“王明同志，我想建立毛泽东主义。你看怎么样？”

“这是为什么？”

“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以被别人推翻，而在死后他甚至会受到攻击。如果有了‘主义’，情况就不同了。你看，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分裂成了许多派别，但谁都不敢出来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和联共(布)党内也有不少组织和派别，可是谁都没有出来公开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国民党内尽管一团混乱、派别林立，可谁都不敢出来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如果我不建立自己的‘主义’，即使党的七大选举我当了党中央主席，人们也可以把我推翻。”

我反驳说：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好像只要有了自己的‘主义’，就可以不被推翻。如果‘主义’不正确，实际上会垮得更快。无论托洛茨基还是陈独秀都有自己的‘主义’，难道他们俩人没有被推翻？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样，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去建立什么‘主义’呢？”

“在建立毛泽东主义时，我保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继续说。——我抛弃的只是列宁主义。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这样的：列宁主义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

我企图解释说：

“你的论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否认列宁主义，这是第二国际领袖们和资产阶级大学者们蓄意玩弄的花招，这些人实际上既不承认列宁主义，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列宁主义是新时代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既然你谈到了这

样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诚恳地对你说：你这样提出问题，不仅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带来危害，即使对你个人也不会有利。请你再三并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建立什么‘毛泽东主义’。”

“但是，这怎么行呢？”他坚持说。“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义’，他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

“那你有哪些著作可以作为‘毛泽东主义’的基础呢？”我问。

“怎么这样说呢？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基础理论著作。1939 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就考虑到这一点了。不过在当时还不能公开讲，现在可以了。”

于是我对他这样说：

“你还记得，当你把《新民主主义论》的草稿交给政治局的几位同志看的时候，我同你谈过两次话，并就这一著作的名称和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我向你表明，你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

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除了这些谈话，我还给你写过一封信，我在信里指出，你的这一著作可以被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利用来反对联共(布)，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你必须考虑如何修改这一著作。你虽然也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但基本原则仍然未动。现在我诚恳地告诉你：如果你用‘新民主主义’来对抗列宁主义，你就一定会遭到失败。因此我劝你丢掉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想法，并严肃地考虑一下修改自己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问题……”

据我所知，毛泽东还和任弼时谈过这个问题，同样也受到了批评。可是毛泽东没有听取同志们的衷心劝告，在“整风运动”

中公开宣布了“毛泽东主义”，并进行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

第四节 伪造遵义会议的历史

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修改”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的决议。而且他坚持要这样来修

改，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是犯了个别的理论错误，而是制定了一条错误的党的政治路线。这就可以肯定中央全会的决议是“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决议从而不仅加剧了对博古和其他同志的攻击，而且为宣传遵义会议的“特殊作用”打下了基础。此外，毛泽东打算捏造一种说法，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似乎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遵义会议上据说受到了批判。其实，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并没有人反对，因为它反对的是立三路线，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建议。在这以后，毛泽东就有意地把他所捏造的四中全会的路线，同所谓的五中全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办法来证明他关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说法是正确的。可见，他已为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攻击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打下了基础，并为把遵义会议的“特殊历史作用”以及他本人在这次会上和今后的特殊功绩这种说法固定下来，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根据毛泽东的密谋于 193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需要这次会议是为了篡夺党的军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首先在于，遵义会议以后，他完全抛弃了红军关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战略口号。其实，这个口号不仅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可以得到地方实派的部队、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同情。同时，毛泽东还废除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口号。提出这一口号是为了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不抗日，并企图消灭红军和省里各个派系的军队)的基础上，同地方上的各个军政派系结成联盟。

毛泽东忽视红军的正面经验(1933 年末到 1934 年初在福建时，蒋介石的第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共同抗日反蒋的协定；此外，在西征初期，红军经过两广时，没有遭受地方势力的袭击，甚至还接到了留在当地的建议)，提出了“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①的口号。结果，云贵川的各个军事集团不得不同蒋介石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共产党人。毛泽东既不懂战略、又不懂策略，并企图实行反对“一切”的极“左”的机会主义方针，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种双重错误，使红军遭到了蒋介石和地方上各派系的联合部队的攻击。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从以下两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极左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特定涵义。这两个事实是陈云①在《英勇的西征》②一文中由于不谨慎而透露出来的。其一是上面已经提过的、毛泽东在贵州提出的“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的口号。③其二是毫无根据地判处了一百多人的死刑。这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在云南省一个县里执行的。正像陈云所证明的，该县县长错误地把红军当成了蒋介石的部队，便大开城门欢迎，作者写道：“我们红军也就将错就错，没有立即说明这不是南京军队。我们略事休息之后，即问他们：‘你们给本军办好了粮食军饷没有？’他答应说：‘都办好了。’我们盼咐要十个本地人作向导。旋即有本城各机关要人来拜访，各人忙着通报姓名官衔：‘鄙人现任警备队长’，‘鄙人现任警察局长’，‘鄙人就是县长’等等。既然他们自己道出了来历，我们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一切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已成功了’。这话真是不错。”④　　这里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当时陈云认为毛泽东做的这两件事都是对的，所以才写了下来。文章发表前，陈云给我看了手稿。我看后劝他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声誉而就上述两点作若干修改。他同意了。对第一处，他去掉了“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

等夸张的句子，只保留了“生擒王家烈”一句。对第二点，他作了三处修改。第一，他把具体的县名改成“某县”。第二，陈云把来访的有知名人士(绅士)、商界代表和县城的其他居民，以及附近乡村的绅耆和其他代表共一百余人‘句改写成“几个人”。

第三，他把“毛泽东同志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下令把他们都条掉了”一句，换成像上面所引的那样：“我们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了。”

陈云写道，毛泽东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非常满意。这表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不明智，他不懂得他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后果。显然，红军领导应当利用面临的情况向这个县的官员、绅士和广大公众说明红军路过云南北上的真实意图。应当向他们讲清楚，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而红军不得不同蒋介石作斗争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反而进攻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红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与这些省的地方当局和人民为敌。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些人同各省的领导人通消息，在这些省和县的老百姓中宣传红军的政策，减少红军前进途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使地方当局不把蒋介石视为他们可能的同盟者。

由于毛泽东犯了这样两个不可容许的错误，贵州和云南，还有四川和西康这些省的地方当局和老百姓对红军都极不信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就轻而易举地把地方当局吸引到了自己一边，利用它们来共同反对共产党人。这对红军就造成了不科条件，招致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

当时，陈云是支持毛泽东的。他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是想从好的方面来介绍毛泽东。因此，这篇文章的若干地方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夸张之处。而且，这篇文章，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成了值得注意的历史文件。如果拿这篇文章中所叙述的、红军从开始西征到抵达遵义以前这段时间的实际情况，同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时所捏造的遵义会议的历史相对照，那就不难看出其中有着根本的原则差别。陈云的文章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反映了当时的事态。毛泽东的说法则纯系捏造。因此，陈云的文章毕竟是驳斥毛泽东的谰言的相当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算还在于，遵义会议以后，他没有执行共产国际领导上制定的正确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央苏区的红军应当保存有生力量，完成西征，进人辽阔、富庶和人烟稠密的四川省，同已在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一起开辟新的、大规模的苏区根据地，并补充红军队伍。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红一、三、五军团，无目的地时而转移到贵州，时而转移到云南，轻率地同敌人交战。其实，他们应该避免发生战斗并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从江西长征到四川的重要任务。共产国际领导上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电报指出，这个目的比根据地更重要，因为只有保存了红军的实力，才能在到达四川后迅速开辟新的、更加辽阔的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以前，博古、周恩来等人正是从共产国际领导上制定的这一正确方针出发，才避免了同蒋介石部队进行不必要的战斗；他们向地方上的各个派系说明了“抗日反蒋”这个口号的重要性，从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向前行进。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红军全体成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为红军必须在四川开辟大规模的新苏区，并准备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攻击共产国际的正确方针，认定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

策略，是“不愿进行战斗”等等。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制定的这条红军西征的政治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那条政治和军事路线则是错误的。正是这种情况，使红一、三、五军团遭受了可以避免的沉重损失。

中央苏区红军的主力于 1934 年 10 月 16 日开始西征。这支主力总共约八万人。到 1935 年 1 月初(遵义会议前夕)，即行军两个半月以后，剩下将近四万八千名战士；可见，损失约达三万二千人。根据博古(1938 年在汉口)邓发、王稼祥①(1936 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同志在不同时间所讲的情况，部队减员不是由于战斗，而首先是因为逃跑了近三万人，这些人是在近几个月中入伍的。遵义会议以前，战斗次数并不多，因为在沿两广边境行进时，没有必要投人战斗。蒋介石到 10 月 24 日才知道红军主力撤离并匆忙派部队追赶。但由于他不知道红军的运动方向，而他又不能进入两广境内，他的部队只能间或同红军接火。红军的后勤部队甚至还带着比较笨重的兵工厂的设备，印刷机，印制货币的机器等等。到达遵义后，红军停下来休息了十二天；其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敌人方面的抵抗和追击，并不特别激烈。

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在毛泽东指挥下所采取的种种轻率的军事行动和转移，部队人数在两星期内就从四万八千人减至两万两千人，也就是说，损失了两万六千人。

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叛变行为还在于，他两次——一次在阿坝(1935 年 6 月)，一次在毛尔盖(1935 年 9 月）——在党内和红军内部制造分裂，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在阿坝几乎就要造成分裂的种种事件是这样展开的：

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和结束了西征的红一、三、五军团，会师阿坝(四川省)。红四方面军的成员共十万余人，而红一、三、五军团只剩下了两万来人。正像邓发所讲的，毛泽东企图“吞并”四方面军，他指使洛甫在墙报上刊登了一篇指责红四方面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这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差一点就招致全面分裂。双方领导和负责干部在一起开了十来天会。结果，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把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朱德同意由徐向前接任总司令、自己任副总司令。王稼祥则同意由陈昌浩接替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自己任副主任。洛甫在几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之后，保留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政治局会议增补徐向前和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才得以避免分裂。双方领导通过决议：红军分两路纵队继续西进。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和结束了西征的一、三军团先行。他们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组成了先遣队；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分和红五军团，他们在张国焘和朱德的指挥下组成了第二纵队。

但是九月份在毛尔盖，毛泽东又突然开始随意调动军队，这就再次造成了分裂的局面。

当上述红军第一纵队到达毛尔盖(四川省)时，毛泽东违反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关于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决定，突然命令一、三军团在夜间秘密离开到那时为止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的四方面军，离开驻地，并向北面移动。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部队起程时，既没有充分的物质保障(首先是粮食和冬装的储备不足)，也没有得到这些雪山和沼泽 24 第一章第一个时期，“整风运动”的准备地带的气候、自然和其他条件的必要情报。结果，红一、三军团的实力受到的损失比其他部队要严重得多。比如 1-935 年 9 月一、三军团出发时共有一万七、八千人，但战士大批死亡带来的后果是，部队很快就只剩下

了五千人。而在十月份，经过了两次不大的战斗以后，军团补充了人员，总共也才五千七百人。

毛泽东应当对这两次分裂负责。至于在毛尔盖利用分裂成为以张国焘为首的第二中央政治局，不过是加深和扩大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分裂，这个责任要由张国焘来负。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1936 年秋，毛泽东蓄意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处于这样的境地，即西路军不仅得不到新疆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的、苏联提供的现代军事技术装备，而且还受到了很大损失：两万五千人中勉强到达新疆的只有八百人。这是由于毛泽东有意不通知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必须到新疆去接受苏联的军事技术援助。如果他及时通知这一路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他同这一路军有联系)，他们就一定会去新疆接受苏联的援助，而 1937 年秋在华北和华中与日本人相匹敌的就不会是缺少军需的军事技术装备的四万八路军和两万新四军，而是有很好的现代化军事装备的、由数十万战士组成的大军。因此，毛泽东不仅使红军西路军受到了打击，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毛泽东的重大罪过。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在会上以及后来的活动，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去谈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功绩”，相反，这恰恰是毛泽东的极“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和反党活动的表现。

毛泽东至今一直在扩散他所捏造的“遵义会议的功绩”，还炫耀他本人的“功绩”，这个事实证明他的厚颜无耻确实少见。

真实的历史事实证明，就是在毛泽东提议的遵义政治局会议的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批评，也不过是指责它“犯了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只字未提六届五中全会的总路线有什么错误。可见，开展“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所谓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路线是“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至于在全党享有很大声誉及崇高威望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不仅谁都没有反对，而且谁都不能、也不敢反对、可见，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进程中提出的、直到今天还在宣传的、所谓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什么“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说法，是同历史事实根本矛盾的。

毛泽东散布的、所谓遵义会议反对了“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结束了主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正确领导”；所谓“遵义会议前夕(即 1934 年底)，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中国革命遭到了失败”，而毛泽东“挽救了中国革命”等说法，无非都是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历史的彻头彻尾的伪造，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他的个人地位，打击共产国际的领导，以及那些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中共领导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国革命的状况，这会使我们看清，毛泽东捏造的那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和无耻。

中央苏区红军西征开始前((1934 年 10 月 16 日以前)，中国红军的编制总共约二十八万到三十万人。其中在中央苏区的大约有九万人(主要是林彪指挥的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彭德

怀指挥的三方面军，还有董振堂、寻淮洲、罗炳辉等人指挥的若干部队)；在川陕苏区有将近十五万人(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的四方面军)；在湘鄂西苏区有大约两万人(贺龙指挥的二方面军，其中包括肖克的第六军)；在赣东北苏区的有差不多一万人(方志敏和邵式平指挥的第十军）；在鄂豫皖苏区有大约七千人(其中徐海东指挥的二十五军的五千人向陕北方向移动)；在陕北苏区约有五千人(刘志丹和高岗指挥的第二十六军)；在广东海南岛苏区有三千到五千人(由冯白驹领导)。

在1935年1月初遵义会议召开前夕，除了出发西征并损失了三万二千人的红军部队外，留在老中央苏区的、由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曾生、叶飞和其他同志指挥的红军游击队，将近一万人。其他地方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红军游击队。

原有两个纵队按照党中央的命令撤离原驻地到其他地区并协助中央苏区红军西征。第一，这是贺龙和肖克指挥的二、六军团；第二，这是方志敏指挥的第十军和寻淮洲指挥的第七军联合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所有其余部分还留在苏区原根据地，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华北和其他地区，党设有中央局；在河北、河南、陕西、江苏、四川等省，设有党的省委；在上海、苏州、北京、天津、唐山、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以及在许多县城，设有地方党委会。这些地区总共还有几万党员(共青团员不算在内)。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工人、农民、学生和文艺运动中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东北日本占领者和伪满洲国当局统治的地区，拥有三、四万成员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活动。东满、北满和南满的特委，在满洲省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哈尔滨、长春和其他大城市，也有党和共青团组织在开展工作。

总之，我国许多城乡都有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在活动。这些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无比残酷的环境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起到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领导者的作用。

有关1933-1937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运动情况的文件，以各地方党组织的报告的形式，不仅作为中共中央的档案保存下来，其中许多文件当时就在党的公开刊物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过。在以俄文、中文和其他文种出版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英国发行的《国际出版通讯》①，联共(布)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海英文版的《中国论坛》报这样一些杂志上，都发表过许多这类文件。关于中央苏区红军于1933-1934年反对国民党军队第六次围剿②的经过，关于以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福建事变失利的原因，关于红军为什么撤离中央苏区这个老根据地，并在福建十九路军失败以后，为了避免蒋介石从两方面(闽东和赣北)进攻，以及由于其他政治、军事和经济原因而决定西征的情况，我在1934年10月写的关于红军反对第六次围剿的斗争及其新策略的那篇文章中，也都作了论述。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2期)和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2.33期合刊)上，它也就是英文版《国际出版通讯》上的《新形势和新策略》这篇文章。后来这两篇文章合为一篇，用中文以《新形势和新策略》为题出版了小册子。

所有这些历史事实都是无可争辩的：它们有文件为证。

试问，毛泽东关于遵义会议前夕中国革命情况的捏造，究竟有什么根据？根据他的捏造，当时中国革命好像是失败了："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全国红军总共只剩下了两万六千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说是"挽救了中国革命"。所有这些都是十足的谎言，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事实为证。

在上面提到的陈云的那篇文章里，也无法找到任何有关遵义会议前夕"中国革命失败"的评论。

至于遵义会议本身，那么，陈云在文章中讲了红军占领遵义后休息十二天的情况，而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连提都没提①。当时我问他，关于这次会议为什么只字不提。他回答说：

"本来这不是全党代表大会，不是中央全会，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局的一次常会；有什么特殊必要去提它呢？"　　至于会上讨论的问题，陈云是这样讲的：

"第一，批评了过去的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当西征出发之前，在党内，在红军内以及普通群众中没有做些应有的解释工作……因为我们把军事秘密的问题，理解太机械了。我们曾认为，西征底任务，不能向党员、战士和普通群众去解释'。当我们提出了'生擒王家烈'的口号，这才得到了纠正。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所带的行装太多，粗重机器装载太多'。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把全部辎重都扔掉。

第三个错误就是纯粹军事上的错误。我们总是按照纸上划好的直线笔直前进。不过，早在到达遵义以前，'行到黎平我们就纠正了已犯的错误'。

第二，就两个职务更换了领导人；实际上这是会议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早就想接替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因此才以洛甫也将代替博古任总书记为条件，同洛甫结成联盟。现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有什么必要再去谈它呢？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博古和周恩来，说他们在行军时似乎不愿意打仗，行军因此就非常像"大搬家"。可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掌握了指挥权，就野心勃勃地把部队投人战斗并实行转移，这也引起了许多不满"。①　　这里我应当对陈云的讲话作些说明。他没有讲到在到达云南省会理县时，林彪及其他军事首长就已对毛泽东搞的无目的的战斗和转移提出了抗议。而在进人四川省以后，洛甫认为毛泽东的军事策略是错误的，便同陈云和罗迈一起决定离开红军，回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毛泽东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服洛甫留下并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支持他，他说，如果在"政治舞台"上站不住脚，在"军事舞台"上也就稳不住。

他们通过了一项折中的决议：洛甫和罗迈留在部队，陈云到上海去，然后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为红军争取帮助。正因为这样，陈云于 1935 年 12 月到了莫斯科。邓发和王稼祥在 1936 年才把这事告诉我们。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陈云当时对毛泽东的军事策略也有很大的怀疑。陈云早在西征的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就离开了中国，因此他文章中关于这两支部队在四川省会合后，将开辟比过去更大规模的苏维埃根据地等说法，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但因此而指责陈云是不行的，因为陈云那时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执行的是共产国际指示中确定的红军西征的计划。谁也不可能想到，在两支部队会师以后，毛泽东会拒绝开辟四川根据地，两次制造分裂，而后又单独通过山区和沼泽地带往西北行进，从而使党和红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至于政治路线，那么，陈云原先认为，毛泽东的行动是正确的。就在莫斯科，当时他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阅读了我的《新条件与新策略》这本小册子，其中论述了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和红军西征的策略问题，他还阅读了我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言，着了我的《新形势与新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分析，这样，陈云才逐渐明白了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方针是错误的。因此，陈云在自己的文章中不能不写上："我们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如果在西征时期运用了新的策略方针，我们会得到很大的成绩。可是现在亡羊补牢，尚不为迟。

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的和惟一正确的方针'，①。

关于必须利用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为红军西征创造有利条件，并迫使蒋介石抗日的问题，陈云也开始形成了新的看法。因此他进一步写道："日帝向华北之进攻，使中国广大民众日益愤激。各派军阀之间有激烈的暗斗。军阀间的这种矛盾我们应当利用。"② 显然，陈云开始意识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年代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也站不住脚这一点，他早就清楚；因此，他只字都不愿提及遵义会议。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貌。陈云在他的文章结尾部分热情赞颂了党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并对此作了比较真实的评价。他写道："党的工作应当得到什么估计呢？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真正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共产党在苏区的威信非常之高。党保护苏区数千万人民的利益。当然，我们的党也犯过某些错误，可是它都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过去陈独秀变节以后，或李立三及瞿秋白犯错误时代的那种状况，现在再没有了。现在我们的党在新环境中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① 不管是谁，只要他愿意把陈云在这篇文章中所讲的，同事物的实际情况，同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时所捏造的遵义会议的历史，也就是同所谓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那种说法加以比较，就能看出，毛泽东的种种捏造是多么荒谬和无耻。

还可以提一下 1937 年用中文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违反了作者的意愿，成了驳斥毛泽东伪造的遵义会议历史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大家知道，毛泽东对这位以老相识相待的美国朋友，确实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甚至把自己关于党、共产国际和苏联问题的意见，也都向斯诺和盘托出。1936 年夏秋，他们在保安有过多次谈话。全部谈话记录在出版前都被译成了中文，并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如果说在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确实发生了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捏造的那种可怕的悲剧，如果说遵义会议和毛泽东个人确实起了"巨大作用"，斯诺当然都会讲到的。根据美国和世界舆论界当时的有关报道，斯诺按照美国当局的指示出发西行，主要是为了亲自结识毛泽东。为了宣传毛泽东个人，他写了《西行漫记》；因此，如果他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这类材料，他不会不对此"津津乐道"的。此外，斯诺还多次同洛甫、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及遵义会议的其他参加者谈过话。这些谈话的记录也都经过他们本人的审查，并发表在《西行漫记》中。

然而，在斯诺的书里，逐字逐句、从头到尾、无论读多少遍，都无法找到毛泽东后来所捏造的、那种对遵义会议历史的论述的任何痕迹。

可见，无论在中共的档案中，还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十年代的文件中；无论在当时的报刊上、在陈云的文章里，还是在毛泽东最亲密的美国朋友斯诺的书里，都无法找到任何事实来证实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进程中所捏造的遵义会议的历史；相反，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这种捏造。

从遵义会议到西安事变前夕，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执行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以及他对红四方面军的破坏行径，使红军主力在瓦窑堡会合时，总共只剩下四万多人。

到达瓦窑堡以后，毛泽东不愿留在北方，不愿寻找有利时机开展抗日的军事行动。他根据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把五千七百人的西征余部，同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八千人的部队合并在一起，开始实现他的到山西去的冒险主义军事远征计划。

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毛泽东挽救中国革命免于失败”的情况，是不曾有过的。有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党中央基本上执行了中共四中全会的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在“九一八事变”

(1931 年)后逐渐得到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中国革命无论在苏区还是在国统区，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东北伪满统治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无数历史事实还表明，由于毛泽东的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破坏活动，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成就，大部分都在两年内丧失了。没有事实能证实，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进行得很顺利；而下述情况倒是得到了证实，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过错，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四万余人被封锁在陕北的狭长地带，处境极端困难；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才使党中央和红军从极其复杂的形势中解脱出来。

刘少奇在 1936 年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了这些历史事实。他写道，不是农村挽救了城市，而是城市挽救了农村。换句话说，是城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挽救了农村。(刘少奇的信件刊登在上面提到过的《两条路线》的文集中，这里引用的只是该信的基本思想。)　　就连毛泽东本人在“整风运动”以前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毛泽东还曾公开讲过：“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是一种伟大的发现。没有这个政策，我党和红军很难摆脱当时造成的那种困境；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民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战争。”此外，在“整风运动”进程中，他在 1944 年 4 月同我讲的那些“肺腑之言”中，以及在 1948 年 12 月他就“整风运动”和我进行的谈话中，这些事实他还是都承认的。①

1，他成立了“毛一洛联盟”，进行派系斗争，反对党和党的中央，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以及党中央执行这条路线的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时，他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为自己)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为洛甫)。

2.遵义政治局会议无权撤换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总书记。

3.当时政治局有十二位委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指望的票最多占三分之一。十二位政治局委员中有五位缺席(项英留在原中央苏区，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中，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七位政治局委员中，博古和周恩来不支持毛泽东；邓发后来说，如果投票表决他是不会投赞成毛泽东的票的；会投票赞成毛泽东的只有洛甫和陈云。朱德会持什么立场，不清楚；但就算他投赞成毛泽东的票，那也只有四票“赞成”，如果他也投反对毛泽东的票，多数就会在博古和周恩来一边；毛泽东对此是了解的。因此，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上，他总是拒绝进行任何表决。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他就以阴谋煽动手段嗾使必须到会的军人，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起哄来支持他。这样才“通过了”合乎他心意的决议；要求博古把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给洛甫，要求周恩来把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毛泽东。

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在组织集团反对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路线以篡夺党的军权方面的所作所为；相反，他一谈起这些情况，就流露出一种自鸣得意的感情。

比方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就和我谈过这件事，他谈到了遵义会议，他说，“在遵义会议时大家还以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独自一人是不能发生影响的。因此我不得不使用 ‘分化瓦解’的办法。我首先让王稼祥，而后让洛甫反对博古。

同时与洛甫结成‘毛洛联盟’，并同他达成协议：洛甫先夺得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后再任命我接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在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斗争中，你占第一位，博古占第二位，(王)稼祥占第三位，洛甫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斗争，但他在莫斯科学习，所以也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拥护者。你们四人当时在政治局里和在党的干部中间是有威信的。当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一(王)稼祥和洛甫反对另一个人——博古而支持我；我的话见效了，他们开始听我的了。①一结果，我才夺得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权、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的这些话同事实是相符的。邓发、博古等人也以这样的精神，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过遵义会议的情况。

显然，如果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出来反对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他就会遭到博古、王稼祥、洛甫和政治局其他同志的一致回击，因为博古和王稼祥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的首要参加者和四中全会共产国际路线的拥护者。至于洛甫，虽然他在 1931 年夏，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半年以后，才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并没有参加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但他也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当时，政治局委员中谁都不会出来反对四中全会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会议要么根本不开，如果开，其结果就是毛泽东彻底失败。

毛泽东当时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出来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反对这条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

毛泽东企图使他对遵义会议所进行的种种捏造变成真的，便编造故事和谎话，或者让别

人去编造。这些故事和谎话归结起来有：所谓“王明参加了长征，只是在 1935 年初遵义会议上被推翻以后，他才被派往共产国际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或者竟然说“王明出席了 1935 年 12 月 27 日瓦窑堡的于部会议”，会上，他好像“同博古一道起来反对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等等。不仅中国的出版机关，而且外国资产阶级的一些出版物，由于消息不灵通或者态度不友好，经常重复毛泽东的这类捏造，有时他们甚至自己杜撰一些有关我在那几年里的行止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我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去反驳毛泽东臆造的每一条“消息”和别人所捏造的每一个“报道”。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任何一个苏区呆过。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31 年 10 月 18 日我离开上海，于 11 月 7 日到达莫斯科。从 1931 年 11 月 10 日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执行自己的职责。1937 年 11 月 14 日我才离开莫斯科，于 11 月 29 日飞抵延安。

任何其他有关我在那一时期的去向和转移的报道，不是主观臆造的，就是纯粹幻想的结果。

第五节 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

积极筹备整风运动时期，就为这种蓄谋打下了基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 年 10 月 4 日夜，毛泽东给我带来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电文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个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日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目的是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犯苏联。毛泽东让我研究一下这份电报，并补充说：“明天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复电”。

10 月 4 日和 5 日，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必须加强中国的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可能助长德国侵略者对苏联的进攻。毛泽东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我提出的论据，却往往使他走投无路：他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当我提到他所执行的联日反苏的路线时，他大发雷霆，用手拍桌子，从道理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毛泽东在 10 月 6 日和 7 日把任弼时和王稼祥拉来参加讨论，在 10 月 8 日和 9 日又把康生和陈云拉来参加讨论，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但这四个人全都以沉默来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和我的意见。

这种形势吓坏了毛泽东。为了结束这种不利于他的危险争论，消灭他的主要政敌，即反

对他的反苏亲日的卖国路线、反对他正在加紧筹备的“整风运动”和其他与伪造党史有关的措施的人，毛泽东决定甩开我。10 月 14 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后面有说明)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尽管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由于非常有经验的中医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诚挚热情的李润诗①医生的积极努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可是我的内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结果，我不仅卧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病一直很重。病变成慢性的了，而且有严重的并发症，使我非常痛苦。

毛泽东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多年来散布了种种谰言，甚至诽谤性地断言，王明“装病”，想逃避“整风运动”。为此，我不能不哪怕是极简短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谈谈下毒药摧残我的健康的问题。

正像上面所讲的，10 月 4 日到 9 日，我和毛泽东在他家里就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发生了争吵。从 1941 年 10 月 4 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里吃一顿饭。8 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9 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是，毛泽东派来他的私人秘书叶子龙，差不多是把我从床上拖到了会上。10 日我就躺倒起不来了。

同时，毛泽东借口必须“加紧兴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吩咐李富春立即动工。在离我住的医院数十米内，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采石，震耳欲聋的响声昼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请求李富春停两天工，或者到别处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

10 月 14 日，李富春和傅连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到医院来看我，并用汽车把我送到中央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主治大夫。

在医院里，金茂岳给我规定的治疗方法，摧残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从 1942 年 3 月到 5 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这时，毛泽东正好公开进行“整风运动”，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和其他被他列人“莫斯科集团”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觉。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遗憾的是她那时还不懂医学和药理学，但看到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异常，就不许我再吃这些药并把药扔了。后来她开始对药方发生怀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药了，转而找中医和西医定期给以帮助。

1942 年 8 月 13 日，我回到杨家岭家中。①但金茂岳继续给我“治疗”。在 1943 年 2 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给我的回电以后，他更加紧了对我的“治疗”。季米特洛夫在回电中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一个月以前我的惟一的电报是怎样发往莫斯科的。1943 年 1 月 8 日，有两位同志——他们是苏联的军事记者，来看望我。我问他们，可不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台向季米特洛夫同志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当时我的病非常重。

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请求他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上报告，在我于 1937 年 11 月底回到延安以后，在最近这五年里，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最后我问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飞机来，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样，我还可以同时向共产国际的领导详细叙述毛泽东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电，特别是我可能要飞往莫斯科这一点，使毛泽东深感不安；因此他马上盼咐金茂岳采取新的措施来害我。1943 年 2 月 12 日，金茂岳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后两种东西可以把甘汞变成升汞，2 月 19 日，他用 10%高浓缩的鞣酸液给我灌肠。这两项使命的目的是马上置我于死地。但孟庆树发生了怀疑，她请求别的医生研究一下这些药方，他们真的证实了药物具有上述毒性，绝对不适宜服用。于是她便正式向党中央和医务人员对金茂岳的犯罪行为提出指责。慑于社会舆论，在我们的再三坚持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让李富春请延安中央医院、白求恩和平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生来会诊。

1943 年 6 月 30 日进行会诊，7 月 30 日会诊结束。医生们仔细研究了金茂岳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以及药剂师的证明，做出了“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提出了“今后的治疗方案”。关于金茂岳医生让王明大量服用毒药的回题，会诊结论中指出：

_“王明同志服药后……出现呕吐，头晕、肝脏剧痛、脾脏增大、心区疼痛、体温下降……”的症状。事实终归是事实，就拿已经内服的甘汞来说，其剂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①的指示继续服用，甘汞总共能达到 20.4 克；这么大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对心、肝、脾、肾、肠、胃、口腔、牙齿、神经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响”。结论接着说，“甘汞、不溶于水中，而金主任给王明开服的是甘汞水剂……把甘汞与碳酸氢钠、硫酸钠、硫酸镁、含溴的药物等棍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变成升汞或可溶性汞盐，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给王明开的甘汞要同与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时虽然相克的药和甘汞不是开在一张药方上，但他告诉王明把这两张药方上的药同时服用。在服用甘汞的过程中，患者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可是金主任仍开原方让患者继续服用”等等。①　　至于在 1941 年 10 月到 1943 年 6 月这段时间里，我中毒和健康受损害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因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1：1943 年 6 月 30 日到 7 月 30 日，医生们在延安进行会诊的记录、结论和其他材料(会诊结论写了两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当时经李富春转中共中央)。参加会诊的十五个医生中有十一人在结论上签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为他辩护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乔治?海特姆)。在人证物证面前，他们不能不签字。

在没有签字的四个人中间，有一个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东老乡，在法西斯德国受的教育，他在整个会诊期间千方百计为金茂岳辩护，而到最后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时却逃跑了；还有一个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国人开办的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时的同学，也是他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的同事。他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的“干爹”，是中央医院的儿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医院的老护士；江青经常把女儿留给他们照

管。另外两个是朱仲丽和 A.阿洛夫，他们在签字那天未能来参加会诊。

结论写好后，由于金茂岳坚决否认，马海德和曲正又企图为他辩护，签字拖延了两天。大多数医生，其中包括苏联医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给王明开的药方，从药房取来了含有相克药物的甘汞药水，他们准备好了药水，把断言金茂岳的药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现象的马海德请了来，叫他喝下去。马海德坚决不喝。过了几小时，玻璃瓶里的药水呈现出绿色，然后，突然响起了噼啪声，瓶塞蹦得老高。马海德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为金茂岳说一句辩护的话了。曲正害怕也让他尝这种药水而逃跑不参加会诊了。只有金茂岳一个人还在胡搅蛮缠。但是，当孟庆树把金茂岳 1943 年 2 月 2 日开的药方公诸于众时，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着说："谢谢您，孟庆树同志！您没有照这张药方取药，没有让王明同志服用这种药。这样，您不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还救了我。"在这以后，参加会诊的十二位医生中有十一位签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签)。

金茂岳在结论上签字以后，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　　"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你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我说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前不久党中央决定吸收我为秘密党员，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但李富春说：'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决定让你做，你就应当去完成；你已经是党员了，必须服从党的决定！……"，　　这时，屋里闯进来了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冲着金茂岳喊道：

"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你跪着干什么，哭什么，还嘟囔什么？走！到枣园①去！你是个犯罪分子，没有权利同别人讲话！"

他们揪住金茂岳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2.金茂岳为毒害王明而开的一些药方(这里包括当时从中央医院药房里找到的一小部分，以及我们保留的一部分；其他药方不是"丢了"，就是没开，因为有些药是金茂岳从家里带来的)。

3.1943 年 7 月在延安医生会诊时，1950 年 12 月到 1952 年 10 月在莫斯科的医院里，以及 1954 年 10 月在北京医院，对二十四小时尿量中的含汞情况的分析记录；其他分析记录和其他材料。

延安的会诊中，医生揭露了不断毒害王明的事实。会诊后，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心地善良、认真负责的儿科专家李润诗。

她根据全新的诊断——汞中毒，对症下药，想尽办法帮助我恢复健康。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才有了免除死亡危险的希望，病情才有了好转。

此外，促使我活下来的(虽然我不止一次濒临死亡)是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1.尽管我由于屡次中毒而十分痛苦、危险和多病，但与金茂岳等人总是盼望我快死的想法相反，我和孟庆树都从未丧失信心，我们积极争取中西医专家们的帮助，和他们一起商量，自己也研究医学。

2.不管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怎样诬蔑我，我相信我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方面都是正确的。我坚信列宁主义思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正确的，坚信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是正确的，认定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是反动的和不道德的，肯定毛泽东是在伪造中共历史。

3.虽然毛泽东企图采取各种办法来孤立我，但大多数领导人和党的干部，不是公开赞同我的立场，就是私下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公开的赞同表现在不少人来看望我；间接的支持则是绝大多数干部都反对“整风运动”(毛泽东于 1944 年 4 月和我谈话时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这样，他们不仅表现了对我个人的关怀，而且表达了他们对列宁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支持。

虽然许多干部因为怕受迫害或怕遭逮捕而未能来看望我，可还是有不少人在“整风”和“抢救”这两个最沉重的时期，经常到医院或家里来看我。他们当中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两个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政治局连我在内共有十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

来看望我的还有一些从解放区和国统区回到延安的负责同表。为了欺骗舆论，连毛泽东也在我危急的时候假惺惺地来看望过我。

来看我的还有我主管的那些党的工作部门的同志。当时我担负的工作有：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管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问题)，任中共中央党刊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包括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代表兼指导员，中共中央南方(湘赣闽粤桂各省)委员会主席和西南(云贵川康各省)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党团书记。

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任作民和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工作过的、在工作上和我关系很密切的同志，都多次来看望过我。

当然，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比别人来得更频繁，我们也交换过对“整风运动”的意见。

是的，也有另一种类型的来访者。李富春就常来。他在毒害我和损害我的健康方面，是毛泽东的代理人。但是，作为主持中央机关和医疗机关日常事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形式上不能不给我各种帮助，并和我商谈生活及治疗问题。显然，我和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谈论“整风运动”和其他党内问题或政治问题，　　到这个时候，1939 年让我担任的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和女子大学校长的职务，都自行撤销了。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党在妇女中的地位，创办《中国妇女》杂志，开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女子大学还在 1941 年 9 月就解散了。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里，毛泽东又采取措施企图加速我的死亡。这里只简单讲几件

事。

(1)1948 年 6 月 25 日，朱豪①中央医院的主治医生黄树则②开的处方是：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碱给我灌肠。用来苏尔灌肠可以引起死亡。

只是由于我妻子的警惕性，才得以避免了这一次的不幸后果。这个情况，医院院长周泽昭和其他医生都很清楚。

由于这一事件，中央卫生处①于 7 月 7 日发了一个通报，②通报确认："药剂师在配药时犯了错误"。"他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碱，致使病情急剧恶化，这是严重的疏忽……"。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掩盖加速我死亡的新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而见之于行动的。

(2)1950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1 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

"早上九点钟刘少奇把我叫去并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坐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

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我的事情很简单：打电话给外交部，叫他们马上办理您全家人的护照。现在我把护照交给您。

您愿意把谁带走都可以，我只不过要他们的照片。我已经通知铁道部，在今晚六点照例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您挂一节公车。

时间不多了。您来得及准备吗？"

我问他：

"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人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线。这消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杨尚昆回答说。

"如果我们在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好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问。

"是的，今天走不走，您自己决定"，他回答说。"如果您决定不走，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就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刘少奇早就同意我们到苏联去，而我们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危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我去莫斯科不仅是为了治病；我愿意再次到离别了十三年的、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苏联去。

在五个政法机关为我们饯行的招待会上，一些同志劝我不要拿生命去冒脸。但是我们于六点半坐上火车起程了， 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满洲里车站，转乘苏联火车，顺利地到达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当火车就要开进莫斯科车站时，孟庆树这位音乐爱好者，唱起了我写的《莫斯科颂》：①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官！五角红星！整个苏维埃国家都在 倾听着悠扬的钟声。星光照耀着世界上的五大洲。

钟声响彻了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上空—— 从边疆到边疆。

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你,莫斯科,胜利了;你是未来世界一一 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莫斯科!

列宁墓！伟大的精神，不朽的事业。

列宁主义把五大洲 从梦中唤醒,苏维埃国家的胜利 永远鼓舞他们前进。你,伊里奇, 永远是世界革命的舵手。你，伊里奇，永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莫斯科!

革命的灯塔，劳动人民热爱您，法西斯分子僧恨又惧怕。狂妄的希特勒进攻苏联， 斯大林坚定地发出了命令??，. . . 在党的领导下，军队和人民 捍卫着我们亲爱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军队和人民 胜利地开进了敌人的巢穴，？ 开进了敌人的巢穴。*******莫斯科!

共产国际!世界上全体共产党人—— 都亲如兄弟。日本匪徒践踏中国 苏联共产党来支援。苏联征服法西斯分子 中国共产党理应帮助。全世界的战友们， 手携手打击侵略者!

全世界的战友们，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一-~争取伟大的胜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一一‘朋友们；—-*******啊，??…啊，…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列宁墓；莫斯科，革命的灯塔；莫斯科，共产国际!

莫斯科啊!，你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取得了胜利；你是未来世界一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

1952 年冬在莫斯科时，刘少奇才对我们说“你们没有遭到轰炸，是因为杜鲁门不愿意和中国作战，他严厉地禁止了麦克阿瑟轰炸中国领土……”

(3)1953 年 12 月，我们回到了北京。从 1954 年 4 月到 1956 年 1 月，我的胆囊炎和肝炎曾急性发作过七次。第一次发作是在 1954 年 4-5 月，黄树则、傅连障等人害怕承认我的肝和胆囊有病，因为这会牵扯到那一段毒害我的历史。我躺在家里发作了五天。第六天，我不得不到北京医院去。医生的诊断是急性胆囊炎，但黄树则仍坚持过去的看法。他说：“患者除了胆囊炎，还有腹膜炎”。

那时，黄树则已被提拔为中共中央保健局副局长，北京医院在他管辖之内；医生们当然不敢不听他的。他这样坚持，是为了给我立即做胆囊重点切除手术。在我住院治疗的第四天，即发病的第九天，我处于病危状态。这天早晨，孟庆树把两个儿子叫来准备和我告别。同时，

她自己开始用多次检验过的方法给我治疗。她为我的生命战斗了三天；我的情况逐渐开始好转，痛苦减轻了，体温下降了，我也能够吃少量的东西了。但医生继续要求给我做手术。我们坚决反对，因为我已经六昼夜没有吃东西了，体重从 58-60 公斤降到了 40 公斤，我的身体坚持不了手术。经过多次请求，给我输了两次血，共五百毫克。同时，我们偷偷地去找了中医专家，服用他们开的药。①结果情况就正常了。但医生还总是坚持要做手术。当我们坚决拒绝时，他们逼我们在说明我们拒绝做手术的文件上签字。

(4)1955 年夏，由于病情恶化，我再度住进北京医院。外科医生邵大夫，以一分钟六十滴的速度给我输生理液和葡萄糖液。

后来邵大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说，这是外科主任王大夫吩咐的。输液开始几分钟后，邵大夫离开了病房。我开始打冷颤，冷到用六个热水袋、盖三条棉被都止不住的地步。我脸色苍白，满脸大汗，心脏颤动，极度虚弱。孟庆树要求护士马上取下针管，但她拒绝了，她说：“邵大夫吩咐过不经过他不能停止输液。

我就去找他”。护士走后，孟庆树立即把针拔出，停止翰液，并马上注射樟脑以促进心脏跳动。在这以后，我才逐渐平静下来，而心跳仍然很弱。过了好久，护士才把邵大夫找来。他看见输液停止了，大为不满地说，应当等他来以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当时在北京医院外科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 R. M.沃洛申教授听说此事后对我们说:“像王明同志这样的身体状况，最好是每分钟输 20-30 滴；怎么能一分钟输 60 滴！将来再输液时应当观察玻璃试管中液流的速度。”他认为，孟庆树同志做得对。

否则，王明同志的心脏就要经受不住。我们应该衷心感谢 R M.沃洛申同志。他是我们的可靠的顾问。每一次他都坚决反对黄树则等人提出马上手术的建议。他说:“王明同志不仅有胆囊炎，他所有的内脏都有病。他能活着就不错了，怎么还能做手术？”他不止一次地劝慰我们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同意做手术。?王明同志，在你目前这种情况下，外科的干扰只会带来最坏的后果”。而当刘少奇决定让我再次去苏联治疗时，他帮助我们尽快成行，而且始终保证，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我的心脏能经得住飞行。

除了上面所讲的以外，从 1941 年秋到 1956 年初，还有许多别的事件和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我施毒和进行迫害。

第六节 毛泽东夺取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正好在筹备“整风运动”的时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即毛泽东采取“宫廷政变”的方法夺取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 年 9 月，毛泽东常常半开玩笑地对政治局委员们说：

“洛甫是汉献帝，我是曹操。但我不具备曹操的美德，曹操满足于文王的爵位，只是他的儿子后来篡夺了帝位。我本人则要持剑篡位。”

一次，在九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突然要求洛甫立即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因为不这样，他好像就“不便工作”了。任弼时马上阻止说：:

“这太不严肃了，这个问题最好留待七大去解决，那时将会通过正式决议。”

其他人都默不作声，会议就结束了。

在这以后，毛泽东就擅自代替洛甫主持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11 月，他又逼洛甫到晋西北解放区去“视察地方工作情况”。

毛泽东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实际上夺取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第七节 拼凑“整风运动”的领导班子

毛泽东没有“自己的政治干部”。为了领导“整风运动”，他采取了包括威逼利诱在内的各种办法，拼凑了这个领导班子。

他首先看中了刘少奇，刘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正像毛泽东所讲的，遵义会议后他经常设法接近刘少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1938 年 10 月)，他和刘少奇达成了建立“毛刘联盟”的协议。这个联盟由于下述条件而得到了巩固。这些条件是：在共同夺取了党权以后，将确立中央主席的职务(这在中共内部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将担任这个职务：他将基本上管理军务；刘少奇将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他将管理党的工作。为了筹措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须的“资本”，刘少奇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撰写并于‘1939’年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此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和个别谈话中，经常强调必须提高刘少奇在党内的作用。在他公开宣布“毛泽东主义”的时候，他经常说：

“(刘)少奇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个传播者和提倡者。”

他采用“鞭子和蜜饼”、‘又打又拉”的办法，把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拉入自己的小圈子。然后把当时曾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调到延安工作。毛泽东同彭真刚谈了一次话，就宣布彭真是“天生的毛泽东分子”。同时，他又宣布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委书记高岗①是“天生的毛泽东分子”。毛泽东还设立了中央办公厅，任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为办公厅主任，对他表示特殊的信任。

此外，他还任命陈伯达(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和胡乔木(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整风运动”时他利用他们做自己的助手，写文章并伪造历史事实。

上面列举的八个人中现在剩下的还不到三人，何况这几个人在政治舞台上也是时隐时现。其余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毛泽东折磨至死，或者成为他加以迫害的牺牲品。

第二章 第二个时期——“整风”

这个时期(1942年2月一1943年7月)，毛泽东公开地开展了“整风”。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全国干部进行“整风”

的地点)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而名义上宣布了“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运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是公开进行反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运动的序幕。2月8日，他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对“整顿文风”作了扼要的补充指示。2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张如心(原名张恕安)的冗长文章《论毛泽东主义》。张如心此人曾经拥护过汪精卫，并且有过钻进党内的托派的嫌疑。这篇文章是毫不掩饰地诋毁列宁主义和颂扬毛泽东主义的开端。接着毛泽东在5月里召开了三次“文艺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引言和结论的讲话。这就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具有指示意义的讲话。讲话于5月23日在报上发表。

在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以下四个问题：

1.“整风运动委员会”和“整风”单位。

2.“整风”的方法和对象。

3.同毛泽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三次谈话。

4.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节 “整风运动委员会”和“整风”单位

为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建立了所谓的“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挑选的。委员会完全遵照他的指示行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刘少奇、康生、陈云、彭真、高岗和李富春。这个委员会也就是毛泽东筹划整风运动时期结成的那个集团。1943 年 1 月以前，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康生；一月，刘少奇从华中回到了延安，并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延安“整风运动”分三个大单位进行：第一个单位是中央党校。全国的干部都在这里经受了“整风”。除留下参加“整风”的党校学员之外，从全国各地召来了从各县到各中央局的党委工作人员，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团以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占领地区各行政机关(县以上)的工作人员，群众团体领导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党校的“整风运动”由彭真领导。

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在第二个单位开展“整风运动”。高岗是这个单位的领导人。

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整风运动”在第三单位。李富春在这里领导运动。

从“整风运动”一开始，整个延安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每个机关、学校或团体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拘留所。不经“整风运动”领导人同意，谁也没有权利互相来往——无论是通信还是打电话，或进行其他的单独行动。

第二节 “整风”的方法和对象

毛泽东指令所有参加“整风”的人学习他所规定的文件，写“自我批评”的“交代材料”。“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对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尤其要这样，因为“毛泽东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结果是，列宁的著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著作，谁读得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因而原先提的公式口号“马恩列斯毛”变成了“马恩毛”这个公式口号。有些人(甚至一些负责人)吓得把上述著作和文件当众烧掉或者扔掉。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人说：“幸亏我没有读过这些东西，不然我也成了教条主义者了！”

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每个人在编写自己的“交代材料”时必须遵守的“批评”的方法和对象：

1.应该“批评”的不仅自己，而且包括自己的熟人。

2.对己对人，只准说坏的(指摘)，无论如何也不准说好的；而对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为数不多的人，则相反，只能讲好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坏的。

3.给每个人规定“批评”的主要对象；这首先就是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集团”，其次就是以周恩来和彭德怀为首的“跟随教条主义者”的 “经验主义”集团。

凡是在苏联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以及从事理论或政治工作的人，按规定都得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凡是工农出身的人，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又都得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者”。这样一来，全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被指控为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同时，毛泽东给“经验主义者”扣上“教条主义的俘虏”和“教条主义者的帮凶”

的帽子，这样就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联在一起，并证明主要打击“教条主义者”是正确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内从来不存在什么“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集团。所有这些“集团”，都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作为打击大多数党员的借口而捏造出来的。

4.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必须承认犯了什么执行“国内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事实上，既不存在“国内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不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作为打击王明、博古，打击大多数党员的借口而捏造出来的。

5.每个人都必须检讨自己“不懂毛泽东主义”，“盲目地相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

主义”(这算是所犯“错误”中的最大“错误”)。接着必须保证，今后他痛下决心“抛弃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并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主义”“武装”

起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宣布，“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人党，甚至完全没有人党。”他的这些话，不仅针对在文艺界工作的党员，而且针对绝大多数党员。

因此“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开始要求绝大多数领导人和普通党员“承认”他们只是在组织上人了党，但是思想上并没有人党；具体地说，这就是他们这些人在思想上入的不过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党，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党。运动要求他们在思想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决裂，学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据说，只有这样做了之后，才能认为他们是在思想上入了中国共产党。

6.每个人还必须承认自己不知道“毛泽东是多么伟大”，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像是自己的另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每个人今后一定要把毛泽东当作中国共产党的“惟一领袖”，服从他的领导。等等，等等。

按照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在各机关进行“整风”的领导和干部没完没了地召开各种各样的大小会议，在会上迫使每个人做“自我批评”并“批评”别人；要求不断写、反复写“交代材料”。可是，一个人不管“批评了”自己多少次——又是口头的又是书面的，反正一样，总认为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自己的罪过”，“没有彻底清算自己”，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作严厉的自我批评。这样持续到人们既失去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面貌，也简直失去了人的面貌为止；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被认为批评自己“不够深刻”、“不彻底”。用这样的办法，把人们弄到神志不清和疲惫不堪的地步。同时领导整风的干部又唆使人们彼此攻击，让他们在会上和书面“交代材料”中相互“揭发”，互相污辱。他们就是这样有意识地在同志们中间造成不信任、怀疑、敌对和相互中伤的气氛。所有的人只能奉命相信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少数几个人。

毛泽东当时说，“由于人们习惯于旧的‘主义’和旧的意识形态，任何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主义’在产生时期是非常难于接受的。因此我们必须以穆罕默德为榜样，他一手拿剑，一手拿可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教。在整风运动中要下大力迫使人们接受毛泽东主义。”所以在所有进行“整风运动”的单位捕人、吊人、打人甚至杀人都成了正常现象。在这种蓄意制造的紧张与恐怖气氛之中，人们不得不无休止地表示自己“决心”反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反对共产国际路线、反对“教条主义的”

和“经验主义的”领导，直到只相信“毛泽东主义”和只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过反苏亲德一类的话：“苏联必败，德国必胜”，“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不能同八年的法西斯主义争胜负”，“斯大林不能战胜希特勒”，“俄国人不能战胜德国人”。又比如，当时毛泽东高谈阔论说：“斯大林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计划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主动地放弃这些城市，让德军去占领。应把苏军调往东部，调到乌拉尔以东，然后等待美英法开辟第二战场，到那时和他们共同举行反攻。在此之前，苏军只

应派出少量兵力和游击队与德军展开游击战。否则失败是必然的”等等。他企图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编造联共（布)党史和俄国历史的谎言，表现出他对苏联人民与苏联军队的鄙视，并对他们进行了诽谤。这一切，都成为运动的领导人的一种“根据”，借以手持毛泽东之“剑”，强迫挨“整”的人，在各种会议上和在自己的“交代”中，重复毛泽东对伟大的列宁的党、伟大的苏维埃国家、伟大的苏联人民及伟大的苏联军队所进行的诽谤与污辱。

应该指出，早在 1941 年 8 月至 9 月，每当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这些谬论时，我、任弼时、还有洛甫总是向他回答说：要相信列宁主义的力量、联共(布)的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力量、苏联人民和苏军的战斗力；苏军在前线的失利是暂时现象，胜利最终一定属于社会主义的苏联，而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必然失败。对此，毛泽东每次都是皱起眉头凶狠地回答说：“等着瞧吧！不久的将来就会证明，究竟谁的意见是对的。”的确，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了谁是正确的。

第三节 同毛泽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三次谈话

1941 年 10 月、1944 年 4 月和 1948 年 12 月，毛泽东和我进行过三次涉及“整风运动”的谈话。这几次谈话时，毛泽东坦白地回答了所有关于“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三次谈话的内容，使这场整风运动的真相大白。

第一次谈话时，毛泽东实质上回答了他为什么把我(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朱瑞作为“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把周恩来与彭德怀作为“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而猛烈加以攻击的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 年 10 月 4 日夜里，毛泽东在同我谈话中竟然强调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周)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他还说：“王明同志，你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你既有政治头脑，又敏感。

恩来不仅是很好的组织家和管理者，也是很好的外交家。老彭不仅军事上，而且政治上都非常强。我们在华北得以取得那样大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人中，还有几个很有才干的人：这就是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朱瑞……”

后来，毛泽东给这些人扣上“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之类的帽子，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主要攻击对象。他需要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把这当作打击别人的借口和抬高自己的手段。

第二次谈话时，毛泽东说明了他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与目的，也回答了为什么运动遇到干部的强大阻力的问题，等等。

1944 年 4 月 1 日下午 4 时，毛泽东坐在我的床旁，和蔼地说：

“王明同志！你在整风正式开始以前早就生病了。因此我没有来得及同你谈谈有关整风运动的一些问题。今天我来，想谈谈心。

首先，为什么需要整风？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创造条件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我个人的历史。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必须创立毛泽东主义。如果没有毛泽东主义，那么，又怎能做到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列宁主义。早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初期，列宁和斯大林就帮助我们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制定了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处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联共(布)和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全面的援助。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紧要关头，比方说，当陈独秀在 1927 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革命处于危急状况时，瞿秋白同志起来领导了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支持瞿秋白反对陈独秀的斗争，这样，才克服了陈独秀的错误。”

毛泽东继续说：" 1930 年，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

的困难。那时你起来领导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信批评立三路线，并建议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批判立三路线，支持你同这条路线开展的斗争，从而克服了李立三的错误。

‘九一八’事变(1931 年)后，日本不断侵略中国；而中国本身正在进行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中国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的支持下，你提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实现了这一政策，全民抗日救国战争才能够顺利地开展。

所有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

可是，如果承认这些事实，那又怎么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怎么办？”毛泽东自问自答：“我决定进行整风运动。不承认列宁主义。不承认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和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列宁主义不适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列宁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意见都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建议都是错误的，苏联没有援助过中国共产党，即使有时多少给点援助，那也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我们不承认瞿秋白在反对陈独秀主义斗争中的功劳；相反，我们宣布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不承认你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功劳；相反，我们认为你的路线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我们不承认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功劳，而宣布你提出了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同时我们会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遵循毛泽东主义。近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全部成就，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所犯的多次错误，都被毛泽东纠正了。

唉，整风已经进行这么久了，而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仍然遇到干部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继续说：“究竟怎么办？

对此我想了很多，但是没有找到好办法。虽然这涉及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但现在事情也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人强迫我们一定要承认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和苏联了。对于瞿秋白，一切都好办，因为他已经死了。‘八七会议’之后不久，他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为此批评了他，所以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没有被选为总书记。在 1930 年的三中全会上他又犯了错误——对立三路线搞调和主义。因此，他在党内的影响已经不大了。

对于你，是最难办的。你写了一本反对立三路线的书。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都通过了反对立三路线的决议。这一切，人们都记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问题，你写了很多文章、报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功劳，不仅在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中，甚至在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中，都有人知道。这一政策，我们党过去几年执行了，现在正在执行，并且要一直执行到抗日战争结束。因而一旦有人向干部说，王明没有反对过立三路线，一旦有人向他们说，王明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关或王明坚持错误的政策，那么，干部是很难接受这一切的。

不过，如果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你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中，你就占了十五年；这样，毛泽东主义又成了什么？又怎样能够把我们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呢？

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你把你的功劳让给我。你同意吗？"　　我回答他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不一样。

否定列宁主义、否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人，不可能是共产党员。我认为，每个共产党员，不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贡献大还是小，都不应当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而应当认为这是党的、共产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劳。因此，当季米特洛夫、多列士及其他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我说‘你对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是对党，对全体中国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功劳’①的时候，我回答他们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是党、共产国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劳’。

你知道，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就正式通知我：‘日丹诺夫同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和政治局对你在大会上的发言，尤其是对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都予以很高的评价。日丹诺夫说，你射出的箭准确地击中了目标……’②对他的赞语，我的回答和以前一样。

你大概记得，整风运动开始以前，你自己是怎样不止一次地在会上或私下对我说的，你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没有这项政策，我们的党和红军就很难摆脱当时所造成的困境；没有这项政策，中国人民就不能开展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这里有王明同志的很大功劳。’我对你的回答，总是像对上述那些同志的回答一样。

然而，既然你认为这是我的两大功劳，却又想让我把它们‘让’给你，那么请问：究竟怎样‘让’法呢？"　　他说：

“你对反对立三路线斗争的领导不算数。让我们认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我领导的。我们就说，当时由我担任政治委员的闽赣苏区的红军，不支持立三路线。所以说，我领导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你看怎么样？”

“你以为这样解释能说服干部吗？”我反问他。“你任政治委员时的闽赣苏区红军攻打长沙，当时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防御，第二次又攻打长沙，这时满城都是敌军，结果使红军受到了损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到瑞金专门召开了闽赣苏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发言的人都公开地指出，第二次攻打长沙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你现在的解释，干部接受得了吗？”

“是的，是的。”他低声地说。“但是别无他策。”

我接着问他：

“那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又怎样‘让’给你呢？”

“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功劳，我们同样不去管它。这项政策，就算是我制定

的。今后我们就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于 1935 年 12 月 27 日，即我在瓦窑堡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的那一天。”

对此，我回答他说：

“你这样能使干部信服吗？我请你考虑一下以下事实：

第一，还在你作这个报告以前好几年，党就已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就在‘九一八’事变(1931 年)后第二天，党中央在它的‘为沈阳事件告全体同胞书’中，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反，提出了‘武装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党中央在上海抗战时就宣布了‘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这一口号，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根据这个政策，我们党组织了上海工人抗日义勇军，并号召上海全体市民对十九路军给予各方面的支援。

1932 年，当日军占领了全部东三省并建立了伪满洲国时，党中央曾于 12 月 25 日为建立抗日反满统一战线给满洲省委发出一封信。1934 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杨松同志去那里领导建立东北抗日联军。

1933 年 1 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红军总司令部发表宣言，愿在三个简单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军队订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国民党‘剿共’军总司令陈诚与作战部队将领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十九路军的指挥人员和福建人民政府同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冯玉祥、吉鸿昌等人所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也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与我党合作。粤桂晋川及其他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也欢迎这个三项条件的宣言。

1934 年初，发表了经宋庆龄等三千人签名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筹委会’的六条纲领。全国各大城市的人民和各国华侨热烈响应这个号召，着手组织地方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筹委会。

它成了团结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强大力量。

1935 年 8 月，我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共同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其中提出了联合国内各党政军力量的具体的组织措施和十项纲领性的原则。这一宣言，得到了各党派及群众团体的热烈支持，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发表的所有这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文件，都是由我起草的。正如你刚才说过的，关于这一点，不仅党内，而且党外都知道，不仅国内，而且国外都知道。

此外，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代表我们党中央，不仅详细地谈到‘八一宣言’的内容，而且宣布党的全部工作准备转移，以便尽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同年 11 月，我发表了《新形势与新政策》的文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这篇文章，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这促使蒋介石于 12 月初派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代表，请求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给他提供机会，与我这个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就国共合作抗

日救国问题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虽然由于一系列的主客观原因没有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给国共谈判打下了基础，对两党合作抗日救国的原则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某些共同的看法。”

我继续说：“第二，大家都知道，就在你做报告的前两天，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一决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实现与此相应的纲领。这个决议，虽然由于政治局不完全了解国内外的新形势而有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政治局还是正式通过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决议。大家知道，这个决议的基础是张浩①和刘长胜②向政治局委员所作的情况报告。他们俩人是在我的请求下，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协助下派往瓦窑堡去的。他们所谈的内容有：1,1935 年 6 月，我因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草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的报告与结束语；2,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中涉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那一部分。

第三，自从你在瓦窑堡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已经进人第九个年头了，可是报告的原文仍然没有发表。谁知道你那时报告了些什么？③　因此，干部怎样能够相信你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声明呢？”

“是的，确实是这样。但是除了如何迫使他们相信这一点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坚持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今天才来谈谈心。

不过我还要考虑一下。也请你帮助我想个办法。今天不多谈了。你有病，谈话久了，会使你疲倦。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

有关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向别人讲。”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追求的仅仅是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他是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野心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进行活动的。

一些干部对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的言行，给予了准确的评价，他们说：“毛泽东是个大政治骗子。他在‘整风’过程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场骗局。”或者说：“毛泽东，这真是一个无原则、无良心、无道德和无羞耻的人。正是他的这种‘四无’作风，确实应该受到无情的整顿。”

正像后来我知道的那些事实所证明的，毛泽东决定“谈谈心”，不仅是因为干部强烈反对“整风运动”，而且也是由于在这次见面前不久，季米特洛夫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我的立场。这封信被毛泽东扣压并隐瞒了。毛泽东当然知道季米特洛夫当时领导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季米特洛夫的这封信使毛泽东对整个“整风运动”慌了手脚。因此，同我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就宣布“抢救时期”的结束与“翻案和恢复名誉时期”的开始。

第三次谈话中，毛泽东被迫公开承认，他反对列宁主义和提出“毛泽东主义”是不对的；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发表由他捏造的关于王明的两次“机会主义错误”的论断是不对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次谈话是于1948年12月18日在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进行的。从1948年10月算起，这次谈话是第五次，它引起了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极大注意。请看这次谈话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说：

“王明同志！我同你已经谈过四次话了，我们交换了意见，今天我想请你谈谈与整风运动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关于列宁主义、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等问题。如果我在听取了你的意见之后，觉得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就准备改正所犯的错误。”

我回答说：“这些问题，你在1944年4月同我的谈话中实际上已经讲了，正如谚语所说，‘解铃须用系铃人’。你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就改正吧。何必问别人的意见呢？一旦他们和你发生了意见分歧，你也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你听到他们的意见，不仅大发脾气，而且迫害人家。”

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可以向你保证，在这方面我有了很大进步。我不仅不生气，而且准备改正错误。”

“那好吧。”我同意说。“我们就来谈谈你提出的问题吧。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你记得，还是在‘整风运动’的准备时期，我就没有劝你去创立毛泽东主义和反对列宁主义。因为这一切不仅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于你自己。对这个问题，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我正在考虑究竟怎么办。但是我还没有决定。必须再想一想。”毛泽东回答说。

我继续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政治路线问题。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你断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因为似乎我在反对立三路线的一本书①中曾经指出，三中全会没有批评立三路线的某些右倾理论观点。为了这个，你说：‘既然王明说，立三路线中还存在右倾观点，那就是说，他自己比立三路线更左。’　　现在我问你：难道列宁主义者不曾批评托洛茨基主义，当他们强调这条政治路线形式上是‘左’，而内容上是右的时候？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比托洛茨基更‘左’吗？

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极‘左’的。同时他对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与可能性的看法又是极右的。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它的信中称立三路线为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

为什么只能指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不能指出他在理论上的右倾观点的错误？要知道李立三不仅命令中国红军进攻大城市，不仅在国内很多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不仅主张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它们的武装力量援助这样的‘起义’，而且他还主张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都同时起来支持中国的‘起义’。难道我在自己的书中，难道四中全会在它的决议中，对李立三这些极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没有严加批判吗？难道我和四中全会还曾提出，要从月球或者火星上也派军队来帮助中国革命吗？不然怎样能够说，四中全会的路

线是‘王明的路线’，而且王明的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呢？”

毛泽东回答说：“关于四中全会的错误政治路线问题，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刘少奇的发明。我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点，我是不对的。”

我继续说：“第三个问题，就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间题。1937 年 11 月 29 日，我从莫斯科到延安，在 12 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顺便谈了以下情况：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并建议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也说过同意这两个口号。

但是，在这个报告以后，我在自己的文章和报告里再也没有提过这两个口号。这不是由于我认为它们是不对的，而只不过是没有机会提到它们。从 1937 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起，直至 1938 年 10 月六中全会，我一次也没有听到你或者刘少奇对这两个口号的任何意见。我在六中全会发言以后，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起草了六中全会决议案，便离开了会议，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为的是在武汉刚刚陷落后，在抗日战争和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代表我们党向人民讲清我们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说明我们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团结的观点，说明我们坚持抗战到底并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见解，支持国民党的抗日派，反对公开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卖国集团。可是少奇同志，趁我离开之际，在全会上宣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正确的；而‘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则是错误的，因为这同‘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是一样的。

现在请允许我间你：按着少奇的说法，结果就是“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等于‘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所以是不正确的；但同时他又说‘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按着他的逻辑，这就等于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口号)是对的。难道天下竟会有这样的逻辑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党在抗日救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也就是我党在这一时期的总路线。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特定条件下，把国内除亲日势力以外的各阶级、党派、武装力量、政府、民族、群众团体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党把这一历史时期看作在全国范围夺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准备时期。

因而‘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意味着党使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全部活动服从于它的这一政策。‘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意味着党通过它的这一政策实现它在该历史时期的全部活动。这就是我过去和现在对季米特洛夫所提议和我所同意的这两个口号的理解。

究竟为什么少奇在党的这项政策和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画上等号？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理解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这正是由于他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蒋介石和阎锡山混为一谈。按着少奇的这种解释，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政策，难道还能想得出比这更荒谬的说明吗？

至于少奇的以下论断，即在中国，据他说来，没有像法国人民阵线委员会那样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所有党派，通过它就可以用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种论断是不

符合实际的。其实，在中国，虽然形式上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员会’，但是有国共两党委员会。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与巨大力量。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在中国没有第三个人数众多的强大政党。有几个小的党派，其中左的跟共产党走，而右的跟国民党走。因此，如果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就某个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等于在国内各党派之间达成协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大家知道，当时两党委员会有以下成员：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除我之外，有(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有陈立夫、张冲、康泽和刘健群。更重大的事情，我们直接和蒋介石谈判解决。

此外，中国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代表共同参加的国民参政会。这个会，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员会的作用，是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团体之间直接接触与谈判的地方。

因此，少奇关于中国没有各党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组织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涉及共产党、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全部问题，以及与我党有关的所有其他问题，都通过两党代表的谈判加以弄清。正像蒋介石所知道的，这些问题，不与共产党谈判就不能解决。至于阎锡山及其他地方实力派，他们尤其清楚，不与共产党谈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因此，少奇关于蒋介石和阎锡山不会采取同共产党谈判的办法以解决问题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少奇的这些论点，在我离开六届六中全会去重庆以前就讲出来了，那我会立即向他说清，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既不符合列宁关于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也不符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

1938 年底，我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你对我说：‘我在六中全会作的结论纠正了少奇的说法。’你还说：如果谁认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好像应该理解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是不对的。大家知道，王明同志任何时候也没有坚持过这样的意见。

我那时向你说明，你的这个纠正不明确、不彻底。第一，你现在向我说，王明任何时候也没有坚持这样的意见，但是在六中全会的结论中，你没有谈到这一点。第二，你没有说清，究竟是谁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究竟是谁坚持呢？正是少奇自己。正是因为他错误地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政策混为一谈，他才能说，‘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于‘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可惜，你那时没有指出少奇同志的这个错误。第三，你既没有说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及目的是什么，也没有说清‘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少奇的讲话和你的结论，只能在同志们中间引起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混乱不清。你应当考虑一下，如何纠正这一点。

你当时回答我说：‘我们今天交换意见之后，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再也没有意见分歧

了。什么时候有机会，我要按照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再向同志们解释一次。’可是‘整风运动’时，你突然宣布这两个口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时我因为中毒而病得很重，所以无论是解释还是争辩都没有任何可能。这个问题，你现在怎么想呢？"

毛泽东回答说：“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

少奇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是按照我的指示讲的。‘整风运动’时宣布这两个口号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我自己主动搞的。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

我对他说：“毛主席，你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这是一个进步，我真诚地欢迎你的进步。”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

“难道在 1944 年 4 月那次‘谈心’时，我没向你讲清我的意思吗？！要知道，如果承认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如果承认你的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毛泽东主义，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你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追求一个主要的目的：你至今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惟一指导思想，你仍然还想恢复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这是办不到的！在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规定。难道你就可以不承认这些？！至于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那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我驳斥了他的一切无稽之谈。我和他又争论了两个来小时，可是毫无结果。我们争论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我一再想说服他，最好回到我们开始谈话时对问题所抱的态度——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什么事情上你过去是正确的，你仍然是正确的；什么事情你过去是不正确的，就承认自己不正确。在所有问题上，都要从一切服从真理，一切服从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一原则出发；这就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者应当持有的立场。而他却一再地解释，他也不否认，在反对列宁主义并把两次“机会主义路线”说成是王明的路线等问题上他是不对的；但是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他一定要把党的历史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他只能从中选择一种办法；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就选择了后一种办法。

我们继续争论着，这时候孟庆树进房来对我说：

“我找你到处都找遍了，原来你还在这里争吵。我们还是回家吃晚饭吧。”

这时，一直坐在房间右边的角落里听我们争论的江青，连忙走出来说：

“孟同志，你来了，这太好了！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你抓住你的，带他吃晚饭去吧，我也抓住我的去吃晚饭，免得他们再斗下去。”

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由此可见，甚至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整风运动”时他反对列宁主义和伪造那些好像是别人执行了“错误政治路线”的行为是不对的。他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完全是有预谋的。

由此也应得出结论：毛泽东是极端自私的野心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不能把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当作最高利益；他过去和现在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真正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他愈陷愈深。这就是为什么他犯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愈来愈大，性质愈来愈严重，而且他愈走愈远，一直走到完全不可挽救的地步，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

第四节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及其少数追随者，至今仍在自欺欺人，百般吹捧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奉为反映“毛泽东革命文艺思想和路线”的经典著作，以便使毛泽东成为文艺问题的惟一权威。不仅如此，在“整风运动”时期，以及在“文化革命”以前，毛泽东把忽视他所提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看做是最大的罪过。他根据这一点来攻击二十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随后便对他加以镇压。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篇讲话，不过这根本不是 1942 年 5 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有着极其大量错误的原文，而是经过不止一次修改的、1953 年在他的《选集》第三卷中发表的那一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毛泽东不能推脱、不能说人家批评他的文章是最初发表的，又没有完全写好的著作。

一、毛泽东的诽谤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违背过去二十年来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事实，指责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首先，毛泽东给革命文艺工作者扣上“大帽子”，指责他们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基本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其次，毛泽东指责他们还没有搞清“如何去服务”——“普及还是提高”的问题，还不明确“文艺统一战线问题”，还不明确“文艺批评”问题。最后他指控革命文艺工作者犯有很多“思想上的错误”和“作风上的错误”。

毛泽东还用另外的种种理由诽谤党内外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比如他说，许多共产党员好像只是“在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人党，甚至完全没有人党”；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不大清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他们都脱离群众，不同情工农兵，所以不能创作出关于工农兵的作品。“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正像毛泽东接着断定的，他们不懂得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他们不懂得应该歌颂谁、暴露谁；他们甚至不懂得“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和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解放区”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得出结论，必须在革命文艺工作者中间开展“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装模作样地肯定，他所说的只是延安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可是事实证明，实际上他猛烈抨击的是全国的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他不仅在解放区工作人员中开展了“文艺界整风运动”,1943 年他专门派胡乔木去重庆。胡乔木在重庆召集八路军的代表和文艺界的党员干部，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讲话》开展“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以便“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

二、用历史事实驳斥

上面提到的、毛泽东毫无根据的指责，经不起与历史事实的对比。例如，他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主要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就是说似乎他们不懂得文艺应该为劳动人民服务。这种指责并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证实。历史事实证明的是以下一些情况。

“五四运动”(1919 年)时期发生的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接受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及俄罗斯革命文学影响的结果。1921 年夏，在列宁的支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文艺先驱，一个个逐渐都成了共产党员。

因此，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和工作骨干的革命文学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家本身，则都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的战士。自然，这样发生、发展的革命文艺运动，不能不把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革命文学运动的先进代表人物，还在二十年代就从理论上认识了并从实践上注意了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个基本问题。请看一些实例。

1.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郓代英、肖楚女等，就在他们的文章中强调“文学应发挥它的革命武器作用”，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他们认为，作家和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须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

2，就在这个问题上，蒋光赤写了这样一些著作，如《无产阶级与文化》①、《关于革命文学》、《俄罗斯文学》等等。《关于革命文学》一文指出，“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文学要暴露旧社会的罪恶”、“促进新势力的发展”。

蒋光赤不仅宣传了革命文艺理论，而且按照革命理论进行了创作实践，尽量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不同时期的革命群众运动。

3.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里主张“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而在《革命与文学》一文里，他不仅表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而且号召从事文学的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

4.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②一文中，提出关于文学应该“注意社会问题，同情‘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

①原文如此，应为《无产阶级与革命文化》。——译注
5.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里也主张“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

为“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而斗争的要求，不仅反映了上述作者的努力方向，而且也表现了整个那个时代革命文艺的基本方向。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普及，在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二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许多革命代表人物已经在新文化和新文学领域中从事实际的启蒙活动。他们为工人和城市其他劳动人民举办夜校，在农村里开办学校，出版文艺通俗读物，向广大听众发表演说，普及科学知识，他们演剧，举办音乐会，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从而为文艺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新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1925-1927 年大革命时期，劳动人民大众的文艺运动，是总的革命运动中的一股洪流。二十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困难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使文艺有助于工农大众的斗争，而作了更大的努力。

1930 年 3 月，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并在它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核心是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①，而鲁迅是“左联”的主席。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左联”的理论纲领公开宣称：“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中‘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这个纲领的后面附有行动纲领和工作原则。行动纲领的要点是：“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工作原则是：

“(l)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机构。

(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

(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

(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

(5)从事产生新生阶级文学作品。”①
左翼作家联盟根据它的工作纲领与原则，在成立的六年期间(1930 年 3 月一 1936 年春)，出

版了刊有不同体裁文艺作品的杂志。“左联”的成员，不仅写了大量反映工农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同时也写了很多形式上通俗易懂的、歌颂工人阶级的诗歌与诗画；其中有一些，由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名歌手、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聂耳及其他音乐家谱成歌曲，成为国内外驰名的革命歌曲。此外，还写出了很多以工人区为演出对象的剧作；为了进行这样的演出，成立了“工作队”和流动演出队。

为响应中国共产党以动员与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为目的而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文艺界也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1936 年 5 月一 8 月，在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在其他文艺工作者中间，就“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且出现了意见分歧。但是，各个方面的文艺工作者，遵循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最终还是取得了一致。因此，在左翼作家联盟停止活动之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其骨干由左翼作家组成。这个协会，对抗日救国运动、对服务于劳动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 年 3 月，在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时期，在中苏友好的形势下，于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后成立的还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中华抗敌协会等。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不仅提出“文章下乡，文章人伍”的口号，而且成立了许多“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战地服务团”、“抗敌文艺工作团”等等，派往各个战区与农村。协会在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事业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在使劳动人民参加文学创作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同时，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设立了第三厅，在敌军中开展宣传工作，说明抗战的目的及意义。

无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是上面提到的第三厅，都是以中共党员和党外革命文艺活动家为领导核心。在四十年代以前的时期里，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机会，不顾反动当局的禁止和捣乱，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写作并出版了许多大众化的诗歌、歌曲、电影剧本、采访报道、短篇小说，并创作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美术作品“国画”、抗战题材的故事片。这个时期，成立了各种青年文艺宣传团体，无论在大后方的还是在前线的工农兵学和其他各阶层人民中间，他们都采取了大规模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措施。这些措施，在提高人民反帝的民族觉悟和提高人民的抗战士气上，在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上以及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进行抗日斗争、揭露力图破坏抗日阵线的国民党亲日派和反动派的种种阴谋诡计的行动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措施，在提高工农大众的阶级觉悟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过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苏区，以后在整个解放区，党内外革命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宣传机构、政权机关的教育单位及部队的政治部门一道，不仅在工农兵大众中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工作，而且在他们中间组织了各种文艺团体。因此工农兵都愈来愈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文艺运动。

比方说，从 1937 年秋八路军出发到华北抗日前线到 1942 年“整风运动”前夕这个时期，在华北解放区活动的有“太行山剧团”、“戏剧社”等等这样一些专业艺术团体。开办了民族革命艺术学校、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学院，它们培养了大批的创作人员。

这些创作人员开展了农村的文艺工作，帮助农民组织了农村演出小组和文艺训练班。他们也成立了战地演出组，其中有“‘新时代’剧社”。到了 1940 年，在太行山区经常活动的有 100 个组织得很好的农村演出小组;；1942 年初，冀中农村演出小组的数目达到了 1700 个，而在衡山地区，有 1400 个农村戏剧和歌舞团体。至于抗日歌曲，那就遍及每个村庄。不但解放了的地区，而且游击区都成立了群众性的演出组织。他们在敌军中开展了反帝反战的宣传。

最后，必须指出，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与政工人员，在异常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为了保持战士们的高尚情操和人民胜利的信心，加强军民团结，同样利用一切可能，在部队和人民中开展文艺工作。在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的统治区里，富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中党和非党的代表人物，不顾极端残酷的恐怖环境，采取各种文艺形式，长民众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些人写作并传播了各种体裁的抗日反满的作品，其中揭露了日满统治的血腥黑暗的现实，描写了东北人民和武装力量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进行抗日反满斗争的英雄业绩。

这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一切，发生在 1942 年以前，发生在毛泽东的(讲话》出现以前。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某些著作的作者——这些著作是在五十年代按照毛泽东的指令写成的，并且宣传了毛泽东捏造的以下说法：似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前半期”是在“毛泽东主义者”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鲁迅的领导下进行的；而“后半期”，就是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则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甚至这些作者，也不能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上述的具体历史事实了。

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关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他的《讲话》以前好像不懂得“为什么人服务”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断言，似乎蒋管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能够或者甚至不愿意同工农兵接近，不同情他们，因此也不能写出有关他们的作品。这样的指责，正在被真实的历史事实所推翻。

真实的事实证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大量叙述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现在举出其中一些作品为例(以其发表先后为顺序)。

叙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

鲁迅在短篇小说《一件小事》(1921)年)中，歌颂北京一个普通人力车夫的高尚品德。

田汉在独幕剧《午饭之前》(别名《姊妹》，1921 年)中，叙述在和丰火柴厂做工的张家三姊妹的生活和斗争。他的另一个著名剧作《顾正红之死》(1925 年)，展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反帝斗争，描写了“五卅”运动时日本人开办的纱厂工人领袖顾正红之死。

郁达夫在描写烟厂女工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描写人力车夫的《薄奠》(约在 1923 年)中，揭示了工人和劳动人民的高贵品德。

蒋光赤在“四一二”政变(1927 年)前夕发表的中篇小说《短裤党》中，描绘了响应革命军北伐的上海工人起义这样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郭沫若在《电车复了工》一诗中，歌颂上海工人的英勇精神和坚强意志并得出工人阶级终会最后胜利的结论。

田汉在剧本《火之跳舞》(1928 年)中，叙述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殷夫写了《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等长诗。殷夫作为一个亲身参加青年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的年轻诗人，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和它的光明未来。

田汉在独幕剧《梅雨》(1931 年)中，描述了居住在上海贫民区的纱厂工人、其他工人及失业工人的困苦生活和顽强斗争。

田汉的剧本《月光曲》(1932 年)，说的是上海外国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

耶林在短篇小说《开辟》中，叙述了由上海失业工人组织的抗日志愿军。

舒舍予(老舍)在中篇小说《骆驼祥子》(1935 年)中，、描述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失去父母后，为了挣钱糊口而进城去的情景。

他当了人力车夫，跑了许多路，流了汗，才挣得了一部属于自己的车子；可是正当军阀混战，他连人带车一起给大兵抓走了。

夏衍在短篇文艺作品《包身工》(1936 年)中，具体、生动、直接而又逼真地描绘了被骗到纱厂来的贫苦农家出身的女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夏衍愤怒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主子们怎样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惨无人道地剥削压迫这些包身工的情景。

柯仲平于 1938 年写了叙事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

这首诗，是根据这个大队工人的口述而写的。诗中叙述的是队长共产党员李阿根及其他同志的英雄事迹。

张天翼在短篇小说《迁居之后》中，对被压迫的工人的孩子们寄予无限同情。

与此同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有许多非常流行的歌颂工人阶级的歌曲。例如二十年代瞿秋白写的(赤潮曲》，歌颂自由的劳动和未来的世界大同。

一些歌曲的作者不详，比如《农工歌》、《青年工人之歌》、(铁工歌》等等。这些歌曲也受到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在三十年代初期谱写的陈瑜①的《大路歌》，蒲风的《码头工人歌》，以及石灵②的《打砖歌》(聂耳曲)，曾经流行于国内外，直到现在人们还在歌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作家创作了很多描写抗日救国运动的歌曲，这些歌曲是家喻户晓的，并且受到了全国工人和农民的高度赞扬。此外，在二十至三十年代，许多优秀的苏联歌曲被译成中文，这对中国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教育起了很大作用。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描写农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曾多于描写工人与士兵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因为很多作家本身是来自农村的。这里只举某些作品为例。

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1919 年)中，既歌颂了农民，又歌颂了煤矿工人。

鲁迅在短篇小说《故乡》(1921 年)中，描述一个农民闰土的悲惨命运：“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作者表示希望新的一代将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1921 年)一诗中，塑造了农叟和牧童的形象，他们憎恨给人民带来浩劫的罪恶的战争。

鲁迅的中篇小说《祝福》(1924 年)的女主人公，是纯朴、勤劳、善良、贫苦的农村妇女祥林

嫂，她成了饥饿与封建道德的牺牲品。

在二十年代初期，在《小说月报》杂志上，有许多作者描写了农村的景况。例如许玉诺在(一只破鞋》中描述河南农村兵匪之患；田言的《雨滴集》，叙述的是农村的艰苦生活；在王任叔的短篇小说《疲惫者》中，对浙江东部农民的生活作了描述；王思站在短篇小说《偏枯》中叙述一个贫农怎样为了不致饿死而把自己的孩子卖掉。

郭沫若在 1928 年写的《我想起了陈涉吴广》①这一作品中，表达了农民中还会出现新的陈涉吴广的信念；他写道："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是我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蒋光赤在《田野的风》(1930 年)中，生动地描绘了 1927 年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情景；叙述了农民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农会，开展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等等。

洪深在 1930-1931 年写的剧作《五奎桥》、《香稻米》中，描述了地主恶霸的横征暴敛，农民的坚强、正直，农民起来反对残酷的压迫剥削，为争取人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丘东平是海陆丰农民起义的参加者。他在《通讯员》(1931 年)中，生动地描绘出海陆丰的农民起义，讲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意识上发生的变化。

丁玲在《水》(1931 年)中，勾画出一幅在旧中国为了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同剥削者进行斗争的农民遭受自然灾害——当时遍及十六个省的水灾、饥谨和其他无数苦难的情景。

沙汀，人们都称他为农民作家。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为农村和农民而写的，例如《土饼》、《凶手》和《兽道》(三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还乡记》、《困兽记》等。这些作品反映出农民与反动势力——地主士绅之间的矛盾，同时展示出农民的团结、他们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不断壮大的队伍。

茅盾在《春蚕》、《秋收》和《残冬》(1932-1933 年)中，说明旧中国农民在地主士绅的沉重压迫下，不管他们是否种田或养蚕，不管收成是好还是坏，都是要挨饿的。作者说明，年轻一代的农民如何觉醒起来，为反对多年的压迫和无权的地位而斗争。

吴组缃在 1933-1934 年发表了《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这些作品描述了地主恶霸的贪婪无耻以及饥饿破产的农民觉醒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情景。

丁玲在《奔》(1933 年)中，叙述的是，农民怎样受不了地主的剥削，跑到上海去找工作，在那里同样找不到工作，但是却得到了斗争经验。工人们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时候，你们就向你们的主人要。而我们没有工作干的时候，向资本家要。”

叶紫的《丰收集》里六篇作品中的四篇——《丰收》、《火》，《电网外》和《乡导》(1933-1934 年)，是为家乡农民而写的。叶紫看到了他的父亲和姐姐这两个共产党员，怎样在农民中间开展革命工作并且牺牲，看到了他故乡的农民怎样为生存而斗争，于是他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叶紫就像亲身处在他的作品人物中间、同他们一起战斗那样，满怀战斗激情地写下了这些作品。在短篇小说《电网外》中，王伯伯的两个儿子加人红军，老伯伯在吃了一些苦头之后也找红军去了。在《乡导》中，刘嗡妈和她所有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三个儿子被反动派杀害，刘嗡妈也为革命牺牲了，但是她还是为儿子和同志们报了仇：她答应给敌军带路，把敌人引进了埋伏，敌军遭到了惨重的伤亡。

叶紫在 1935-1936 年还写了收人《山村一夜》集子中的六篇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星》。这些作品，也是描写家乡一带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

肖红在《生死场》(1934 年)中，描写了“九一八”事变(1931 年)后中国东北农村被烧杀抢掠的情景。日本帝国主义把整个农村洗劫一空。农民们拿起武器参加了人民革命军。

阳翰笙在三十年代写了剧作《李秀成之死》。剧中歌颂了雇农出身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天才统帅、民族英雄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上演他的剧时，作者亲自扮演了李秀成的角色。他的《深人》，揭示了 1928 年后农村斗争激烈的原因。

田汉在剧作《洪水》(1936 年)中，描述了水灾区农民的生活和斗争。

田间在抗战前夕创作了长诗三部曲《中国农村的故事》(《饥饿》、《扬子江上》、《去》)；诗中叙述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和殊死斗争。

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不少专门描写士兵的作品。例如葛琴在《总退却》中，讲述上海“一二八”

(1932 年)抗战时发生的国民党士兵转而拥护抗日的事件。

叶紫在《夜哨》(1933 年)中，真实地描述了国民党军队”剿共”时，如何对人民残暴地使用恐怖手段，烧杀抢掠，以致引起正直的士兵们的反抗。班长王志斌、副班长李海三、战士赵

德胜等举行了起义，释放了被俘的红军和穷人们，并一起向敌军营地进攻。

肖军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4 年)中，叙述由共产党领导的，由工农兵学组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队伍，怎样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英勇地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小说中展现出东北人民革命军怎样回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领导了人民的抗日斗争。

丘东平，1931 年开始创作活动。他少年时代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起义，后来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在新四军工作，1941 年牺牲于战斗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描述前线战斗的作品。比如说，在《红花地之守御》中，讲的是由三个小分队共 185 人组成的革命队伍，如何隐蔽在红花地阵线偏僻的森林中，以突然出击使敌人措手不及，打败了敌人两个团。引人人胜的是保卫小石桥的六个战士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再一个是士兵，其余三个是师范学校的学生。

他们战斗机智勇敢，消灭了 30 个敌人。

在短篇小说《友军的营长》(1990 年 12 月)中，叙述的是国民党部队一个营长的悲剧，讲他如何同共产党的革命军队共同抗日，如何能够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突围，带出并保护了两个连的战士，因而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司令员的表扬。但是，当这个营长回到自己部队的总指挥部，就被枪毙了，因为他“守土失责”。

《漂武路上的故事》(1941 年 6 月)，叙述新四军某部一个参谋怎样营救了整整一个团的盟军(国民党军队的抗日部队)，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他们虽然有时被迫同日本人作战，但常常是与人民为敌的。

田汉在中篇小说《卢沟桥》(1937 年)中，描述了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士兵怎样起来抗日。这是“七七”事变的开始，也是 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作者还描述了学生和劳动人民对抗日部队的支援。

张天翼在短篇小说《第二十一个》中，描写国民党的一支反对反共内战的部队中士兵的觉醒。他的《最后列车》和《路》，也是写士兵的，他们要求组织起来抗日，反对卖国的军官。而在短篇小说《仇恨》中，作者描绘了激起农民仇恨的兵灾浩劫的情景。

周文在《烟苗季》(1936 年)中，描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营私舞弊的高级军官们是怎样争权夺利、践踏士兵的。

艾青在《他死在第二次》一诗中，讲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伤兵的故事。

此外，黑炎的《战线》，是专门描写北伐的。耶林的《村中》，讲述的是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时，怎样残酷地轰炸农村，扫射农民。

除反映工人、农民或者士兵生活的作品外，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曾经创作出了不少既描写工农兵，同时又描写其他劳动人民阶层代表人物的作品。

大家知道，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曾经出版了许多描写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描绘出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图景。现在我们将仅仅提到其中的一些作品。

瞿秋白在《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1920 年末一 1922 年末)里，热烈称赞俄国工农兵的斗争，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并打败了帝国主义干涉者及白匪军。这本书使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能够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解放人民及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中的作用。

邹韬奋写了四卷《萍踪寄语》(1933 年夏一 1935 年夏)，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来说，这是文艺报道体裁中的第一流作品。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他描述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大众的状况，在第四卷中，他揭露了北美金元帝国的状况，这些作品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谴责。在第三卷中，他描述了在列宁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是一曲社会主义的颂歌。

这些书，就是对今日中国来说，也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陶行知也写了许多献给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因此他不仅被称为人民的教育家，而且被认为是人民的诗人。可惜，瞿秋白、邹韬奋和陶行知的文学遗产，都被毛泽东化为灰烬，现在中国的劳动人民与青年是无法接触到了。

其他的革命文艺家也写了不少歌颂伟大的列宁和十月革命、向中国人民介绍苏维埃国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对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教育和传播苏联经验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上面提到的描写工农兵的作品，曾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其中一些作品已译成其他各种语言，并得到国外读者的好评。进步的中外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同样对这些作品给以很高的评价。

这些作品，很大部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其余部分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或者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

当然，这些作品，就提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就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来说，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作者而主题相近的作品，也不能不有所差别；这都决定于创作这些作品的时间、地点及条件。

这里提到的仅仅是二十至三十年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的部分作品，即三十位革命作家的七十多篇作品。但是它们已足以证明，毛泽东诽谤性地指责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文艺家没有能力，也不会，甚至不愿意创作关于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是毫无根据的。

毛泽东如此指责的另一个“理由”，是他的以下这种说法，即似乎只有描写工农兵的作品才能为工农兵接受、才能为他们服务。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说明，毛泽东不了解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及其亲密的同盟者——农民，以及士兵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作品。试问，难道揭露帝国主义者的寄生生活、揭露他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的作品，描述满清王朝、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描述蒋介石集团的作品，抨击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作品，反映日本侵略者及其占领区的傀儡们残酷镇压、剥削和践踏中国人民的事实的作品，不能为工农兵接受，不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吗？莫非工农兵只须知道自己，而不应了解自己的敌人吗？难道两千多年前天才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这一论文中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不恰恰适合现代革命运动中工农兵的需要吗？

倒是正好可以这样来提问：难道描写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学生的生括和斗争的作品，不能给工农兵以必要的知识吗？

大家知道，茅盾在长篇小说《子夜》中，指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没有出路，驳倒了托洛茨基分子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可能长期和平发展的谰言，同时描述了工农兵的斗争。曹禺在他的剧作《日出》和《雷雨》中，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破产，资产阶级家庭的分化与没落，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给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巴金在他的长篇小说《家》中，揭露了封建官僚家庭的堕落腐朽，它对青年人精神状态的有害影响，并且明确地指出，进步青年只有与这样的家庭决裂，才能找到出路。这样的作品，还可以举出很多。

难道这些作品不能为工农兵接受，不能为他们服务吗？

十分明显，能够为工农兵接受，能够为工农兵利益服务的不只是描述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文艺作品。

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毛泽东也是这个例子的见证人。1940 年，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演出曹禺的话剧《日出》和《雷雨》。它们受到了党和军队干部的热烈欢迎。

要知道，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都出身于工农。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反应；毛泽东也不能不记得这一点。

可见，毛泽东的这个"理由"是毫无根据的。

毛泽东对二十和三十年代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严厉指责之一，与他们写过很多反映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有关。但是，这本来不应当算作罪过，而应当算作功绩。他们写出较多这样的作品，是由具体的主客观历史情况决定的。主观情况是，革命作家本身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行列，原来都是学生。他们开始写作时，主要只能写他们所熟悉的人。客观情况是，80%--0%的中国劳动人民都是文盲或识字很少。没有文化教育工作，没有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劳动人民中间传播文化艺术，任何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宣言，都将是空谈。但为了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革命文化的宣传者，首先必须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成为革命文艺的捍卫者，教会他们了解劳动大众的利益。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指出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情况正相符合。因此，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创作能够教育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青年代表人物的作品；否则他们会成为一小群无兵之将，不能进行任何战斗。以后，当他们参加革命运动，成为越来越内行，更多地了解到劳动大众的生活和斗争时，他们便着手创作了越来越多的反映这种生活和斗争的作品。

换句话说，由于这一点，第一，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吸引到革命运动、党团队伍中来，得到了接近工农群众的机会；第二，培育了一支真正能够使革命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力量。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对这个问题的指责，是出于主观的臆想，而革命文艺家解决这个问题，是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情况。

毛泽东把以下一点当作他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主要的"理由"，即像他所认为的那样，革命文艺运动过去一向遵循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方向，所以不符合毛泽东制定的"工农兵的文艺方向"。他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所追求的目的，是企图用某种个人的文艺方向来偷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从文艺的阶级方向来看，毛泽东制定的“工农兵的文艺方向”究竟是什么。

工人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而中国的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由此可见，按着毛泽东的说法，“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只能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混合的方向，而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者来看，文艺的阶级方向，不是决定于作者或者被描写人物的社会出身，而是决定于他们从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的立场去描写现实生活。

正是根据这一准则，文艺可按不同的阶级方向加以划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方向等等。

毛泽东向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求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呢？

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就这一问题指出：“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他给“人民大众”的概念又装进了什么内容呢？他在他的《结论》的第一部分中写道：“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人口 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张革命文艺工作者既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同时又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

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既持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持有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原则是毫不相容的，而在实践上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他的这种看法也不能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接受。

毛泽东在他 1940 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 1949 年 6 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文章中，扩大了“人民”这一概念的内容，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进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滥用他所篡夺的党政军最高权力，迫使革命文艺工作者执行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表的意见。这就是说，他们在创作文艺作品时，应既持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持有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考虑到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艺领域里，在毛泽东的方向和立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和立场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时隐时现的尖锐斗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的文艺方向”这一口号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主张，正是由他在阶级问题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混乱而又完全错误的观点所决定的。这不仅表现在文艺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确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马克思主义准则，以及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在社会生活与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在他专门研究阶级分析问题的著作中可以见到。这些著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 年)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一文中由他撰写的《中国革命的动力》一节。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上述文章的前两篇中关于阶级分析的结论，以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和《在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 年)的错误，是在中国苏区土地革命时期出现政治错误的主要原因，也是后来全国土地改革时，在更大范围内出现政治错误的主要原因。人们在分析阶级和社会阶层时，把真正的地主同不是地主的小土地所有者混为一谈，而把富农同富裕中农和一般中农混淆起来。因此，不论地富的土地，还是中农的土地，都不加区分地加以没收，而在分配土地时，则平均分配所有的土地，然后不断地进行土地的再分配，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种错误做法的后果是任意镇压，甚至把人处死。

在理论和实践上，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到主要地位，而把无产阶级的利益降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坚持在中国只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论点。这是他上述那些专门论阶级问题的著作中的第一篇和第三篇，以及其他文章(例如，在《向导》杂志上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 年)等等)里具有的根本性错误的直接后果。他对阶级的理解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错误，是他变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的最主要思想根源。

在毛泽东的实际行动中，以下事例最为明显地证实了上述的问题：他通过强制手段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先进代表人物，有计划地送往农村，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把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及世界和平运动当作自己的敌人，而把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当作自己的朋友。

反苏主义和反共主义，成了毛泽东内外政策的核心。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苏联的中学和军政学院毕业后，于 1945 年冬回到延安。毛泽东强迫毛岸英到他的好朋友、延安的大富农吴满有家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毛岸英对父亲的这种作为表示了坚决的抗议，公开说他父亲的出身是这种行为的社会思想根源(大家知道，毛泽东的父亲是大富农、大高利贷者)。毛泽东滥用他的权力，迫使他的儿子在吴满有家住了几个月。但是，在此之后，毛岸英还是对父亲和其他同志们声明："我没有向富农'学习'，我非常讨厌这个大富农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我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苏联学校培育出来的人。

我任何时候对此也不以为耻，而是反以为荣！"在父子之间发生的这场原则斗争中，当然，真理完全在儿子方面。因此，我永远对毛岸英同志保持敬意和美好的回忆。

此外，必须注意以下情况。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中指出："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可见，他

自己承认，他不仅是讨论“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而且提出他的新的文艺方向。可是，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完全没有涉及到文学在艺术方法或创作方法上的区别问题。对这个问题，全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早就明确地说过：“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他同时指出，“在浪漫主义中还必须把两个极端不同的流派区别开来”：“消极的浪漫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①至于现实主义，大家已经知道，它也有两种不同的流派：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毛泽东谈文艺方向(他实际上只是说文学方向的问题)时，完全没有提到文艺在艺术方法或写作方法上的区别这一事实，说明他完全不懂究竟什么是文艺方向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讲话》以前，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方向呢？

这就是在二十年代奠定了基础，三十年代已成为主导方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这个方向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初由高尔基开创的这个新的革命文学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十月革命以后，成为苏联文学的主导方向，而随后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和进步作家，包括中国革命作家的创作的主导方向。

因此，毛泽东以他的文艺方向来偷换过去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所遵循的方向这一企图，得不到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响应。

所以，这两种不同文艺方向之间存在长期尖锐的斗争，绝对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合乎规律的。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其他指责，那么，不仅本书的篇幅不允许对此予以详尽答复和说明，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它们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仅仅举出某些事实并就每一个问题作简短的说明。

毛泽东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说，他们好像不懂得“如何去服务”，即不懂得“普及还是提高”的问题。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首先，他把“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同“普及还是提高”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里他把部分当作了整体。当然，“普及还是提高”的问题，在“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决不能整个地包括文艺应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而毛泽东在提出“普及还是提高”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庸俗习气和局限性表明，实际上他也没有弄清这个问题。谁都清楚，在毛泽东提出他的指责的这样一些问题上，革命文艺工作者无论就他们的认识，还是就他们的事业来说，都比毛泽东站得高得多。他们考虑到中国 80%——90%劳动人民不可能阅读文艺作品这一事实，于是尽最大的努力，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使他们成为广泛普及革命文艺的“桥梁”。

毛泽东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不懂文艺统一战线重要性问题，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大家知道，二十年代的第一批革命文艺组织，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太阳社”等这样一些组织的成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达到观点上的一致，首先从开展理论讨论开始。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根据党的决定，各个组织宣布解散。党内外的左翼文艺家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以后(1936 年)，为适应革命运动的新形势和党的新政策，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同许多左翼作家一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而在 1938 年成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毛泽东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不懂“文艺批评”问题，这同样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他们对“现代评论社”、“新月派”、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所谓的“第三种人”，以及其他的反动文艺派别，进行了多么长期不懈的斗争。由于这一斗争，上述反动派别的阵地被摧毁了，它们的影响被消除了。同时，革命文艺工作者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整个革命文艺运动发展和组织中每一个成员进步成长的重要工具(虽然个别人有时在批评中犯了用词不当的错误)。新的革命文艺运动，就是在不断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三条指责，同样都是无根无据的。

如果毛泽东对各种“思想错误”与“作风错误”的指责，仅仅指的是少数人，而不是国内的所有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果他当时只是想要加以提醒和帮助，而不是制造所谓“整风运动”的借口，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注意这一切了。但是毛泽东把这些指责和他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其他种种玷污——把他们描绘成没有起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知识的人——高抬成他的“最高指示”、也叫做“毛主席指示”，根据这些指示，要求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进行无休止地“悔过”和自我谴责。这一切，当然不能不引起革命文艺工作者，不能不引起所有那些还具有正义感和辨别是非能力的人的愤慨和抗议。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很像旧时代的反动法官，他习惯于按这样的公式行事：在决定把一些正直的公民判为刑事犯以前，他早就确定了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惩治的办法，早就编好了“罪状”来列举每一个被指控者的“罪行”，然后靠严刑拷打逼迫被告人“承认”向他提出的每一条罪状，以此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毛泽东的理论错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最后，必须指出，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明了他在文艺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原理和原则有其“独特”的理解，表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并且表现了他对社会现象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态度。

为了证实上述第一点，可用毛泽东对文艺的历史分期和阶级实质的观点为例。毛泽东无论是在《讲话》中还是在类似《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其他著作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把文艺发展的历史时期同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他还认为，在对抗性的社会中只能够存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艺，而不能够存在为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文艺。

这样的见解，证明他不懂得以下的基本原理：文艺，正像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在它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特点和社会渊源，但是，正如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文艺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决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相一致。马克思在这方面写道：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①
可见，毛泽东关于文学时期的划分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些“观念”，也证明他不懂得在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奴役阶级的文艺和被奴役阶级的文艺。

关于这一点，列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列宁在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写道：“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也有这样两种文化，正如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有这样两种文化一样。”②
为什么每个民族的文化中，除了奴役阶级的文化之外，还有代表被奴役阶级的文化呢？列宁也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③
当然，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点也适用于文艺。毛泽东关于阶级对抗社会中只能有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服务的文艺，而不能有为工农服务的文艺的意见，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列宁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种“观念”，也证明他不了解阶级对抗社会中有两种不同文化和两种不同文艺的情况，即除了为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服务的文艺，还有为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服务的文艺。这不仅决定于：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队伍中能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们能够以艺术形式描绘他们出身阶级的生活、渴望和斗争，而且决定于，在压迫阶级中间也能出现抛弃本阶级的人们，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被压迫群众的生活重担和渴望。

所有这些，可以由不同国家的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生动而有教益的例子来说明。世界闻名的俄国文学巨匠 JI. H.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在他整整四十年来的创作中犹如镜子一般反映出了整个历史时期(从 1861 年农奴解放到 1905 年俄国革命)的特点。

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这样写道："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的特点。"①
为什么一个贵族，托尔斯泰伯爵能够成为俄国农民革命的伟大作家呢？对这个问题，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文中作了明确的答复："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①
这就是对于阶级对抗社会中的文艺性质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至于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大家已经知道，这些观点使他全盘否定任何文化遗产——民族的和外国的，因而在文化革命期间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这些罪行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胜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野蛮行径。

关于上述论断中的第二点，应该指出，毛泽东引证列宁著作，不过是为了达到他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目的，同时公开地鼓吹功利主义。

他在《讲话》中两次援引列宁的话。第一次，他在《结论》中首先提出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然后引用了列宁的不完整的句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结论》的第三部分中，当转到"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时，他又企图诉诸列宁的主张。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关于党的文学应该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
列宁把文学为劳动人民服务看做是为"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从而把党的文学的作用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即把党的文学的任务同党领导劳动人民以革命的方式改造国家的任务联系起来。但是，这仅仅是列宁阐述党的文学为什么是自由文学这一段中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只谈到党的文学服务的对象与意义。就在同一段中，列宁阐明："这将是自由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①由此可见，党的文学，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文学；它不断地把新生的、富有生机的革命力量吸收进来，这不仅保证党的文学有极其广阔的远景，同时也协助党不断扩充它的队伍。

列宁谈到科学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人运动的结合时，也高度地评价了党的文学的作用。他写道：“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②
可见，列宁全面地、原则地评价了党的文学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他要求党的文学工作者高度负责，并且使他们满怀热情和信心，这无疑会促进整个党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列宁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对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

毛泽东实际上抛弃了列宁对党的文学的所有评价，仅仅援引一些不完整的句子。就是这些不完整的句子，在毛泽东的叙述中也失去了它真正的涵义。毛泽东利用这些作为“根据”，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说他们不明确“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

例如，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就这样说：“列宁还在一九 0 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

这样，他便指责革命文艺工作者说，“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他还断言，“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作为打击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主要的借口。毛泽东把这根大棒打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头上。这根大棒是毛泽东亲手制作的，不过他故意在它上面贴上了列宁的名字，以便欺骗人们。不难明白，毛泽东援引上述那些不完整的句子，居心叵测地用伟大列宁的名字，为的是达到他的纯功利主义的目的。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从两个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论证了文学事业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的论点；另一方面，他论证了党的文学事业有它的特点的论点。他写道：“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接着他又阐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①
对这个问题的上述两个方面，列宁是辩证地，从它们彼此的有机联系中进行考察的。对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既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分强调。如果只讲文学事业同全党工作的共同之处而不讲其特点，那就必然会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

相反，如果只讲特点而不讲共同之处，那就必然会出现把文学事业与全党的事业人为地割裂开来的现象。这两种态度，不论对党的总的事业，还是对文学事业都是不利的。

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讲到第三个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时，引证了列宁的话，却完全不顾列宁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工作特点的论述。毛泽东这样做，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的。问题在于：列宁所指出的、对于党在文学方面的工作说来是最不适用的那些方法，毛泽东恰恰认为是最好的方法；按照列宁指出的、对自由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广阔天地”的地方，毛泽东却竭力确立军队式的领导作风。列宁主义的思想妨碍他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靠文艺界界“整风运动”确立对革命文艺运动的个人控制，以便能够任意指挥革命文艺工作者，并使他们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

毛泽东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他对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向来麻烦，同搞文艺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尤其麻烦。他们有过于敏感的头脑，他们最喜欢想人非非、说长道短、蹦蹦跳跳。必须把他们的作风严加整顿，使他们变成听话的人，使他们任何时候都再也不敢自己认为该想什么就想什么、该写什么就写什么、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只能去做吩咐他们做的事情……”

以下事实，雄辩地说明毛泽东对列宁及其著作的真正态度。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请博古给他找列宁有关文艺的论述。同时他说：“……整风时对知识分子演说很难。如果总是仅仅这样向他们讲，说什么毛泽东讲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去做，那是不会起到应起的作用的。因为毛泽东主义刚刚上台，他们还不相信它。必须把某个老牌货拉上台，比如‘列宁讲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去做’，那时，他们才会相信，只有那时，他们才不敢反抗……”

实际上，每当毛泽东往自己的某一著作中，加进一些他请别人为他选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时，他从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视为解决认识论问题和确定实际行动的指南；同时他总是仅仅利用别人的名义达到蛊惑性的目的或者企图给自己的话增添更大的分量和诱惑力。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煽起的激烈的反苏主义，那么，他号召运用苏联文艺的方法和经验，就是由那些狭隘功利主义的想法驱使的。

同样应当谈到，在“整风运动”中，当毛泽东公然用以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毛泽东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时，他在一些个别的场合“谴责”了托洛茨基。即便如此，他的动机和目的也没有超出他惯用的贼喊捉贼这套诡计的范围。

历史事实令人深信，毛泽东永远是功利主义者。盘算个人利益，是他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他不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掩盖真正企图罢了。不错，“整风运动”前，当他还没有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他极力把自己的目的伪装起来。但是，到了“整风运动”期间，他就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的功利主义也就表现得愈来愈露骨。

毛泽东在他的《讲话》的《结论》中竭力鼓吹功利主义，这不是偶然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他说，只是“我们，功利主义者，关心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利益”等等。看来他认为，这么好听的词句，会能帮助他粉饰一下自己的观点，人们会把他当作一种新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可是人们早已学会了听其言，观其行。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追查观点和行为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既然毛泽东公开宣称自己是功利主义者，那么，许多共产党员评价他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时，就从老功利主义中去寻找答案，并且转而找到反映美国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功利主义那里。老功利主义是十八世纪由英国人边沁创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伦理学说；新功利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美国人皮尔斯创立的、又在二十世纪由詹姆斯和杜威发展了的、叫做实用主义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另一方面，许多共产党员把毛泽东的言行同新老功利主义的论点作了对比。结果他们得出结论：毛泽东所鼓吹和支持的功利主义，接受了老功利主义的原则，是美国式的新功利主义，即实用主义。

比如说，毛泽东违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开展只符合他自身的、极端个人主义利益的“整风运动”，这是新老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原则的具体表现，新老功利主义认为，狭隘自私的打算、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是道德行为的主要动机，而“满足他自身利益的是个人……的真理”。毛泽东伪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历史、列宁主义的性质与作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历史，这是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认为只有符合个人私利才是真理的实用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千方百计地树立对他的个人迷信，赞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辱骂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预言法西斯德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必然失败”。这一切，也是社会学界从崇拜“伟大个人”(詹姆斯)和为资产阶级民主辩护(杜威)，到直接支持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种种实用主义观念的具体表现。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反苏的主张结合起来。这就是目前以“实证自然主义”形式出现的，主观唯心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主义相结合的新实用主义态度(C. 胡克)的表现。

无论老功利主义，还是新功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都是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派别。它们二者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迫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开鼓吹功利主义并自称为功利主义者，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特别是“整风运动”之所以成为“文化革命”的演习，正是由于从这一运动到今天，毛泽东的一切反动主张与活动都贯穿着功利主义。

试问：为什么毛泽东与历史事实相矛盾的、充满理论错误的《讲话》，当时在“文艺座谈会”上却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呢？要知道，不仅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而且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在延安的党的负责干部，政府、军队与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学校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问题在于，第一，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规定了“守则”：“对毛主席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而对挨整的人只能说坏的，不能说好的”；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一点，他依靠

的不是批评武器，而是武器“批评”。毛泽东只有利用这张“王牌”，才敢于在“整风运动”中采取此等行为、此等办法，在这种行为和办法之下，事实、理由、还有对事物的客观态度，都变得毫无用处。这种办法，只能用自命不凡到极点来加以解释。这正如鲁迅所描写的，在香港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待他的中国奴仆的态度:“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实质上，这是所有独裁者或暴君对待臣民们的作法和逻辑。因此，这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毛泽东不用这样的作法和“逻辑”解决问题，那么，他还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开展“整风运动”呢？

如果想要简要地分析一下毛泽东《讲话》的内容，那么，如同对于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一样，“似是而非”这一说法在这里是合适的。“似是”——这是那些没有弄清他所讲的东西的人们的印象；“而非”——这是那些弄清了这个问题的人们的结论。毛泽东正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叙述的蒲鲁东一类的人，只有本身弄不清楚这个问题的人，才会以为毛泽东是这个问题的专家。

只有在那些不大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问题的人们的眼里，毛泽东才似乎是“政治专家”；只有在那些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点的人们眼里，毛泽东才好像是“文艺专家”。

上述论点，用于评价哲学观点尤为恰当。毛泽东由别人帮助，用剽窃和根据别人著作来编写的办法写成的所谓“四篇哲学著作”——五十年代初的《实践论》和《矛盾论》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六十年代初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中的每一篇都有严重的错误：在理论方面，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错误；在方法方面，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错误。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不论提出问题，还是选用例子，都强烈地散发出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气味，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这些“哲学著作”，使他有可能在一些不是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人们眼里，看起来是个“哲学家”；可是在懂得这些问题的人们眼里，他至多不过是个一知半解的人。至于三十年代末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其中错误与幼稚的论断是如此之多，以致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人读了这一作品，恐怕要像常言所说的，简直要“笑掉牙齿”。这是因为，毛泽东和杜林一样，都属于同一类人。恩格斯曾揭露说，杜林是最喜欢写和讲他自己所不懂的东西的那种人。

毛泽东的《讲话》，为“论证”革命文艺工作者“整风”的必要性以及伪造中共党史准备了基础。《讲话》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借助于《讲话》，竭尽全力地空前残酷地打击革命文艺工作者，以便动摇他们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原则，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他们，并且尽量挑拨工农兵群众来反对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话》的动因，是企图达到两个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企图用一切办法败坏中国革命文艺的威信，否定二十年代业已奠定基础、三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的革命文艺运动的成就。这也是企图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的历史事实。可见，这是企图否定以下事实，即否定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俄国进步文艺和苏联革命文艺的直接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否定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五四运动”(1919年)开始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迅速普及的结果，否定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和全面帮助才取得了这一成就。

另一个目的，毛泽东力图证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从他的《讲话》开始的，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说成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创始人”。这一切，必定有助于实现他的要求，他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抛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并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主义”的文艺思想重新武装自己的头脑。

他认为，他能够以此迫使革命文艺工作者承认，他们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者，因此，往后在他们的所有作品中，必定要歌颂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正确方向的惟一缔造者，也必定要按照他在“整风运动”中编造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竭力地吹捧他。换句话说，他企图把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当作专门赞扬“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本人的御用文人，当作促进树立个人迷信的“吹鼓手”。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自己描绘成“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而把别人称为“贵族式的政治家”，称他们好像是在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和自我吹嘘：说什么我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毛泽东甚至强调说，“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看来，他当真地认为，只要他美化自己，诽谤别人，那么，被万能的咒语一般的《讲话》迷惑了的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就会立即成为《讲话》的新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所以，他在《结论》中郑重其事地说：“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的面貌……,,
但是，事与愿违，正是这篇《讲话》前所未有地表明了，他压根既不“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也不“懂得革命的政治艺术”，而且绝对不是像他自我标榜的那种“无产阶级政治家”，恰恰相反，却是“贵族式”的“腐朽了的政治家”。他通过这篇《讲话》，在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中间所能引起的只是对他的鄙视和反感。正是这篇充满奇谈怪论，充满矛盾和理论错误的讲话，在他和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在毛泽东加以迫害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反对的毛泽东之间的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四、略谈毛泽东的诗词

“整风运动”结束之后，毛泽东于 1945 年 9 月在重庆与美国和蒋介石谈判期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喜爱的作品《沁园春》(《雪》)一“词”①。他指望，这首诗将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赞许，将被评为杰作，并且人们将会奉献给他一顶“伟大诗人”的桂冠。他指望提高自己在文学界的威望，以便对革命文艺运动进行控制并使革命文艺工作者相信歌颂他的“伟大”与“功勋”的必要性。但是，结果又适得其反。除真正在他控制下的，不能对他提出批评的出版机关之外，其他所有出版机关一致指责这首诗，把它评为渗透了封建君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党内外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认为，这首诗渗透着封建君主主义思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共产党员的作品，认为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且甚至不能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因此，这首诗的发表，加深了把毛泽东同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隔开的鸿沟。

1957 年毛泽东在北京出版的《诗刊》杂志上发表了十八首诗。1964 年 1 月 4 日，他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十首诗。如果把他已经发表的其他一些诗和这些诗加在一起，总共是三十七首作品，其中有十二首诗和二十五首词。他每一次发表自己的诗，都更加扩大和加深了他与革命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鸿沟。这也是完全合乎规律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很多诗词的内容是不堪人目的：有一些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主义思想，如《沁园春》(《雪))一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和《北戴河》(《浪淘沙》)一词。其他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讲述死者魂灵升天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等。而在《答友人》一诗中，讲的是“两个天上的妃子”——古代帝舜的两个妾的魂灵如何降临人间，封建君主主义思想同神秘论和迷信交错在一起。有些人企图把这样的诗解释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其实大家都明白，决不能认为这些诗词是革命的，积极的或者哪怕是“无害的”

浪漫主义作品。正好相反，这些诗词只能属于反动的，消极的和有害的浪漫主义作品。有一些诗是反苏反共的，如《满江红》(1963 年 1 月)一词、《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1 年 11 月)、《冬云》(1962 年 12 月)等诗。此外，有些诗说明作者缺乏历史知识，例如把不周山的神话故事用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或者说明作者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念奴娇》(《昆仑》)一词；有一些诗是为了加强对他的个人迷信，并吸引青年去实现他那不可告人的勾当，如《水调歌头》(《游泳》)一词。至于艺术形式，应当指出，拙劣、生硬、空洞、牵强附会、脱离实际和缺乏美好的感受等等，是毛泽东的这些诗的特色。

毛泽东在四十年内(从 1920 年到 1960 年)写了三十七首诗词，其中没有一首是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没有一首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也没有一首是反映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生活和斗争的；没有一首是颂扬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和平运动的;没有一首是用来纪念英勇牺牲的党内外无数革命者和民族英雄的。甚至在关于红军《长征》的诗中，他完全没有表达出长征的政治、军事和历史意义，完全没有反映出以下基本事实，即在长征期间英勇善战和克服重重困难的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他只不过是把《长征》描绘成了令人开心的游山玩水。

毛泽东滥用党与国家的职权，下命令把诸如此类的诗词，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册地大量出版，不只用中文和少数民族语言出版，而且翻译成外文，同时利用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来传播它们。更有甚者，他竟然出版了诗词手稿的影印本。对于毛泽东的这般行径，除了无耻和疯狂的字样之外，实在找不出别的词来加以描述了。

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向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求：作品的内容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作品的语言对劳动大众说来要通俗易懂。但是，他自己的诗词的内容和形式，恰好同他所要求于别人的完全柑反。可以说，他的诗词写得故弄玄虚。

他常喜欢用神话和各种早已湮没无闻的“典故”，以致，这些诗词不但工农兵不懂，就是很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不懂。

所以他每次都不得不请诗人给这些诗词写一些臆想出来的、牵强附会的和冗长的注释。他的某些诗词，由于不妥当地使用谚语和古老的寓言，以及由于用词怪诞，不仅诗人或者中学高年级文学课本的编者不懂，而且有时连他自己都不懂，因为他难以解释这些诗词。所以，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个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骗子，他只爱指责别人，自己却不能多少用一点批判态度来对待自己。可见，“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路线”的彻底失败，决不是偶然的。正像古书《易经》上所说的：“履霜坚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来者渐矣。”

五、结局——彻底失败

在声名狼藉的、实为反革命政变的“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本身用自己的言行作出了他的文艺“思想”及文艺路线彻底失败的结论。一方面，他不得不公开承认，他于四十至六十年代发表的关于文艺工作的多次指示，没有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真正执行过①(除他妻子江青一人外)；另一方面，他把二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而对文化工作者本人又极其残酷地进行了迫害，杀害了许多的人，或者逼迫他们自杀；剩下的坐牢，在那里遭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或者遣往所谓的“五七学校”，这实际上是劳动集中营，人们在那里“劳动改造”，不断地受到虐待；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死在这些“学校”里。

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闻的灾难，而革命文艺运动则被断送掉了。

不管“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路线”遭到多么可耻的失败，他直到现在还命令中国的报纸在每年 5 月 23 日重新发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噪一番，大肆宣传。他是这样恬不知耻，昧尽良心，真是难以找到合适的言词来加以形容。记得，《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就编了以下两行非常形象的诗

他脸皮赛过长城厚，
心肠更比煤块黑。

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这些话的公正有理。

第三章 第三个时期——“抢救”

从 1943 年 7 月到 1944 年夏是“整风运动”的第三个时期，即“抢救”时期。

第一节 为“抢救运动”制造借口

毛泽东看到，虽然“整风”已经进行了半年，干部对他违反真理和事实的种种言行却依然顽强地进行对抗。他认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他所预定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目的，即建立毛泽东主义并把中共党史编写成他个人的历史这个目的就不能达到；而第一个目的达不到，第二个目的，即用毛泽东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篡夺党的最高权力、搞个人迷信、在党内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的目的，也就不可能达到。同时，他还认为，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就不再有妨碍他行动的机构了、那时，他就可以在“行动自由”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行动”了、在这种条件下，他决定加紧进行反党括动，采取更加反动的暴力恐怖手段，即开展“抢救”

运动，以达到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目的。

为了开展这一反动的、暴力恐怖的“抢救”运动，毛泽东首先制造借口说什么，开展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既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又是由“主观状况”决定的。

根据他的说法，所谓“客观形势”是指蒋介石已决定进攻延安。宣布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处于战争状态。人为地制造极端紧张的战争危险气氛。

事实上，当时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条件，都不允许蒋介石进攻延安。

当时，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对国际形势有很大影响；此后，希特勒军队开始节节败退，这是一方面。

因此，蒋介石要进行公开的反共活动，就不能不担当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积极主张国共合作，为的是使中国仍然作为从军事上抗击日本的一个舞台；而蒋介石对美国的意见一向是尊重的。

当时的国内条件基本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武装力量继续占领着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领土；蒋介石不能像过去那样，一面进行抗日战争，同时又进行反共战争。

因此，所谓“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和“蒋介石马上要进攻延安”的论调，完全是毛泽东为了给“抢救运动”提供论据而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利用这种人为的紧张气氛宣布说，除了刘少奇和若干同志以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数干部和普通党员，都有“反革命嫌疑”。为此，他特别声明，过去在国统区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都是假共产党员，都是国民党为了推行“红旗政策”①而派去的；特别是在国统区工作的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更是如此。这些党组织统统被宣布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组织”。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对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恶毒诬蔑，也是对党组织的恶毒诬蔑，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就是为开展“抢救运动”制造借口。

第二节 名为“抢救失足者”，实为镇压党的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

1943 年 7 月 1 日，康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代表“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抢救失足者》。康生断言，“抢救运动”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抢救”由于“失足”而成为“民族叛徒”、“敌特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这样一些人。此后，开展“整风运动”的所有各单位，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各个单位的领导在大会上，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了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正是从“客观形势”和“主观状况”的观点出发来“论证”立即开展“抢救”运动的“必要性”的。各个单位全都宣布，“整风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已经结束，现已进人第三个时期——“抢救”。

实际上情况完全相反。“抢救运动”的目的完全不是挽救“失足者”，而是把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许多普通党员，以及革命青年诬蔑为“失足者”，以便施加压力，造成群众性的恐怖气氛，迫使忠诚的革命者承认自己是“失足者”。康生领导的、所谓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专业就是捕人、打人、刑讯和处刑。

负责开展“整风运动”的各单位的领导人也有权捕人、打人和杀人。

实际上，“抢救”就是通过种种强迫和欺骗的方法，迫使成千上万的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团员以及进步的非党人士写“悔过书”。他们在“悔过书”里必须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民族叛徒”、“苏联的代理人”等等。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们捕人、严刑拷打，使之“招供”。他们恐吓这些人，出卖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诬蔑他们，在小会上“整”他们，从精神上肉体上摧残他们，直到使他们神经错乱。用“车轮战”①的审讯方法使之“招供”。

他们对来自国统区的那些省委和县委的干部，拷打得特别残酷。

这些干部是专门被召唤来参加“整风”的。他们让这些干部“承认”犯了被指控的那些“罪行”。

谁要是承认了自己属于上述那几种“人”，就能马上得到自由。他们给他戴上一朵“红色的光荣花”，对他进行鼓励（!）。谁要是拒绝承认自己与“罪行”有关，就要受到刑讯和痛苦的折磨。

结果，许多人被折磨致死；另一些人由于受不了冤屈而绝望地自杀了(例如，在敌人监狱里经受过无数次残酷拷打、领导过游击战争的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在敌人监狱里表现了英勇不屈精神的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曾淡如；新军的领导人、党的老干部韩钧，他把山西新军从军阀阎锡山的打击下带了出来，编人了八路军；全国学联胡主席，他当时的名字可惜我没能记住；还有其他许多同志)。还有更多的人被弄得精神完全失常，另一些人得了重病(例如，

河南省党委组织部部长危拱之，党的青年工作领导人黄敬和其他许多人)。

有时简直就采取野蛮的手段。比如，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追问一个审查对象时，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把刺刀、一杯毒药和一根绳子，然后让到会者大声喊叫：“要就是马上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否则就立即去死！”“这里有三种自杀的办法任你选择！”应该说，不少人都很坚强，没有屈服。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人骄傲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不能死！”他们愤然地把刺刀、毒药和绳子摔到地上。这些坚强的人当然成了变相折磨和残酷杀戮的对象。

第三节 主要打击对象仍然是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者

在镇压和恐怖气氛达到最紧张的时候，斗争的矛头便转向所谓的“莫斯科集团”，他们是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洛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凯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洛甫离开延安后他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朱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书记)等人。

就像在“整风运动”中那样，最主要的攻击对象首先是王明。

毛泽东有时婉转地把王明叫做“莫斯科集团最主要的代表”，有时则辱骂地称之为“亲苏集团的首脑人物”。毛泽东为什么首先要把斗争矛头指向王明呢？对这个问题，最好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些话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我和王明之间的斗争，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原则之争。王明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的主要代表，而我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我们之间的斗争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理论、两条路线和中国革命的两种方法之间的斗争。不同王明作斗争，就不能结束俄国马克思主义在我党的领导地位；不结束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就不能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对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必须一一予以揭穿。

首先我们应当说清楚，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来不存在所谓“莫斯科集团”或“亲苏集团”这种组织；可是，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里，还在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以前，就已发生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一些机会主义者在反对“莫斯科集团”或“亲苏集团”的口号下，不仅反对那些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人，而且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

第一次是在 1927 年武汉时期，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共产国际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发展工农运动，武装工农，成立新的革命军队，进行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而斗争。与共产国际的这些建议相反，他们执意坚持所谓的“二次革命论”。

大家知道，《向导》周报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对“二次革命论”作了论述。但是，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具体、最清楚的是 1927 年 6 月 16 日陈独秀同米夫同志和我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的那次谈话，当时的话题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陈独秀自己对所谓“二次革命论”的内容是这样叙述的：“中国革命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一阶段，共产党不能领导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政府和武装力量应当交给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如果共产党员领导军队，他就会成为军阀；如果他当政府①首脑，他就会变成官僚。群众运动不应当发展到对资产阶级造成威胁的地步。革命的胜利应完全属于资产阶级，应该允许资产阶级长期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的时候，共产党才能进行第二次革命。那时，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革命；那时，共产党员就能领导军队而不致成为军阀，就能当政府首脑而不致变成官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这一套理论和方法，当然同莫斯科所坚持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不同，但我们认为，我们是正确的。”

陈独秀、彭述之及其拥护者把瞿秋白叫做“莫斯科集团”的主要代表，因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小册子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凡是赞成共产国际路线并同意瞿秋白书中所阐述的观点的人，都被列为“瞿秋白集团”或‘瞿秋白莫斯科集团”的参加者。我支持共产国际路线，并赞同瞿秋白的观点。这时我兼任《向导》的编辑，是《向导》编辑部的成员，《向导》的主编是瞿秋白。就在《向导》第 198 期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因此我也被列为“瞿秋白莫斯科集团”的成员。

第二次攻击运动是在 1930 年，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进行的。当时李立三把陈绍禹②、秦邦宪③、王稼祥和何子述④(他们向李立三个人和政治局委员第二编“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在党中央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发言支持共产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叫做“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或“陈绍禹莫斯科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他们进行了沉重的打击。由于反对在中共中央《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四、五两期合刊上发表的李立三的文章：《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①和反对 6 月 11 日政治局决议，6 月 18 日陈绍禹受到“最后一次严重警告”，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则受到“严重警告”。针对反对红军进攻大城市，反对在大城市里举行八七暴动，早已准备好的对陈绍禹的处分被加重为“留党察看六个月”②，而对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的处分则加重为“最后一次严重警告”。只是在 10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到达上海后，11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才通过决议③撤销了对我们四个人的处分，并将此事通报了全党。

此外，同年 8 月，陈原道(列夫)④领导党的河南省委中大多数人起来反对省委书记和中央北方局关于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因而受到北方局的“最后一次严重警告”。三中全会以后，他向中央提出了申诉，但政治局加重处分了他，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关于撤销列夫的处分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 1931 年 1 月 29 日单独做出了决议⑤并发了通报。当陈原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消息传到中央时，李立三勃然大怒，他说：“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千方百计地阻碍我！陈原道也早就加人了陈绍禹集团。”

第三次攻击王明的运动是在毛泽东开展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反苏和反党的“整风运动”时期进行的。毛泽东布置他的亲信在各种会议上大喊大叫，反对“莫斯科集团”或“亲苏集团”，反对王明，反对“莫斯科集团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反对“王明集团”等等。1943 年 8 月，当他收到医生会诊的结论后，不得不来看望我，我向他做了解释，并证明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王明的莫斯科集团”或“王明集团”。我对他说：

“所谓‘陈绍禹集团’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 1927 年冬捏造出来的。因为我一贯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托派就企图给我扣上种种帽子。由于我于 1927 年 8 月从武汉回到莫斯科后，积极做报告说明为什么必须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陈独秀分子，就把我叫做‘瞿秋白主义者’。我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积极反对托陈分子组织的所谓‘赣浙同乡会’，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决议作了《关于赣浙同乡会的问题》的报告。因此，托陈分子便把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绝大多数反对他们的学员和教员，都称之为‘陈绍禹集团’。其实，这种攻击的目的在于宣传这样一种思想：你们看，据说他们已经有了‘陈绍禹集团’，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赣浙同乡会’？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 1929 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早在二月初，我就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可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出于自私的目的，把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几百个同志，即绝大多数支持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反对托陈分子的同志，列为‘陈绍禹集团’。同时，他们企图表明，似乎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即以陈绍禹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我请求你看一看西安出版的国民党的极为反动的周报《抗战与文化》，其主编是叛徒、间谍和托陈分子叶青；周报每一期都载有诬蔑和辱骂陈绍禹、博古、洛甫、王稼祥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和报道。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历史由来……”

毛泽东回答说：

“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不仅在莫斯科学习，而且在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关工作了整整六年。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 1928 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始，你认识了联共(布)最高领导机关的一些同志，你同他们来往了多年，并且在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同他们建立了友谊关系，像你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找不出第二个，你从他们那里受的影响最深。我在整风问题的讲话中讲到有些人‘言必称希腊’，谁都知道，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倒是像你这样的‘言必称列宁、斯大林’、‘言必称共产国际’、‘言必称苏联’的人。

因此，不管你怎么说，你事实上是莫斯科集团或亲苏集团的最主要的代表，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至于王明集团，可以说，这是莫斯科集团的简称；但这当然不只是莫斯科集团的问题。从反对立三路线取得胜利和六届四中全会开始，难道只有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才支持你并跟你走吗？有没有这种组织是一回事，多数人是否跟着你沿着莫斯科路线、共产国际路线走，则是另一回事。这次我们发动整风，正是为了结束所有这些状况……”

关于我党过去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我在 1943 年 1 月初同我当时的政治秘书廖鲁言有过一次谈话。他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向毛泽东告了密。柯庆施知道这事后来到我处对我说，毛泽东可能会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公开宣布这份告密的记录。

由此可见，毛泽东搞反对“莫斯科集团”或“王明集团”的斗争，只是作为打击王明和其他同志的一种借口。为了这个目的，他时而故意地，也是出于这种打算，散布“消息”说，某某、某某属于“王明集团”，并对外国报刊是否发表这种“消息”表示关心。

而后他就利用他所散布的这些“消息”作为“根据”，来整那些所谓“王明集团”的人。

应当指出，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过去和现在确实存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理论、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只不过不是毛泽东所说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乌克思主义”

之间的那种臆想出来的斗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动的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毛泽东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如下：“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其发展过程形式上“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①其实，毛泽东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理论，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范围。在“无产阶级参加领导”②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①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然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毛泽东便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推向遥远的未来。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基本上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新条件下的翻版。以上所用毛泽东的这些话，均引自(选集)一卷本(《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一节。②
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毛泽东主义则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这首先表现在对反帝革命的性质和反封建残余斗争的性质理解不同。如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那就应该把反帝革命视为不仅是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步骤，而主要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和前提条件。对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同样也应视为不仅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步骤和前提条件。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主义把反帝革命和反封建革命只看作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和开辟宽广道路。因此，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取得胜利后，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①一书的第二章《中国革命》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中，他写道：“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同时他认为，革命胜利后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

其次，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如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条件，在国内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国际舞台上则是苏联的援助。但毛泽东从不承认这些决定性条件。他为什么不承认？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近几十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种种言行，就足以了解其真实原因了。下面就是若干事实：

毛泽东早在 1923 年 7 月发表的《北京的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就公开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领袖”。而在 1927 年 3 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里，他则否认农民同无产阶级联盟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颂扬农民的革命作用。

1931 年，他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不承认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由此出发，他也不承认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主张发展“农业资本主义”。

在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正像上面所指出的，他主张建立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940 年 10 月，他公开主张在国际舞台上实行同德、意、日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则实行同日本侵略者联盟的投降主义路线(参看本书第三编)。

从 1941 年秋到 1945 年夏，他开展了反共反苏的“整风运动”，用毛泽东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

1944 年 8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谢伟思谈话时说，“我们不等待俄国的援助……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当时他甚至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解放奴隶……”。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他肯定，“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观点。

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坚决主张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国内还必须长期执行“统筹兼顾的政策”，其中包括“既符合工人利益，又符合资本家利益”

的政策。他主张长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拒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声称，“至少在最初若干年内，新中国不需要别国的承认……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毛泽东实际上是不愿让中国进人社会主义阵营。

在 1949 年 6 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断言，中国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建立“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

五十年代，他通过实行“三面红旗”这种极“左”的政策而走上了葬送社会主义成果的道路。在他的“大跃进”、“大炼钢铁”

和人民公社这种冒险主义创举彻底破产以后，他再次声称：“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里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六十年代，他公然走上了反共、反苏、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同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联盟的叛变道路。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名词来掩盖自己的反革命行径，同时照旧推行他的毛泽东主义，即“新民主主义”这种反动理论，以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

真正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路线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路线之间的斗争。关于这两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我在 1970 年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文中已有论述。这里仅把对中国革命分期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作一比较。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四个时期。按照他的分法，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分为四个时期，即(1)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1925-1927 年)； (2)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1927-1937 年)；(3)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年)；(4)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1945-1949 年)。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的革命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确定。①只是在刘少奇于 1953 年初从莫斯科回到北京转达了苏共领导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一意见之后，在 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作了决议之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进人了社会主义阶段。

由此可见，毛泽东既不懂得划分中国革命阶段的标准，也不懂得革命分期的标准。他把战争这种革命斗争形式当作革命分期的标准，却不懂得应当把革命斗争的民族内容和社会内容作为划分革命阶段或革命分期的标准。关于这一点，我在《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小册子里也谈到了，该文指出，中国革命分为五个时期，这就是：第一个时期——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和准备进行土地革命的时期(1924-1927 年)；第二个时期——土地革命和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1927-I937 年)；第三个时期——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及准备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时期(1937 一一 1945 年)；第四个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1945-1949 年)；第五个时期——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为了详细阐明中国革命的分期问题，需要一本专门的著作。

由于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在“整风运动”第三个时期选定的主要打击对象依然是中国党内的列宁主义者，首先是王明。

比如，在杨家岭的中共中央会议大厅不止一次地召开了“抢救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等共一千多人)。

大会开始前，“整风委员会”指使人们诬蔑王明，说他不仅是“教条主义者”，而且是“俄国人豢养的走狗”，是“叛徒”、“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企图以此来吓唬到会者，使他们谁也不敢发言支持王明，特别是不敢对医生会诊所证实的、王明由于中毒而患重病的事实表示同情。因为当时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议论，不少人猜测，这事可能是毛泽东干的，这种情况引起了他很大的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当孟庆树(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常设局成员，中共七大代表)在一次大会上发言驳斥那些诬蔑者，声明王明严重中毒，生命垂危的时候，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胡乔木站起来大声叫嚷说：

“你为什么对别人说，王明中毒是毛主席干的？！”

“我对谁说了？’’孟庆树问。

李国华①当场跳起来说：

“你对我说了。”

“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我跟你说了？”孟庆树问。

“去年三月，当王明同志病情严重，我去中央医院看望他时，你对我说的。”李国华同志这样回答说。

对此，孟庆树说：

“当时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王明。②可是，你来医院时，王明正处于病危之际。警卫没让你进病房，因此，无论是我还是王明都没有见到你。这个情况，警卫可以证明。我倒也要问问你，你怎么在去年三月就已经知道王明中毒了？而且你还知道这是谁干的？要知道，王明中毒的事实是在今年夏天医生会诊后才肯定下来的。事实上究竟是谁毒害了王明？当然，这是帝国主义分子、民族叛徒、国民党间谍、托洛茨基分子等一类混蛋干的。”

争论时毛泽东坐在第一排正中，脸一直红到耳朵，手里拿着香烟，低着头。博古坐在第三排正中，瞪大了两眼看着孟庆树，惟恐她出于坚持原则的性格而把她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

我们的警卫立即写了一个条子给大会执行主席，证明他没让李国华进病房，因此，李国华既没有见到王明，也没有见到孟庆树。

毛泽东企图吓唬大家，使人们相信王明是装病。结果反而使人们对中毒问题和谁毒害王明的问题予以更大的注意。

就在同一次会上，孟庆树说：

“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八一宣言》早已成了党的历史文件，本来没有必要去提它是谁写的。可是，既然有人肯定这是康生写的，那我首先就想问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

康生低着头一言不发。

孟庆树继续说：

“我想间问你们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

谁都不敢回答她，于是她就自己回答：

“我认为共产党员是应该知羞耻的。《八一宣言》是王明写的。1935 年 6 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

‘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三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首先完成了草稿。

第四天，他又进行修改。第五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做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今天到会的一些同志曾经参加过这次会议……”

这时，李富春事先布置好的“拉拉队”大声叫嚷起来。但高自立①站起来说：

“我参加过那时的代表团会议，还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听过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和结束语，我记得，大家是怎样讨论这个文件的草稿的。我可以说……”

大厅里又响起了大喊大叫的声音。高自立无法再讲下去。

但毛泽东想把康生扮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倡导者”的企图是落空了。

后来，一些人按毛泽东的指示对我和孟庆树进行诬蔑。孟庆树把他们全都顶了回去。有些坚持原则的善良的同志想起来为我们说几句话，但谁也没有下决心发言。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李富春刚刚宣布散会，毛泽东就当着大家的面申斥他说：“今天的大会充满了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个反王明的大会开得毫无结果。在若干问题上，他自己也感到棘手。因此必须策划新的行动来反对王明。

确实，很快就召开了第二次反王明大会。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嘱咐陆定一①要在会上“枪毙开小差的人”。陆定一说，任何时代，任何部队，在战争条件下都枪毙过开小差的人；在“整风运动”紧张时期，我们当中有人竟敢要求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飞机来送他到苏联去治病。这是企图逃避“整风”，这就是开小差，对这种开小差的人，应当枪毙！后来，陆定一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社论，发表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陆定一在发言时没有提王明的名字，在文章里他也没有点王明的

名，但人们到处都“议论”说，文章中指的就是王明，从而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

在一次会上，李富春突然宣布，柯庆施②是反革命分子。

人们马上就把他逮捕、捆绑起来，拘留在家里，让他“交代”。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把柯庆施叫去向他说明：“我们反对你，是因为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0 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 1939 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老共青团员和老共产党员；你是王明的副手。如果你是反革命分子，那就会引起一种想法，即王明想必也不那么可靠。”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了在人们当中煽起反王明的情绪，他们恬不知耻到了何等地步，离共产党的原则和作风又有多远！

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恐怖气氛下，毛泽东派李富春、彭真、高岗和林彪①到《解放日报》编辑部所在地清凉山去找博古(博古从 1941 年秋到 1946 年逝世时，一直担任《解放日报》的主编)。

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博古按照毛泽东规定的基调——即必须“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来进行“交代”。“骂俄国人，就是骂共产国际和苏联”。如果博古不同意，他马上就会被逮捕枪毙，而后在报纸上公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后来，毛泽东对我说，博古很长时间一直不同意写要求他写的那种“交代”材料，他痛哭了一整夜。只是在要把他捆绑起来带走的时候，他才同意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洛甫和杨尚昆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方法，强迫他们写出类似的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的交代材料。王稼祥和凯丰在“整风”后半期病得很重，因此毛泽东未能强迫他们写“交代”材料。

对待“经验主义集团”的主要代表周恩来和彭德怀，毛泽东也使用了阴谋手段。在“整风运动”(这个运动也是为了反对他们的)筹备并进行了差不多两年以后，毛泽东才于 1943 年 7 月把周恩来从重庆召回。彭德怀则更晚，在 11 月才从华北前线被召回。换句话说，他们两人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抢救运动”

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时候了。他们两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此都毫无准备，这时，人们就在各种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早已布置好的“既定事实”对他们进行迫害和辱骂。

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1948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同我谈话时不得不承认，那个时期他“有错误”。

我在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把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同列宁

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对比。我证明，在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动力、领导权、前途等根本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此，这实际上揭露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一事实，从而也就批驳了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惟一的指导思想”的说法。我特别提醒注意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主要条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苏联的援助)。我指出了毛泽东的“四个原因”(“帝国主义的存在，土地革命尚未结束，资本主义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革命”)是站不住脚的。“由于这四个原因”，好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我说明了我于 1934 年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中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特殊形式》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并着重指出了，这种转变将开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我向全会说明，这篇文章中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基本观点，共产国际是同意的。

这样，毛泽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多年的时间里，都未下决心发表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①他也未下决心要求二中全会就他的报告作出决议。

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在 1948 年 12 月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当然都引起了他的仇视。因此，他在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指责我，说我跟过去一样，反对“毛泽东思想”，说我的发言“有毒”。①而在后来发到党内进行讨论的、他在二中全会上的闭幕词的“提纲”中有这么一条：“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这样，党内就发动了又一次的反王明运动。

1949 年 3 月 16 日下午五时，毛泽东来到我处(当时我住在河北省阜平县西柏坡村)。他带来了博古、洛甫和杨尚昆的“交代”材料，要求我也写“骂三方人士的交代”材料，这就是说在“交代”中我应当“骂自己、骂他们(博古、洛甫、杨尚昆和其他人)、骂俄国人”。然后，他非常自鸣得意地叙述他怎样迫使博古等人作出了“交代”。毛泽东叫喊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我不仅坚决拒绝了这种荒谬而可耻的要求，申斥了这种违法的行为，而且极其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你胆敢双手沾满王明的鲜血，你将永远以反革命分子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而闻名。”我向他声明，“我不仅不会写交代材料，而且也不会去看这类东西”，并且让他把这些“交代”材料带回去。

毛泽东的脸一直红到耳朵，他说：“你交代不交代，由你自己决定。这三份材料留下给你看。”我忠于自己的声明，没看这些材料。孟庆树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说：“博古、洛甫和杨尚昆的这些‘交代’的基本内容，无疑都是毛泽东捏造的。”

我坚决拒绝写“骂三方人士的交代”材料后，毛泽东又搞了一些新的阴谋来反对我。例如，

1949 年 10 月 26 日，他要求中央政治局把“第九点”(关于王明的问题)列人政治局决议，而 1950 年 6 月 9 日在他请求下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这两个决定的基本思想都是要求王明写声明书，声明他承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所谓“王明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的错误”。虽然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即认为王明的立场是错误的。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我坚持了历史的真相。这个决定中写道：“中央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事实上二中全会并没有通过要求我写这种声明书的决定。这个要求只是在 1949 年 10 月 23 日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来同我谈话时，才向我提出来的。

同刘少奇的谈话，弄清了毛泽东提出“王明的两条路线”的情况，弄清了毛泽东为什么要我写这个声明书的原因。

刘少奇在谈话时问我：“谁让你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好几百万字之多的东西？你不但写了文章、文件，作了报告，而且就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甚至写了整整一本书。你看，至今我党难道还有别人写过这么多东西吗？没有。你写了这么多东西，毛主席在‘整风运动’时期不过是从你所写的东西当中随便抽出两句，把它列为两条机会主义路线，难道这还算多吗？

如果照此办理，就是列上二十条路线、二百条路线、甚至两千条路线也算不了什么！至于毛主席要求你写一个声明书，这不过是履行组织手续。他知道，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的。而且，你即使写了，同样也不会得到好处。只要毛主席说过你以前所写的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那就不管你写多少，都是徒劳的……”

其实，中央大多数同志都知道，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是党内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的代表，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这两个时期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并且犯了许多原则性错误。因此，尽管中央政治局和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指责和威胁，但我知道这些决定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通过的，而且与事实和历史真相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继续坚持事实真相，驳斥种种捏造，不写声明书。

下面是 1950 年 6 月 9 日通过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的全文：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1950 年 6 月 9 日通过）

关于王明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1949 年 2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决定

王明同志应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当时王明同志亦曾在全会上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但事实上，王明同志对这一决定的执行，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中间虽经政治局的催促，并于 1949 年 10 月 23 日派刘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同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同年 10 月 26 日，政治局听了刘少奇 同志同王明同志谈话情形的报告之后，又曾将政治局 的决定通知王明同志，指出：‘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 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 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 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1949 年 11 月 6 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 犯错误问题，已在 1945 年 4 月 20 日写了一封信给六 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 1945 年 4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 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 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他对于抗日时期的错误问 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 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 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 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杭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 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 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 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关于这个决定，必须再作几点说明。

1.正像上面所讲的，1949 年 3 月召开的二中全会根本没有决定王明同志“应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只是在送来的油印文件中的《二中全会上的闭幕词提纲((1949 年 3 月 13 日)》这一页上，毛泽东在第六点中写了一句话：“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2：1950 年 6 月 9 日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只是在 7 月 30 日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给我。那时我刚从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来，没过多久，我就病例了。当时正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法律工作会议。我忙于起草报告和准备几个刑法法典草案，因此直到 8 月 17 日我才有空给毛泽东写信，在信中我向他提出了下面几个问题：

(1)我有多少时间？要知道，为了把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写的全部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再看一遍，进行适当的总结，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2)我要求毛泽东把我在 1937 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纲和我的笔记本退还给我。因为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中共秘书长王首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到会者的笔记本和其他活页纸全收走了，以后并没有归还。

(3)我保留的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延安的《新中华报》和许多其他材料，‘在 1947 年延安撤退前，根据毛泽东的布置，都送到瓦窑堡去了，后来就没影了。我在信里要求把这些材料还给我，或者暂时给我另外弄一套以便工作。

虽然当时我有病，体质很弱，工作又很忙，可我还是很愿意把我过去写的全部东西再看一遍；愿意严肃地、根据历史事实，为党写出一份与毛泽东的伪造针锋相对的、真正的党的活动总结。但毛泽东没有回信。10 月 25 日他突然安排让我马上到苏联去。

3.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中提到，我在“1945 年 4 月 20 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于 1945 年 4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正像我已经叙述过的，从 1941 年 10 月初到 1943 年夏，有人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曾多次毒害我。就在那时，毛泽东加紧进行“整风运动”。在我病危之际，毛泽东盼望我死；但由于我们的顽强斗争，由于党内许多同志、还有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支持，由于苏联卫国战争前线传来的捷报(这一时期，红军经过最初的失利已转人反攻)，并由于 1943 年夏医生会诊后改变了治疗方法，我的病虽然还经常复发并起不了床，但健康已开始好转。

毛泽东打算在 1945 年 4 月召开中共七大，为此，于 4 月 20 日举行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但是在四月初，他就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我看了，他两次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来和我谈话，他自己来过一次。他们都建议我写一个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承认要“交代自己的错误”，但我没有同意。

同时，还有另外一些同志来看我，我同他们商量怎么办更好。我的出发点首先是，苏联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已为期不远，因此，即使我不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也未必敢开除我的党籍。可是，同志们列举了以下理由：第一，“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按照党章，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次中共七大完全是由毛泽东筹备的。你现在既无可能，又无体力向代表大会阐明自己的意见。加之大会也不可能改变七中全会的决议”；第二，“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还不完全了解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反动实质。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保留你，就是保留了党的真相和反毛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你那时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

从这一情况出发，我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的决议。

1945 年 12 月 25 日，我在中共中央直属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全体干部一千多人出席的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方针，这个报告的内容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①是针锋相对的。报告后，一些同志向我祝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后来，我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两个小时的发言，揭露毛泽东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人又对我说：“你注意到了没有，同志们两小时鸦雀无声地听了你的发言。要知道，他们好长时间没有听

到你的讲话了。”这是我中毒后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到了北京以后，我因病没有参加历次中央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正是因为在 1945 年 4 月 20 日以后，我不仅没写声明书，而且从未停止过反毛斗争，毛泽东才强迫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上述决定。

从 1950 年 11 月到 1953 年 11 月，我在苏联。

尔后，从 1953 年 12 月 9 日我回到北京，到 1956 年 1 月 30 日我再次离开北京去莫斯科，在这段时间里，与毛泽东迫害王明，及王明西反对毛泽东的斗争有关的事实，当然还多得很。这里我只简略地提一下。

在这以后，在 1952 年底，毛泽东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受到了批判。许多人开始懂得，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坚持的那条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在国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正确的路线；而毛泽东强加给那次全会的路线(革命胜利后必须长期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即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是错误的路线。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时期里不再要求我写声明书了。但是在 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公布了一个叫富振声的人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的信。作者在信中对我进行了诬蔑。①那时我已卧床不起了。直到 1956 年 1 月 30 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我才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2 月 1 日，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第四节 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嫌疑犯”

毛泽东在“整风”时期还责备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八路军总司令)，任弼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路军副总司令)②等人，说他们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抢救”时期企图把“反革命活动归咎于他们，嗾使别人在各种会议上诬蔑这些人。甚至像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随时准备投机、对任何罪恶行径从不嫌恶的背叛者，以及像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风一吹”就紧跟的机灵人物，早在筹备“整风运动”时期就给自己“贴上了”不中用的“经验主义者”的标记。在这以后，毛泽东才把他们列为这次运动的领导人。可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全体成员中只有两人未受批评，一个是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他断定自己绝对“纯洁可靠”，认为自己有权迫害和镇压别人；另一个是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毛泽东积极利用他来替自己办事。

对于他们俩人，大家只能讲好话。

毛泽东在“整风”和“抢救”时期所进行的全部非法活动，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事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并通过。其实，毛泽东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根本不把党的领导机关——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他组织了听从他个人指挥的“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他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这个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号施令；他依靠直接服从于他的警卫团这支军事力量，进行了种种非法活动和罪恶勾当。

这种情况后来又重演了。臭名昭著的“文化革命”刚一开始，毛泽东就完全撇开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专门成立了在他个人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文化革命小组”。和以前一样，他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这个小组组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他依靠受他蒙蔽的那部分军队和红卫兵，完成了反革命政变。这就是舆论界认为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的原因所在。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章 第四个时期——“翻案和恢复名誉”

第一节 进行“翻案和恢复名誉运动”的原因

这一时期(1944 年夏一 1945 年春)，毛泽东不得不宣布进行“翻案和恢复名誉的运动”。迫使他这样做的有以下一些情况：

不断进攻的苏联军队马上就要取得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最终胜利。而且，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党员和青年团员都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敌人真假难分。例如，中共中央机关一千名工作人员中有九百多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其中甚至有延安小学的学生、领导干部的孩子。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领导“群众整风”的干部，把各村的农民集合在一起，让他们排成队，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或“民族叛徒”。谁要是“承认了”，就回家；谁要是不承认，就百般折磨他们：把他们看管起来，进行毒打，并且抓起来。地方上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分性别和年龄，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或“敌特分子”、“民族叛徒”。

尤其重要的是，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团员以及非党人士都很气愤，并拒绝参加这样的“整风”和“抢救”运动。

“翻案和恢复名誉的运动”是这样进行的。

毛泽东在“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王明和党中央的个别领导人，以及党、政、军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提出并执行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这种错误不属于翻案之列，犯这种错误的人不能恢复名誉。同时他指出：“所有这些人，现在没有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反革命、叛徒或其他政治上不可靠的嫌疑。对他们进行的所有这类指责，都应该推翻。”

他声明，那些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或“民族叛徒”的人，有权“翻案”，而所有“推翻了”自己以前的供词的人，都有权“恢复名誉”。

他亲自命令所有领导过“整风”和“抢救”运动的人要号召、“动员”并劝说所有挨过“整”、受过迫害的人立即推翻自己的供词，以便摘掉扣在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民族叛徒”等帽子，使他们能够得到自由、有可能恢复名誉。结果，所有承认自己犯了上述“罪行”的人，都写材料“推翻了”自己的供词，“整风委员会”就立即摘掉了他们的“反革命分子”等类的帽子。毛泽东断定，整风中对人们的所有错误做法，仿佛都是执行“逼供信”①政策的结果，是康生不执行毛泽东的“九条指示”的结果，这九条指示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康生后来提意见说，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九条指示”)。因此，毛泽东迫不得已地承认，很多参加过“整风”的人都被杀害了，大多数人都被捕过。

根据来自各方面的材料，“整风运动”中被杀害的人数至少有五、六万；被捕过的人数无法统计。下述事实是一个相当痛苦而可怕的悲剧。饶漱石(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遵照毛泽东关于“抢救”运动的指示，把各地到华中解放区来参加抗日战争和掌握革命知识的所有男女青年(共数万人)，都看做是“敌特分子”、“民族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早已人党和人团。他把他们赶出了解放区。结果，这些青年都被日本占领者和他们的傀儡杀害了。

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挑拨地方干部反对“外来干部”。在“整风”和“抢救”过程中，许多外来干部被杀害、被打伤或被打成残废。后来，不健康的情绪平息下来了，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谈起这些事时，一致流露出痛苦和惋惜的感情。

第二节　所谓“宽大政策”

在普遍“翻案和恢复名誉”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毛泽东命令公安机关执行“宽大政策”，号召关在延安监狱里的杀人犯、抢劫犯，以及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民族叛徒、敌特分子等等“推翻”

原来供出的材料。然后就全都恢复他们的自由。当然，就连因毒害王明、形式上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服刑的金茂岳①医生，也①正像已经指出的，金茂岳向我承认过，李富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命令他毒害王明，然而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可能揭穿这个秘密。因此，在中共中央专门组织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还有康生和李富春参加的“金茂岳事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中写道:“金茂岳觉悟到，他按照国民党红十字会主席、属于陈立夫集团的朱某的指示，毒害了王明”,“委员会暂时判处金茂岳五年徒刑”，但同时指出:“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决定金茂岳在监禁期间继续从事医务工作，使他能够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翻案和恢复名誉’运动时，金茂岳“推翻了”自己过去的供词，并且说他“不是有意毒害王明的，他只不过是犯了错误”。

立即“推翻了”自己的供词。而且，由于他能“将功赎罪”，他成了一个“有功的”人。他被释放了。并立即被任命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保健医生。北京解放后，金茂岳被任命为党政军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就医的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虽然在 1952 年，中共中央军委卫生局鉴于许多人的抗议，不得不解除了金茂岳在北京医院的职务，但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中央第二医院院长。根据《人民日报》1973 年 2 月 12、16 和 18 日的报道，金茂岳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领导人之一。

第五章 第五个时期——“总结”

这一时期(1945 年春至夏季)，毛泽东从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上对四年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

第一节 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总结

首先进行的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总结。这一总结主要反映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规定里。臭名昭著的中共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如下：

1.宣布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①在中共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中国共①在“整风运动”进程中，毛泽东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作掩护，实际上反对列
宁主义，因此在上面提到的七中全会“决议”的第一稿中是这样写的：“毛泽
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在起草
“决议”第二稿时，苏联军队已经逼近柏林，“马克思主义”一词则被改成“马
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主义”一词则被改成“毛泽东思想”。

产党执行的一直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2.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的成就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都是由于实现了他的“思想”；所有错误和缺点都是别人造成的。

3.形成了一种看法，好像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 1934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4.肯定了遵义会议仿佛纠正了上面提到的两次中共中央全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5.捏造说什么毛泽东是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则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等等。

这个“决议”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这里必须指出，五十年代载人《毛泽东选集》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虽然注明的日期是 1945 年 4 月 20 日，其实是重写的。这个伪造的文件是为了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委员阅读的。五十年代发表的《决议》内容和 1945 年通过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内容之间的显著差别，就是由此而来的。

例如：

1.在整个“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竭力进行反苏的诬蔑，根本否认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起的伟大作用。然而，因为苏联军队当时已取得对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不敢把他对共产国际的诬蔑写进“决议”。1945 年的“决议”只字未提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五十年代的“决议”

中不仅提到列宁和共产国际，而且凡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地方，都把共产国际的看法放在第一位，然后叙述毛泽东的意见，似乎毛泽东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看法是一致的。《决议》还毫无根据地断定什么，毛泽东“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2.四十年代的“决议”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惟一指导思想。五十年代的“决议”中连“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都没有。那里面写的只是：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3.对所谓“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与之相对立的毛泽东的路线，对“遵义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对所有这些，四十年代的“决议”中都谈到了，但在五十年代的“决议”中见到的却是更详尽的伪造。这两个“决议”的文本，还有其他一些不同之处。

最后必须指出，这两个内容极其不同的“决议”，具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特征，这就是：其中都只字未提苏共和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全面支持与援助。

可见，毛泽东在四十年代为了伪造中共历史而起草的“决议”，在五十年代又重新进行了伪造。将来，在另一个时候，在别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个人目的，自然也不会在这种新的伪造面前停滞不动。从“整风运动”开始，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毛泽东就“突出地”运用了伪造的方法；他伪造历史，捏造“事实”，假造文件和“著作”。为此，他既使用“阴谋”

手段，也使用“阳谋”手段。①可见，毛泽东早就够资格当专门进行各种伪造的“毛记”著名商行的老板了。但是，历史经验指出，对的终究是对的，假的终究是假的。想把真的改成

假的是不可能的，要把假的变成真的也是不可能的。借助伪造，只能蒙蔽人们于一时。真正的东西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因此，不管毛泽东怎样费尽力气和笔墨，他都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事实。

他的这种努力又一次证实了他的堕落。

毛泽东一手持“剑”，一手持“毛泽东思想”，迫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他起草的上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然后又一手持“剑”，一手持“决议”，迫使中共七大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写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以为，他一手持“剑”、一手持党章总纲就能永远以“毛泽东思想”来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再也不会有人敢于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政策。生活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比以前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政策的斗争。比如，在估计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问题上，在土地改革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上，在对反蒋战争形势的估计上，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总之，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毛泽东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且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坚决反对。由于苏共中央的帮助，也由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种种事件的客观进程，党才最终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方针。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1954 年 2 月)严厉批判并纠正了拒绝使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自 1949 年 3 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这条路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错误被揭露了，这就是重复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结果，“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彻底崩溃了。

其次，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气氛，发生了有益的影响。因此，毛泽东被迫破例同意从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提法。大家知道，中共八大(1956 年 9 月)的党章中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但是毛泽东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和阴谋家，当然不能放弃他的打算。在实质上是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文化革命”

中，他把党、党章和中共八大通过的所有决议都“砸得稀烂”，而在他策划的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则以比过去更加荒谬的形式，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他利用“毛泽东思想”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深信，这种情况是暂时现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永远把九大和十大通过的“党章”，连同“毛泽东思想”一起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永远在中国土地上取得胜利。

第二节 “组织上的总结”

继思想上的“总结”之后，做出了组织上的结论。虽然在“整风运动”中，无论哪一个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被开除出领导机关。但在党的七大和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关时，大家都清楚毛泽东要做出什么样的组织结论。为了在大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中制造混乱，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前不止一次地煽动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

为了在大会代表中造成一种全党“团结”的印象，毛泽东玩弄了种种花招。比如有这么一件事，在大会正式开幕大约半个小时以前，毛主席来看我，走到我的床前，很有礼貌地说：

“王明同志，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我个人，请你出席即将开幕的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回答说，“我有病，你看，我躺在床上，怎么能出席大会呢？”

“和我一起来了两位优秀的担架手，他们抬来了做好的沙发担架。请孟庆树同志给你穿好衣服，他们就把你抬走。”毛泽东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

“即使把我抬去了，我也不能长时间在那里躺着。”

毛泽东坚持说：“你在那里躺上十五分钟参加个开幕式就行了。如果你能多躺一会，听听我的报告，那就更好。王明同志，我衷心邀请你出席。我们七大的口号是全党团结的大会。你要是不去，就不能表明七大是团结的大会。我已经邀请了(王)稼祥同志，并派人抬去了担架。你先慢慢走，他一定会来的。回去后我就可以对政治局委员和代表们说：‘我邀请了王明同志和王稼祥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们的大会真正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我先走一步，大会等着你们俩人，等你们来以后’，大会才正式开幕。”

担架手把我和稼祥刚刚抬进大厅，毛泽东就立即登上了讲台，致了短短的开幕词，宣布大会开幕。选举主席团，公布议事日程。所有这些真的就用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当刘少奇宣布毛泽东做政治报告时，我就要求让我离开会议大厅。

可是，就在我呆在大厅里的短短十五分钟内，也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插曲，因为它表明，七大远非“团结的大会”。这个插曲指的是，在宣布了由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后，这十

五位成员的位置如何安排的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台上，向主席团成员热情挥手以示邀请。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走上台来，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主席团的长桌子后面。其他十位主席团成员(陈云、康生、彭德怀和张闻天，他们是应当再度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高岗和彭真，他们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董必武，第一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贺龙和徐向前，他们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仍旧坐在大厅里。毛泽东一边做手势，一边点头，向他们示意，请他们上台。在这以后，他们才一个个好像很拘束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登上主席台，走到主席台右边的角上，远离主席团靠墙坐下。坐在前排的代表，甚至都看不见他们。

同时，在前台主席团桌后站着上面提到的五个人，这时的情况是：毛泽东担心地在他们中间来回走着，不时望望每一个人。

其余四个人窘红着脸走来走去，互相催促着，好像孩子作客一样。他们还不知道谁应该坐在哪里。

我们知道，问题在于“整风运动”以前，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比其他三人稍低，而他却挤到了第二个座位上。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特别是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各种污辱和迫害，因此，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应当坐在那个位置上。

最后，毛泽东让他们按下列顺序就坐。刘少奇坐第二位，周恩来坐第三位，朱德坐第四位，任弼时坐第五位。他们五位都同时坐下了。

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不很高兴。每一位代表看到安排主席团成员座位时的这种不体面的无谓奔忙，当然都会有相应的意见。他们对所发生的情况持冷眼旁观的态度。

我党无论哪一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奇怪的现象。

这一小小的插曲正好表明党内很分散。

在“选举”领导机关时，毛泽东再次玩弄两面派手法。他自己对代表们讲，“王明同志不仅犯过重大错误，而且立过大功。

将他选进七大党的中央委员会是有好处的”。而受毛泽东委托，操纵选举的李富春却特地向代表们说：“对待像王明这样的人，只能采取‘剥竹笋’的政策。这次我们只‘解除’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但仍留在中央。否则，党内外、国内外的群众将会不理解的”。

“整风运动”的“组织结论”首先反映在党的领导机关的“选举”上，这些“选举”是在由毛泽东导演的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进行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七个主要代表中，王明和博古两人未被再选进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洛甫(张闻天)也未被再选入书记处，但由于他在遵义会议成立“毛洛联盟”方面“有功”，而被再选为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和凯丰未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凯丰则根本未被选进中央；杨尚昆和朱瑞未被再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上届政治局委员中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委员邓发，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被选上。毛泽东是这样宣布的：“邓发对王明和周恩来从不愿讲哪怕是一句坏话，因此，他既是个教条主义者，也是个经验主义者。”其实，他对邓发持这种态度，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一贯轻视并敌视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和干部。例如，每当谈到也是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时，毛泽东总是非常气愤，好像简直就不能容忍项英的存在。1941 年 1 月，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悲惨地牺牲了，这次事变是毛泽东挑起的。至于其他一些原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虽然再度被选进了政治局，在他们身上也都打上了“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烙印。

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所谓的“特殊”人物。他第一次篡夺了中央主席的职务。这就是毛泽东，他是高不可及的，他自命为“镀金的”活阎王(死神)。他一手持“剑”，一手持“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描绘成各方面都很完备的“普通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

领导中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影响”的人物，这就是刘少奇。

他第一次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左手拿号，右手拿笔，成了狂热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家。

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那时都被贴上了“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之类的标签。许多被迫承认自己进行过“反革命活动”的人的“交代”材料，仍然保存在中央社会部或组织部，任何时候它都能成为有充分根据的、可用来“抓”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小辫子”的“材料”。

毛泽东就是这样来歪曲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的。

第三节 “作风”问题的总结

最后进行工作“作风”方面的“总结”。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写出决议，但在“整风运动”中常常大力号召“学习毛泽东的正确作风”，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的“错误作风”。现在大家都知道，臭名昭著的、毛泽东的作风无非是专制皇帝和军阀的作风同社会上那些失去阶级地位的人的领头人的作风的混合物，也就是“大汉天朝帝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作风。而他所反对的、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通行的那种作风，恰恰是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拥护者的作风。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整风运动”时遭到迫害的那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的命运，就可再次确信，“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

博古(秦邦宪)和邓发乘坐美国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时，由于飞机失事，于 1946 年 4 月 8 日牺牲。

朱瑞在国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1947 年在长春附近检阅炮兵阵地时，触到事先埋设的地雷而身亡。

在 1955 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有一次凯丰从马列学院回到家里，午饭后突然死去。大家知道，毛泽东当时害怕：

他可别到这个会上来维护高岗。

杨尚昆在 1966 年 6 月所谓的“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就被红卫兵按毛泽东的指示抓走了。红卫兵给他戴上了高帽子，脸上涂了黑煤烟，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苏修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叛徒”等。在红卫兵大会上，他被打得死去活来。

张闻天(洛甫)还在 1958 年就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因为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反对毛泽东的极其错误的“三面红旗政策”。

“文化革命”时，红卫兵也对他进行了污辱和毒打。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大家一点也不知道。

王稼祥在“文化革命”时，也在红卫兵的大会上受到了残酷折磨。

至于王明，大家知道，从“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就竭尽一切可能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对

他进行诬蔑，说他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六十年代初，当毛泽东公开反苏并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王明更被指责为“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报刊和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对他进行攻击。“文化革命”刚一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的对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学习，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毛主义的斗争，因此在“文化革命”初期，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对她进行攻击。此外，红卫兵还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的父亲陈聘之①进行鞭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卫兵抄了王明的家，把他的八十多岁的、年迈的继母黄莲芳②打得半死，还把她扔到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至于“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彭德怀，大家知道，他在军事建设向题上赞成向苏联学习，同苏联合作，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现代化的国防部队，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仇视；1958 年，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冒险主义政策。从 1958 年起，他就遭到残酷迫害。此后，1959 年，他被正式解除了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他实际上被软禁在家里。1967 年 12 月，毛泽东派红卫兵坐专机到成都逮捕了彭德怀，并把他押回北京。据多方报道，他当时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据另一些报道，他被投人了监狱。不管怎样，谁也不清楚他的命运。

剩下了一个周恩来。“文化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污辱和谩骂，威胁说“要他引火烧身”。可是后来，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让他留任国务院总理，以便榨取他这个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勤奋工作的官员的血汗(还在三十年代，毛泽东就给周恩来起了个外号叫“小毛驴”)。

虽然七大通过了“整风运动”的总结，但这个运动在七大以后，实际上还在继续。毛泽东把从全国各地叫来的干部留在延安党校，他的借口是：“放他们回家，也是无事可干。等到明年夏天，那时美国军队就会在华北登陆，并给予八路军以军事技术援助。那时，他们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就会有事可做了。”其实，他把这些干部留在延安是为了继续“洗脑筋”。只是在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毛泽东才急忙把干部派往各地。

当时许多干部都说：“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真行！他们的军队不仅解放了我国的五个省(东北三省和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我们的几千万同胞，而且把我们从集中营里解放了出来，使我们摆脱了‘整风’！”这虽是半开玩笑讲的话，但其中包含了与真实情况相符合的评价。

延续了四年的“整风运动”及其后果，当时已在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上以及在作风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运动遭到了巨大损失，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每年中的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开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今天，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在四十年代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整风运动”，实质上是反列宁

主义、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反动的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先例。后来它又以各种运动形式——“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四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向解放军学习”、“培养接班人”等——加以重复。这些运动的实质始终都是同一的。与此同时，“整风运动”也是六十年代在他个人的倡议下，由他个人指挥的“文化革命”的演习。

“文化革命”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政变。

如果我们打算把毛泽东进行“整风”时采用暴力、恐怖和阴谋手段来折磨人的所有事实，把在四年中反对“整风运动”的那些人的坚定立场和英勇精神都记载下来，那么，一本书，即便是篇幅很大的书，也是写不完的。我所叙述的事实，应该说不过是悲渗情景的一般草图。不过我希望，这个一般性的草图会使读者了解到毛泽东进行的“整风运动”是反动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并使读者确信，“整风运动”是六十年代的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演习。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进程中伪造中共历史，并认为这种做法，如同开展“运动”本身一样，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事实毕竟是事实，只有在整风运动的条件下，他才能伪造中共历史；另一方面，只有在伪造中共历史的基础上，他才能开展整风运动。这两个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个因素“促进”另一个因素，每一个因素都是另一个因素的原因和结果。于是，毛泽东就利用这两支“毒箭”开始了篡夺党内领导权的生涯。本书所指出的只是毛泽东伪造中共历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组成部分。要把伪造的全部事实都确定下来，尚需继续进行研究。

第三编 “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

第一章 以“文化革命”为名，行反革命政变之实

从 1966 年夏季起，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旗号下，开始实现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政变。

这一反革命政变的首要任务是，以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

取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这个“思想”成为制定国内外政治路线和方针的惟一基础。

在对内政策方面毛泽东利用武力毁灭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镇压勤劳而富有天才和革命性的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遭到污辱和迫害(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李井泉、彭真、谭震林、乌兰夫、张闻天〔洛甫〕、陆定一、薄一波)或者遭到排挤(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毛泽东还无情地迫害中央书记处的绝大多数成员——王稼祥、谭政、黄克诚、罗瑞卿、习仲勋、王任重、刘宁一、杨尚昆、胡乔木、刘澜涛。他使 174 名中共中央委员中的差不多 140 人，即几乎五分之四的成员遭到残酷迫害。省市县区乡等各级党组织被破坏了。随之而来的是对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大规模屠杀与迫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遭到迫害。国家政权机关、共青团和工会各级组织，以及创作和学术团体都受到破坏。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代表，不论是党员和非党同志，都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杀害了。按毛泽东的命令，千百万先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和革命青年被打死，受迫害。

由于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大大超过了国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全部损失。

由于毛泽东的罪恶暴行而牺牲的全体革命同志永垂不朽！

从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起，毛泽东以他建立的假共产党来代替真共产党，企图把它作为反共反苏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陷入了灾难空前的深渊。

毛泽东犯下的这些极其严重的罪行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敌人。

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疯狂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竭力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甚至对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他武装侵犯苏联边境，企图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他疯狂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毫不隐讳要“消灭”他们的意图，并且全力以赴地破坏和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各国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他还千方百计妄图破坏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他助长帝国主义重新控制这些国家、纵容帝国主义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对这些国家实行侵略。他施展阴谋诡计挑起美苏和世界军事冲突。他就是企图通过这种途径来毁灭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他幻想在一场热核战争之后实现其对全世界完全统治的迷梦。他断绝了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关系，把国家拖进资本主义阵营，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犯下的这些极其严重的罪行使他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革命运动的叛徒，成为一切进步与爱好和平人类的共同敌人。

毛泽东在反革命政变过程中所犯的这些罪行证明了一条真理，即对内对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对内政策是对外政策的根源，而对外政策又是对内政策的继续。毛泽东利用国内的反共主义把反苏斗争的后方打扫干净，同时他借助反苏以加强他在国内进行反共的阵地。

他把反苏反共的行动作为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靠拢的手段。

关于“文化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所犯的种种罪行，我已在 1969 年发表的〈〈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里我不再重复。

最近几年反革命政变还在继续。政变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恶行径。他的罪恶活动是在“深入批修整风”、“继续深入斗批改”、“继续一‘打’三‘反’”①、“防止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这类口号下进行的，是在诸如“一次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运动”、“抵制王明、刘少奇假马克思主义者运动”之类的运动过程中进行的。

在这些口号下、在上述各项运动中，毛泽东在国内继续全力以赴地搜捕，迫害和屠杀先进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在每个机关，每个部队、组织、学校，每个企业，每个人民公社和每个家庭都能找出持异端思想的人。毛泽东的“破旧立新”口号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今后还将不断地屠杀他的敌人——不仅他自己的敌人，还有他的继承人，即老婆江青和女婿姚文元的敌人。他首先屠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中苏友好的支持者以及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便通过这种途径来达到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目的：“生前不被推翻，死后不遭谴责”。

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这些口号下，在上述各项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继续绝望地努力去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运动；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靠拢。

当然，他像以前一样把他的攻击目标集中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身上。这是很明白的，因为：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生动体现，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经验、最有权威和最强有力的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最伟大的成就、最强大的威力和最崇高的威望。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而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同志和战友。

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执行苏共第二十四大的历史决议，正在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和保证世界和平的伟大纲领。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把反苏作为自己的旗帜。反苏的中心内容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帝运动和世界和平。他进行反苏活动也是为了向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向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讨取欢心，求得谅解。他渴望同他们建立以反苏反共为目标的合作关系。

反苏是反共和亲帝的集中表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纳什?卡达尔同志曾经说过：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反苏的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d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反苏的共产党人。丁
正因为毛泽东的反苏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形式、以反共为内容的，所以，这不仅是他的反动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并且是他的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核心。

毛泽东向中国人民严密封锁了关于 1972 年 12 月在莫斯科由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的，有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民族民主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参加的纪念苏联成立五十周年联合庆祝大会的消息。毛泽东还千方百计对中国人民隐瞒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出色地总结了苏联在半个世纪以来列宁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和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就，全面地阐明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对内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因此我认为引用勃列日涅夫同志报告的那部分是恰当的，在这里他谈到了中国与苏联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现有关系，以及毛泽东集团对外政策的实质，以便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明确地认识这些问题，并且清楚地懂得毛泽东关于“苏联威胁”的叫嚣的虚伪性和挑衅性。

列?伊?勃列日涅夫是这样讲的：

“同志们，现在谈谈我们目前同中国的关系，确切地说，谈谈中国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采取反苏方针——实际上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方针——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继续把这个大家庭看作是他们实现大国主义意图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如果不加粉饰地说，那么，北京今天的对外政策方针是什么呢？那就是对苏联领土提出荒谬的要求，恶毒诽谤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诽谤我国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就是公然破坏限翻军备竞赛的努力，破坏争取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就是不断企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制造混乱，使发展中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立；最后，就是在反苏基础上同任何势力，甚至同最反动的势力——不管是英国保守党中最卖力时反苏分子还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复仇主义分子，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还是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进行无原则的勾结。

实质上，当前决定中国领导人对任何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的惟一标准，就是力图给苏联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力图损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对这一政策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反常的，其矛头不仅指向苏联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指向中国人民的利益，指向世界社会主义、解放斗争和反帝斗争的利益，指向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利益。

很清楚，我们断然驳斥这种政策。(长时间鼓掌)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似乎担心来自苏联的某种威胁。如果这种说法不是虚伪的，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答复我们从 1969 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关于承担明确的、固定的和经常性的义务以排除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犯的建议？如果北京真是担心中国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又不同意签订一项不诉诸武力的专门条约呢？而这样一项条约草案已于 1971 年 1 月 15 日递交中国方面。事实上这项条约的草案十分明确地指出双方(我引用原文)：‘将不使用武装力量以任何类型的武器反对对方，包括：1)常规武器；2)火箭武器；3)核武器’。不，中国领导人抱怨无中生有的‘苏联威胁’，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二章 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坚信无疑地指出，毛泽东以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政变为手段，力求借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谅解，达到同他们合作的目的。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反革命政变的方针使得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拍手称快。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盖斯?霍尔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在纪念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毛泽东集团执行反革命政策，所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不断地大肆颂扬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外交使节竞相前往北京，同毛泽东握手，表示自己的友好情意。当然，中美关系的所谓“突然转变”引起了舆论界的最为广泛的注意。毛泽东的心腹好友斯诺在北京居住了好几个月，他们之间进行了多次的秘密会谈，随后美国乒乓球队即来中国访问。不久，毛(1971 年 7 月 16 日)在中美官方报刊上同时发表了公报，公报证实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了长达 20 小时的秘密会谈，同时证实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已接受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这一早有传闻的消息。然后，双方报道了基辛格第二次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的消息，并且宣布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到达北京。

因此，尼克松的访华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这是毛泽东和美国的某些集团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众所周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亚非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历次会议上一贯要求驱逐蒋介石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正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坚决反对，还由于美国要求必须有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这项决议才拖延了若干年。可是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及其盟国却“突然”表决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人联合国，以取代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席位。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一立场是美中秘密谈判预先达成协议的结果。

正如各通讯社报道的，北京成了充满美国“客人”的城市。

每个美国客人都得到北京的殷勤而周到的接待。毋庸置疑，毛美合作一天天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毛泽东首先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讲坛发起反苏运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十分卑鄙地低毁并诽谤苏联，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他们在联合国会议上投票反对苏联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可是大家都知道，联合国会议就这一问题以多数票通过了决议。毛泽东则成了全世界和平的敌人、战争势力的拥护者。在安全理事会上毛的代表与美国代表一起站在野蛮反动的巴基斯坦军阀叶海亚?汗一边，反对七千五百万孟加拉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解放运动，反对支持孟加拉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苏联和印度。毛的代表对近东问题的态度有利于以色列和美国反动势力的活动。毛分子不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在

美帝国主义协助下进行侵略的正义斗争，他们也不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从他以武力占据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的决议。同时他们处心积虑地施展阴谋诡计，竭力破坏阿拉伯人民和支持他们正义斗争的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联合国内毛的代表日益频繁地同帝国主义势力串通一气。这一点，盖斯?霍尔同志他于 1973 年 4 且、29 日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所作的演说中已经指出。他说，毛主义的政策“几乎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区别。毛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下采取一致行动。例如，在联合国内毛的代表的发言就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代表的发言毫无区别。惟‘不同的地方仅在于毛分子发言中的詈骂之词比帝国主义代表发言里的更多”。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接近美帝国主义势力而执行反苏反共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从“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已或明或暗、时断时续执行了三十多年。

第三章 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现行方针的根源

为了了解当前毛的旨在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的政策，有必要对能揭示这一政策根源的基本事实作一次即使很简短的回溯。

1.1936 年秋，斯诺于保安(陕西北部)同毛泽东进行过多次详细的谈话。毛泽东和斯诺初次见面就像老相识一样。他们之间的谈话，不管是谈有关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不管谈论党和国家的事务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事情等等，都是极其坦率而透彻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了真正的心腹之交。

毛泽东当时对斯诺说，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是一个“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和门罗主义的坚决的拥护者”①。这句话至少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他想表明他是美国的忠实的拥护者；其次，他想说明他对美国执行的对华和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是坚决支持的。老练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斯诺当然会因此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斯诺发表他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没有白费工夫，它引起了季米特洛夫的注意和不安。1937 年 11 月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延安时，他托我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说明，毛泽东在与美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中，离开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季米特洛夫建议，党的领导人如无特殊的需要不必与这类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交往。

根据各类报道判断，斯诺从与毛泽东谈话中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毛泽东最大限度是一个农业改良主义者而绝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假如毛泽东将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未来还将获得国家政权，那么他将不会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他必然会变成苏联的敌人，变成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盟友。

2：1937 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3.1938 年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日战争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日本进攻阶段；作战双方相互僵持阶段；对日反攻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进攻，中国退却。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势均力敌，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无力进攻。第三阶段的特点应当是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时中国才转人对日本的反攻。

这些观点，尤其是等待日苏之间进行战争的观点，在当时是与美英法帝国主义者以及蒋介石

的意图相吻合的。他们也等待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坐山观虎斗”，当然还可以从中渔利。所以《论持久战》一文使帝国主义者更清楚地理解毛泽东的反苏意
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①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用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②。此外，我还请求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关于我们对毛择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吩咐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登此文(讲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意见是王稼祥在 1938 年秋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先后告诉毛泽东和我的)。

4.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发表了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宣布了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确定的三个阶段的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以便为其消极抗战的路线寻找根据。毛泽东的这种看法立刻得到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赞赏。日本侵略者把中国看做他们准备向南进攻美国或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所以不希望在中日战线上加强军事行动。蒋介石在武汉失陷后也不想积极地和日军作战，只打算为将来的反共斗争保存武装力量，所以他指望爆发日苏战争或日美战争。

此外，毛泽东在报告中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洋八股”。他以这种蛊惑人心的号召为掩饰，实际是进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他反对采用苏联经验，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党内的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因此，《论新阶段》报告也使帝国主义者更清楚地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轻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他的目的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苏和反共的性质。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作了《论武汉失守后的抗战形势》的发言。根据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原理，我阐明了中国的亿万人民只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并顽强地夺取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下最终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还批评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文中提出的错误路线。

5.1940 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他在书中公开反对列宁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性的理论原理。毛泽东公开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反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使帝国主义理论家们能够更好地识破毛泽东的内在实质：维护资产阶级，敌视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敌视社会主义。

6：1940 年 10 月毛泽东公开主张在国际舞台上执行一条使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军国主义同苏联结成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执行一条同日本侵略者结成联盟的民族叛卖路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月的一个夜里，延安《新中华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三日刊)编辑部的一个同志把第二天该报要刊登的材料送给我审阅(我那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新中华报》编辑部)。我注意到编辑部文章的标题是《论德意日苏的联盟》。

我问这位工作人员："这篇文章是从哪里来的？"

他回答说："毛泽东同志送来的。今天下午他主持了有报社编辑和中央宣传部门的一些同志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宣布国际舞台上必须贯彻一条建立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会上他宣称已经写好一篇《论德意日苏联盟》的社论，并嘱咐刊登在最近一期《新中华报》上。问题这么重大，难道他事先没有和政治局的同志进行过讨论么？"

我对报社的这位工作人员说："好吧！我去和他谈谈。"

毛泽东承认，他的确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同时他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成立英美法苏反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应当作的事不是去搞什么英美法苏联盟，而应搞德意日苏的联盟。"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说："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我问他："我错在哪里？"
他继续说："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

我对他说："你没有任何权利对这么重要的国际、国内政策问题单独作出决定。我和你的争论同样也不能形成决议。我建议按党的正常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即把你的意见发电报告诉斯

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些河题。”

毛泽东说：“现在不能发这个电报。这样的电报可能引起这两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愤怒。这不是开玩笑的！同时我也不同意马上就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

我问：“为什么呢？”

他回答说：“时机尚不成熟。再等半年左右，事态会说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那时我再给他们打电报，说我老早就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时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一定会给我回电说：‘毛泽东同志，你是正确的，我们都错了’。至于你，王明同志，那时你也将不得不向我承认你的错误，并且说：‘毛泽东同志，你是正确的，而我错了。’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将请同志们同意我的建议，目前暂且不把这些问题打电报告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也不在政治局进行讨论。”①
我问他：“假如就像你说的，过半年左右，事态证明你错了，那你怎么办呢？”

他武断地回答说：“我？我怎么会错呢？我认为我是正确的。”

我又问：“你认为你正确，这是一个方面。而事态将如何发展，是另一个方面。请回答我，假如事态证明你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你是否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发电报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是否在我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沉默了一会，没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历史事件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联合德意日的亲法西斯的国际路线和他的联日联汪的民族叛卖的国内路线是有害而危险的。然而他不仅没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过这些路线是不正确的，而且在法西斯侵略者进攻苏联之后，还积极鼓吹并进行旨在反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我们之间的谈话继续进行着，我对毛泽东说：“这样说来，你的文章就不能马上发表了。”

他不同意说：“这不可能，我已经开过会，发出了手稿。如果马上把它撤销，那太难堪了！我怎么有脸见人？！我建议文章照样发表，我向你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说明，文章的责任将由我自负……。”

他就这样似请求非请求地，终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他的这篇文章。

不言而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只能谈谈而已，丝毫也不能改变它们。但是接踵而来的事件说明毛泽东这个无原则的政治冒险家和阴谋家发表宣传德意日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文章，绝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所追求的目的在于掩盖他的亲日民族叛卖路线，同时利用这一口号作为借口，来为他对部队所下的停止抗日军事行动的命令和加剧国内军事冲突的做法作辩护。在国际方面他企图破坏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的威信。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共产党搞什么阴谋来反对他们，以企图把他们诱人陷阱。所以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

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相勾结的事实为武器进行反共宣传。幸好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所以蒋介石集团很难使人们相信在中共领导人中会出现秦桧①和汪精卫这一类的民族叛徒。因此他们利用上述事实作为反共宣传的尝试未能达到任何结果。

1955 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处决了。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胡均鹤当时背叛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在上述谈判过程中潘汉年成功地说服了他重新为我党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因为胡均鹤是三料货色的特务(他既是蒋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特务，而潘汉年却使他又成为了新四军在日汪阵营和蒋介石阵营中的反间谍人员)，所以他和潘汉年的谈判内容通过蒋介石的间谍机关，很快便成了美英在华谍报机关头目的宝贵财富。因此美英帝国主义者就会懂得：既然毛泽东甚至在日本侵人中国、全民起来抗日救国的情况下都能与日本结成联盟，甘当民族叛徒，那末，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毫无疑问也会和他们结成联盟。

因为许多党内外人士不了解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顺便在此对这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1954 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而像以前一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53 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终于不得不同意以当时毛泽东所信赖的人之一-邓小平代替他将来当选为总书记。

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人罗荣桓之手。为此目的，毛泽东突然给高岗背后一击，宣布高岗领导的反刘少奇运动是“清君侧”运动，也就是说，这次运动“名义上是反刘，实际上是反毛”，“反对刘少奇正是为了打击毛泽东”。毛泽东迫害了高岗(在他被害之后宣布为“自杀”并 “开除”出党)，便把高岗在东北大区的领导职务交给了罗荣桓。

可是革除高岗的真正原因却在于高岗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真心实意地执行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 1941)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

7.1941 年秋至 1945 年夏，毛泽东进行了旨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这次运动更加使帝国主义者确信，反苏反共是毛泽东观点的真正本质。

1948 年毛泽东曾对我说：“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罗斯福总统通过在延安的美国联络代表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要求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性质，断绝与莫斯科的联系。这是当作美国政府将来给予八路军以军事技术援助的交换条件而提出的。幸好我们当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否则我们现在就真正陷于困境了。”

虽然毛泽东形式上没有改变中共的名称和性质，也没有中断和莫斯科的联系，可是他推行的反苏反共的“整风运动”，实质上表明了他决心实现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要求。

在“整风运动”期间，白宫多次派遣负责的外交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延安和毛泽东会谈。会谈中毛泽东始终表现出反苏反共情绪，力求获得美国的援助，实现美毛合作。因此，194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和中缅印前线美军司令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的二秘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在回答谢伟思向他(毛泽东)提出的为什么着重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的重要性，而闭口不谈俄国这一问题时宣称：

“我们不能等待俄国的援助。俄国人在这次战争中损失很大，他们将完全忙于自己国家的恢复工作。”因此毛泽东试图说服约翰?谢伟思，使他确信“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利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相互协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样重视你们美国人所想的和打算要做的事情的原因所在。我们不能冒风险去和你们发生冲突”。

为了说服美国统治集团和垄断资本家给他援助、与他合作，毛泽东不惜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纲领污蔑为纯粹资产阶级的或仅仅是反封建的政策和纲领。例如他在和谢伟思的谈话中，要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策”，“甚至最保守的美国生意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反对的东西”。①那时他曾对 r.福尔曼说过：“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为解放奴隶而战。我们中国有着千百万受封建主义镣铐束缚的奴隶。”②
这里必须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纲领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也不仅仅是反封建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政策和纲领。非常清楚，他的这些说法的目的，是要美帝国主义者确信这样一个意见，即他只不过是一个土地改革家，而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比对资本主义更加仇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四十年代进行“整风运动”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乞求美“援”、探索毛美合作的可能性的时期。

至于毛泽东当时被这种思想纠缠达到何等程度，可就下面的事实来判断。1944 年 11 月下半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我裹着棉被躺在屋前的软椅上。毛泽东带着微笑突然朝我走来并且说道：“王明同志！我带来一件好东西给你看。”我请他坐下。他坐了下来，从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张小白纸。他把纸递给我说：“快，快看呀”！我瞧了一瞧这张长约 15 厘米、宽 10 厘米的小纸片。

上面写着三行英文字。第一行是：“毛泽东先生”；第二行是：“我感谢你的祝贺”；第三行是：“罗斯福”。字条左角上用铅笔写着四个大汉字：“看后即毁”。每个字下面都画有两个着重号小圈。

毛泽东继续说：“王明同志！得到这个电报以后我们同美国的事就好办多了！”

我说：“为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以前我们只跟他的僚属们打交道。这次他亲自打电报复我，今后我就能直接和他互通电报和书信，保持私人接触，进行对话，这就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不大相信地说："根据这封电报判断，不像是罗斯福愿意直接和你互通电报和书信并解决问题。"

毛泽东疑惑地问我："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这不像是他的正式电报。如果他愿意今后同你直接通电，那么他的回电应当即使不用美国大使馆的正式电文，至少也用美军驻延安的观察员小组的正式电文转交给你。而这个电文却是在普通的书写纸上用铅笔写了几个英文字。你怎么能证明这真是罗斯福总统发给你的电报呢？假如过一段时间之后，美国人说罗斯福从来也没给你发过电报，那么你就怎么也不能证明他曾向你发过电报。"

他瞪着眼说：

"难道这可能吗？！这是美军观察员小组的人亲自转交给我的。"

我问道："字条左角上的四个汉字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解释说："大概是他怕蒋介石可能打听到我们通电报，所以才叫我们看后即毁。"

我又问："假如罗斯福担心，蒋介石可千万别知道这封电报，那他怎能和我们直接通电以解决某些问题呢？"

毛泽东的面部表情立刻变得阴郁起来，笑容一点也没有了。

他沉默片刻之后，勉强笑了一笑说：

"照我看来，至少在这次直接通电之后事情总会好办一点。"

说完这话他抢过电报就走了。

毛泽东走后，我开始反复思索。我想起今年 4 月 1 日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他来和我"谈心"是有一定目的的。今天毛泽东是今年第二次来找我谈话。这一次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何他亲自把这封电报拿来给我看呢？近几年来他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他同美国人接触的情况。我推测，大概是毛泽东想在我面前逞逞威风，似乎在说："你瞧！我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有直接电报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今天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猜想是正确的。因为，那年(1944 年)9 月，苏军解放了保加利亚之后，在我回国的前几天里，季米特洛夫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像他的前几封信那样，被毛泽东无理地扣压并藏匿起来。他害怕我知道季米特洛夫给我的第二封信。所以他亲自把罗斯福的电报带来，以便说："看！季米特洛夫支持您，而罗斯福却支持我！"

8.1945 年秋，由于苏军进人我国东北并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整个亚洲形势根本改观，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掉过头来向苏联表示好感，以便使八路军能够进人东北并从苏联那里得到大量的军事技术援助。同时他又对战后中国在统一和建设事业方面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援助寄予莫大的希望。所以 1945 年秋毛泽东应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邀请，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相信当时的美国大使是可靠的裁决人。结果国共之间签署了真正右倾投降主义的"双十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共约九十万人，只能改编为九个师。而在这九个师中，共产党员只能编成三个独立师，其余六个师应当和蒋介石的部队混合编排。同时规定让出长江以南中共控制的全部解放区。此外，根据美、蒋和毛泽东三方协定，允许美军领导机关在延安和张家口开办两所军事学校，在美国军事人员的帮助下为八路军、新四军①培养干部。

这里有必要顺便说明一下与毛泽东签署该协定有关的若干情况，因为该协定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十分屈辱，毛泽东担心他不能在党的面前、在我军革命战士和将领面前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因而起初他不敢在协定上签字。可是蒋介石玩弄"杀鸡给猴看"的一贯手法，为了恫吓毛泽东，他把云南省司令长官龙云逮捕起来。同时赫尔利也吓唬毛泽东说："这是最后的条件。你不签字，今后就不可能再进行谈判了。"毛泽东屈服了，签了字。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毛泽东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而忽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被敌人的威胁吓得几乎失去了理智。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向中央的同志抱怨说："在重庆期间，我的神经过分紧张。现在还感到十分疲乏。体力衰退，时常心动过速，头昏，失眠，梦中出汗"。他患了半年多神经衰弱症。

直到全国范围内国共之间的战争开始时，毛泽东还在幻想由美国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俨然是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建议)。

毛泽东梦想，似乎美国会有助于和平统一中国。虽然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大规模地整编和武装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积极准备反共内战，尽管从 1946 年下半年起在华北、华中各地区国民党部队不断进攻中共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毛泽东还一直相信美军代表扮演裁判角色的"调停小组"能够制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所以，1946 年秋毛泽东邀请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访问延安，希望通过他达到与国民党媾和。尽管 1946 年冬阎锡山的部队在山西省开展了广泛的反对八路军的军事行动，

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江苏北部七次进攻新四军，毛泽东仍然继续幻想依靠美国的帮助和平统一中国。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希望纯属幻想。1947 年初傅作义的骑兵部队通过突然袭击占领了我军驻守的张家口。因这次胜利而欢欣鼓舞的蒋介石于 3 月 14 日正式发布了“讨伐共产党人”的命令，于是全国规模的内战就开始了。然而毛泽东只是在他的五一口号中才第一次提出：

“打倒蒋介石”。

9.1947 年至 1949 年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与美国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既相互敌视，又寻求相互合作。蒋介石同美国缔结了实际使中国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中美条约”，因为蒋介石当时还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领土，拥有两百多万军队。杜鲁门政府采取了武装蒋介石军队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美帝国主义者那时不相信毛泽东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扭转到反苏亲美的道路上来。他们懂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导致远东和整个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巨大变化。

然而这一政策终归没有恶化同毛泽东的关系。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进人战争结束阶段，白宫又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这说明蒋介石完全失去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面临不可挽回的失败。当时白宫未下决心派美国武装力量直接参战扶蒋反共，是由于担心这一步会引起苏联方面的相应反应。美国统治集团不采取这一步骤，还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毛泽东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本性。以下事实正说明白宫的意图：当时在华北和华东部署了美国陆海空军事力量六十多万人。他们避免同人民解放军冲突，在有解放军出现的地方他们就迅速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当时驻南京的大使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通知毛泽东：美国愿意向中国新政府提供二十亿美元为期五年或十年的长期贷款，条件是中国新政府将不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也是准备迎合美国的。他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不向美军开一枪一炮。政治上他沿袭“门户开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国合作。

这一点已为毛泽东 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总的政治路线清楚地证明了，国内外政策都是在这条总的政治路线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和由此而制定的国内外政策当然首先是他的反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及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

毛泽东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路线的，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之时即转人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坚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建设非社会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路线。他还举出四条论据来“论证”他为什么拒绝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四条论据是：

1)“存在帝国主义”;
2)“土地革命尚未完成”;
3)“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发达”;
4)“民族资产阶级仍参加革命”。

显然，四条中只有“土地革命尚未完成”一条同帝国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条意珠着只要“存在帝国主义”，毛泽东就不打算执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第三、第四条也证明毛泽东信奉资本主义，并且证明他不愿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在对内政策方面，他鼓吹“统筹兼顾政策”，这个政策包括以下四点：

1)“既关心公共利益又关心个人利益”;
2)“既维护工人的利益又维护资本家的利益”;
3)“城乡互助”;
4)“内外市场交流”。

很清楚，这一政策的前两点具有非社会主义性质。另外两点，骤然看来似乎不会引起特殊的反感。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说过的毛泽东 1944 年与美国军事代表谢伟思谈话的一段情节，那么，显而易见，这两点必然会直接促进毛美经济合作。

当时毛泽东声明：“美国和中国经济上互相补充，因为他们之间将不互相竞争”，“中国不要求发展大型重工业……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保证自身的市场供应，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帮助我国发展经济，美国是最合适的国家，他们是完全能够参加这一合作的惟一国家”。我们也会想到毛泽东曾对美国人讲过，希望美国供应中国工业品，而中国向美国提供农产品等等。根据这些说法，十分清楚，毛泽东的这两点不仅涉及对内政策，而且涉及对外政策。密切注视着毛泽东所作所为的白宫官员和美国的中国学家们应当对毛泽东的政策真正感到满意。

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继续执行以下方针：“至少在最初若干年内新中国将不需要英美苏三大强国的承认，以免他们干涉我国内政。”这里他有意识地把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混为一谈。他那时追求的目的和今天他恶意宣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样。这就是欺骗舆论、诬蔑苏联，以及企图掩盖他反苏、亲美、亲英的本质。

可是当时的国际条件和国内形势不允许毛泽东公开执行反苏亲帝政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对中国采取了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宣告成立，苏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苏联在政治、外交、财经、科技和文教方面，以及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向新中国提供了全面的援助和支持。仅仅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亲帝反苏的阴谋才得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人民所识破。

10.1950 年秋到 1953 年夏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在此期间毛泽东一如既往，始终为保持同帝国主义者的友好关系而忧心忡忡。这一点刘少奇那时对我谈及的事实可以证明。

1952 年 11 月 10 日晚 8 时，刘少奇(他当时来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还在莫斯科)邀我谈话(我在莫斯科治病)。当谈及朝鲜战争时，他说："……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志愿军去抗美援朝。

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作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作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所谓光荣，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光荣，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既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阿瑟集中轰炸沈阳至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阿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阿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一'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仗，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

由此可见，还在那个时候维持这种"友谊"，对毛泽东来说，就比帮助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抗击美帝侵略更为重要。还在那个时候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亲美狂和恐美症就已如此根深蒂固。

11.1954 年至 1957 年是中美连续谈判、准备进行毛美合作的时期。1954 年就印度支那问题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以后美毛经常接触扫清了道路。朝鲜战争和台湾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导致了毛美关系的暂时紧张状态。可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中美代表很快就把过去的不和置诸脑后并重新取得了相互谅解。

那时双方就已决定他们以后经常接触的方法和步骤。华沙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正是当时相互接触的既定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竭力把谈判内容严密封锁起来，不让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知道，他害怕暴露其丑恶的勾当。至于美国国务院，它也仅限于发出声明，宣称美国同北京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在华沙谈判中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就。这些事实表明，中美代表在华沙进行的一百多次会议确实为毛分子与美国某些集团的进一步接触铺平了道路。

12.1957 年至 1965 年是毛泽东积极准备反共反苏"文化革命"的时期。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亲自秘密策划的。开始他假惺惺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同时他又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他的指示，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开导并鼓励人们不要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他采取这些手段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试图查明，谁继续批评他的错误，尤其是批评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错误，也就是批评他不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政治路线。第二，他试图查明，谁同情苏共二十大对个人迷信的谴责，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批评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毛泽东为了找到借口迫害那些敢于批评他的错误的人们，还通过他的特派员专门驱使、甚至以武力强迫某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公开在会上和报刊上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后来，他利用这些“事实”，给所有从原则立场出发给他提出批评的人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评过他的错误的八十万人在“反右派”

运动中遭到了迫害。实际受害人数还不止这个数目。其中有许多党的干部、文艺活动家以及民主党派和团体的大多数领导人和成员。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 1958 年至 1960 年推行了“三面红旗”

冒险主义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几年就超过苏联。结果毛泽东一败涂地。于是，他从 1960 年 4 月开始就转而发动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思想政治斗争，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毛泽东的污蔑性不实之词遭到绝大多数兄弟党的遣责。

1962 年毛泽东在国内正式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他首先打击以刘少奇为首的部分领导同志，然后把许多二十——三十年代就已知名的文艺活动家予以放逐，把这个叫做“下放”。

1963 年毛泽东提出了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五条建议。当时他通过收买和欺骗开始在各个国家拼凑反苏、反共、亲毛的“第五纵队”。

1964 年至 1965 年他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和“培养接班人”的运动，把军队置于党和人民之上。同时他还开展了一些别的运动，指望达到神化他个人，愚弄青年，并引诱他们“跟随毛主席一道去经风雨见世面”，利用青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个别部队为实现其反革命军事政变准备条件。

毛泽东的所有这些反苏、反共活动和分裂活动都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集团的同情和好感。1964 年和 1965 年白宫先后把斯诺、李宗仁派往中国与毛泽东密切接触。

13.1965 年至 1970 年是毛美关系空前发展的时期。1965 年初，毛泽东公开拒绝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共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战争的建议，并且阻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越南以积极援助的行动。正当美帝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毛泽东积极准备“文化革

命”的时候，斯诺和李宗仁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北京。正如 1971 年 5 月斯诺在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报道的，关于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向他声明，“中国人只有在美国人进攻他们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中国人自己有许多事需要做。”毛泽东就这样使白宫知道，中国对越南战争所持的立场是“自扫门前雪”，鼓励侵略者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关于中苏关系，斯诺写道：“刘少奇想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 1965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以便恢复中苏联盟。但毛持反对立场。他主张……开展人民战争反对美国，也反对苏联”。大家知道，毛泽东从来就是真反苏，假仇美。所以，谈到“反美”战争时，他就只制造烟幕，并在此烟幕的掩饰下准备反苏战争。不言而喻，毛泽东和斯诺这样的老朋友无疑反复地讨论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和如何开展等问题，尽管斯诺没有写过与此有关的报道。

李宗仁是美帝国主义的老奴才。他作为“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是反共战争的一个主要角色。1949 年反共战争失败后，他侨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了十七年。可是突然间他回到中国来了。

他一到北京，就马上被毛泽东推上贵宾席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然后李宗仁周游全国各大城市。在旅游期间他大叫大嚷地宣传“反帝必须反修”的口号，因此促进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大家都清楚，他的反帝斗争的号召只是一句空话。而他的“反修”斗争的号召就其内容来说恰好与毛泽东的计划一致。在国际上这意味着反苏、反社会主义各国，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则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先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最有觉悟的革命战士。

众所周知，斯诺和李宗仁实际上是白宫的代表，反映了官方集团的意见。他们俩的北京之行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即是受白宫的委托去了解“文化革命”的准备情况，并表明他们对“文化革命”的积极态度。

从 1966 年夏季起，毛泽东借口“文化革命”实行反革命政变。同时他渴望取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信任并开始在反苏反共的基础上同它们进行合作。毛泽东没有失望。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多次宣布，他们希望“尽快调整美中关系，建立远东地区的美中合作”，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会议也声明：“白宫寄希望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符合美国利益”。随后美国一些有势力的集团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希望和毛分子改善关系，进行互相合作，并且为了“促进相互谅解”开始进行各种贸易、外交和政治活动。

因此，在 1965 年至 1970 年间，毛泽东和美国有势力的集团双方都为实现相互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14.在 1970 年夏至 1971 年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和斯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大家知道，还在 1936 年毛泽东和斯诺从第一次会见时起，他们就成了心腹之交。历史的事实说明，斯诺是一个调停人，毛泽东通过他保持了同美帝国主义集团的秘密接触。所以，每当毛泽东谈到斯诺时，他总是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地说：“我能闻名于全世界，尤其是闻名于美国，使美国人了解我，主要的功劳应当属于斯诺。”1971 年 2 月，斯诺在和毛泽东就毛美合作的各种问题多次密谈之后离开北京时，他们就像以坦率交往为特征而早有默契的密友一般分别了。这一点可以根据多种材料和 1971 年 4 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斯诺《与毛泽东会谈》的报道来判断。在会谈期间，他们不仅涉及到美国总统访华的有关问题，并且

涉及到毛泽东必须进一步同那些主张与苏联友好、反对靠拢美帝的势力作斗争等等问题。斯诺在《生活》杂志的上述报道中写道："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① 事实表明，毛泽东这些悲观论调的意思是：从"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实际上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而他还要把那些最可靠和最亲近的人(包括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和毛泽东最亲密的核心人物陈伯达等人)都"清洗"掉，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他的敌人。他越来越感封自己孤立无援，他绝望地等待美国会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当然，我的以上论述并未包括毛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方针的各个方面。但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毛分子与帝国主义的亲近不是突然的，而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活动的结果。

第四章 毛泽东堕落的根本原因

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怎么会堕落到背叛革命这样可耻的地步？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他的思想、理论、历史和社会的根源。

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反革命的实用主义。所以，尽管毛泽东已投身于革命队伍，却始终背着这些思想包袱，而他终于带着这些思想包袱跑去和反革命分子为伍了。

理论根源：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及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者”外衣掩盖了真面目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简直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以，尽管他已投身于共产党的队伍，装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但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以反科学的、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去冒充十分科学的革命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历史根源：毛泽东的活动不仅是他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和反苏活动的冗长的历史，不仅是他个人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上犯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在许多情况下则犯有严重罪行的历史，并且是他在共产党内思想上崇拜帝国主义的冗长历史。所以，他终于从一个手里打着共产党旗帜的假共产党人变成了以“共产党”旗号伪装起来的真正反共分子。

社会根源：在历次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所持的立场都基本上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带有破了产的、失去阶级性的小私有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习气的深刻烙印，而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行动甚至带有封建地主的气味。在这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反无产阶级性质就表现出来了，而他终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道路。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不可能更为详尽地论述毛泽东堕落的根源。

可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变为阶级叛徒和民族变节者的原因，有必要简短地探讨一下对他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根源，即封建帝王思想。中国封建帝王的传统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子”的自我中心思想，也就是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把自己神化，奉为天(神、最高的神灵)的儿子，奉若超人。他不能把所有其余的人视为平等的人，因而也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所有其余的人(本国同胞和外国人)命里注定就是他的臣民和奴隶。这就是毛泽东无耻到使人发笑的地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他自我神化，自称“红太阳”、“仙猴孙悟空”，他自认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惟一伟人”，把自己叫

做“新皇帝”。封建帝王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天朝帝国”的中国中心论，也就是专制君主把自己的王朝加以神化，把它视为神的意志和事业的化身，否认和其他国家的平等关系。

这些国家自然都是它的部属或附庸。这就是毛泽东的妄自尊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他日夜梦想由他的毛王朝来统制亚非拉、称霸全世界。

同时必须指出，中国封建帝王的传统思想是某些封建王朝仅在其繁荣昌盛时期的主导思想。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朝代、它们在衰落的时候不仅要向比它们更为强大的异邦王朝纳税献贡，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它们的统治者为妻，向这些王朝上书称臣，甚至皇帝也卑躬屈膝自称“儿皇帝”，仅仅为了保存其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在这样的时期“天子的尊严”和“天朝帝国的至高无上，完全被置诸脑后。衰落王朝的这类思想和行为，也就是当年毛泽东亲日民族叛卖路线和今天的亲美民族叛卖方针的思想根源。

第四编 “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

第一章 毛泽东为什么成了“孤僧”？

第一节 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成为“孤僧”，绝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他的思想错误及其错误的政治路线演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最近，毛泽东常常重复地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的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如果哪一个共产党员不断犯着思想错误，并且忠实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时又不愿倾听党的领导机关和同志们的批评意见，一味坚持和加深自己的错误，那么最后他必然走上叛徒的道路，即：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走上背叛共产党、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道路。托洛茨基正是这样走上叛徒道路的。陈独秀同样走上了叛徒的道路。毛泽东也是这样走上叛徒道路的。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不断地犯下了严重的思想和政治错误，并且执行了“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从中国革命胜利到现在，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错误不断向纵深发展，他完成了背叛共产主义思想、充当帝国主义帮凶的演变过程。被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所鄙视的毛本人不得不自称为“孤僧”。

第二节 迫害和消灭所有“亲密战友”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成为“孤僧”这一事实，也是他施展阴谋手段和残酷迫害同志，使与他最亲密和对他最忠诚的人成为牺牲品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对共产党员和自己同志——革命者所施行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我只举几个例子，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是怎样背信弃义和残酷地对待那些在不同时期他依靠过的、曾经被视为他的“亲密战友”和“同盟者”的人们的。这些事实足以使人明白，为什么他会陷人背弃亲密战友的“孤僧”的境地。

1927 年秋，毛泽东奉党中央之命到井冈山领导农民武装队伍。当时农民队伍还缺乏战斗经验。毛泽东只能依靠早已在井冈山进行活动的、由起义的赤贫农民组成的王佐和袁文才的队伍。正是由于同这些队伍的战斗合作，毛泽东才能在井冈山坚持下来并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1927 年冬，朱德率领一个团的革命战士来到井冈山，接着，1928 年秋，彭德怀和黄公略也率领起义部队来到这里。此后，毛泽东采取了中国军阀惯用的“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王佐和袁文才，并解除了他们部队的武装。

三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承认：“经过几年以后，现在看来，王佐和袁文才被处决是冤枉的。无论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部队基本上改造得不错。”

只是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和其他同志到来后，井冈山才成为能够独立作战的军事单位和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军事一窍不通。遗憾的是，黄公略于 1931 年国民党飞机轰炸时牺牲了。在国内武装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多年来主要是依靠朱德和彭德怀。然而，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1935 年 1 月)掌握了党的军事领导权不几年以后，他就在四十年代前半期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对朱德和彭德怀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指责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他们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文化革命”。彭德怀遭到残酷镇压。

毛泽东所以能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上篡夺党的最高军权，主要是由于有了“毛——洛联盟”，也就是他利用了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帮助。可是，到了四十年代“整风运动”时，他们却成了毛泽东无情攻击的对象。最后，在“文化革命”中又双双遭到迫害。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能够进行“整风运动”，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是由于有了“毛——刘联盟”，早在 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就着手建立这个联盟。然而到“文化革命”时，他却给刘少奇扣上诸如“内奸”、“工贼”、“叛徒”、“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的帽子，并且对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至于林彪，那么从 1933 年起毛泽东就已千方百计地使林亲近他，并要林做自己的“接班人”。当时林彪并不信以为真，而是把它当作笑话告诉了博古。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先是滥用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地位，以后又滥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此时也企图把林彪拉到自己一边，把林当作自己的军事支柱。关于林彪对毛的利害关系问题，毛泽东和我的两次谈话就能略为说明。

第一次谈话是在 1939 年春，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
“王明同志，为什么您要挖走我的林彪？您听着：挖我的这堵墙是不允许的！”

我当时十分惊讶地问他：
“您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他反问我：“为什么去年夏天您在汉口隆重欢迎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讲了称赞林彪的话？”

我回答：“我讲这些只是因为指挥著名的平型关战役的林彪将军也是年轻人，这怎么能说我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怎么能说‘挖’您的墙脚？”

他继续说道：“既然您说了称赞他的话，这就是说您挖了我的墙脚。您听我说：我搞军事已经二十年了，这期间只有林彪一个人和我交上了朋友。他真正是我的人。他的军队真正是我的惟一的军队，我只能依靠这支军队。其余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不是我的。所以，您必须慎重，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挖林彪这堵墙。”

第二次谈话是在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当时武断地说，我在全会上的发言有十大“毒素”。其中两个正是涉及到林彪的。

当时他问我：
“为什么您在二中全会上又讲林彪的好话？为什么您赞扬他叙述军事形势具体而生动？要知道，早在十年前我就跟您说过：称赞林彪就是挖我的墙脚，我的军事支柱。现在您又来赞扬他，难道这不是放毒吗？”

我回答他：“十年前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的看法是，党的一切干部，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属于党的，把他们分成‘我的’、 ‘您的’、‘其余的’或谁私人的，都是荒谬的。因此我的发言根本无意把林彪‘引诱过来’，并使他成为‘我的’人。您说过，你们之间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但是，难道只要谁讲了林彪的好话，他就要成为‘引诱者’？”

从这两次谈话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依赖林彪到了什么程度，他是多么需要林彪；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又是多么没有把握。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骑墙态度主要说明，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在共同的斗争目标和理想下团结起来的战友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滥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党中央主席的地位，通过施加压力和许愿的方式拉拢林彪，使林彪成为自己的军事支柱。然而，林彪追随毛泽东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在“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决定不直率地把自己伪造党史及其他鬼蜮伎俩和阴谋诡计

告诉林彪。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以外，还可以列举一些我亲自经历过的事件来谈谈，这些事件表明，林彪并不是始终地、在一切方面都同意毛泽东的。

1．1937 年 12 月，在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就如何评价平型关战役和我党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了两点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平型关战役超出了游击战的范围，它具有运动战的性质，今后不能再重复这类战斗，因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而不能去打运动战。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项英，新四军的名义副司令、实际领导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其他同志认为：

平型关战役证明，在有相当准备和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今后也还能打类似的仗，以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我们的军队还缺乏品种比较完备的现代化武器时，作为主要斗争方式的游击战，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应该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但也不应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因此，会上还讨论了由我转达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以建立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来源，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此外，斯大林还请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转达："炮是现代化战争之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首先建立炮兵部队。为了能够修理炮、机枪、步枪和其他武器，自己也要生产器械和弹药。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兵工厂，为此我们将提供一切设备和技术人员。"政治局的全体同志，除毛泽东一个人外，都拥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这些建议。

毛泽东却说："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我们为什么要炮？我们为什么要建兵工厂？这些只能给我们添麻烦。"

他的意见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当时不是政治局的成员，所以他未能参加可以谈出自己意见的政治局会议。但是，我从同政治局同志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林彪是反对毛泽东的观点的。

2.1948 年 11 月，有一天我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正赶上他在生气。

我就问："毛主席，谁惹您生气了？"
他回答："林彪！……"
我又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回答："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法拿下长春，迫使驻防军投降……"

3.同年 12 月，我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又碰上他在生气。

我问道：
“毛主席，您为什么又在生气？”
他说：“又是因为林彪。”
我又间：“为了什么呢？”
他答道：“又是他不听命令！我给傅作义写了最后通牒，把它寄给了林彪，让他把最后通牒交给傅作义，要求傅立即投降。

否则我们将立即发动总攻，并且全歼他的部队。林彪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去听邓宝珊式的调停人的建议，他们说什么：傅作义是北方人，脾气固执，不会投降的，不过有可能作为‘起义者’转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向他提出最后通牒，那么他就会调动他的三十万军队同我们决一死战。在失败的情况下他会坐飞机跑到南京去，而结果是北平及其周围地区将为战争所破坏，这对我们太不利了。就是因为这一点，林彪还在等待傅作义‘起义’，并且对我的多次命令都不予理睬。”

由此可见，林彪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往往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在所有方面都盲目服从毛泽东。

然而，在军事方面毛泽东不能不依靠林彪。因此在 1959 年，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后，他就任命林彪担任这一职务，从那时起林彪即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毛泽东还命令林彪千方百计地在军队中灌输对他的个人崇拜，开展所谓“学雷锋”的运动，实际上是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类口号的运动，使盲目服从毛泽东的思想深人到部队战士中去。毛泽东在开展“向解放军学习”和“培养接班人”运动的同时，还打算更广泛地开展对他个人无限崇拜以及为正式宣布林彪是自己的接班人创造条件的运动。

从“文化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更加积极地利用林彪来大肆吹捧自己和自己的“思想”，而毛的宣传机器也照样不分昼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最忠”，“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到了所谓的九大时，党章中就正式写上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然而过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突然发生了所谓“九月事件”，与此同时，林彪，他的妻子叶群，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员邱会作全都因此而销声匿迹了。这六个人中，除林彪外，其余五人都是根据毛泽东的特别提议在九大时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这次意外的所谓“九月事件”恰巧发生在毛美关系“突然改善”的时刻，即发生在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基辛格两次到北京之后，以及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刻。世界许多国家的报刊都

明确指出：毛美的亲近和毛泽东同林彪的决裂两者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的。

1941 年 9 月，毛泽东让陈伯达当自己的私人秘书和作为“整风运动”的助手。从那时起毛泽东逐渐使陈亲近自己并助长了陈的钻营思想。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国内和国际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评论，写了文章，以便获得必要的“声望”和影响。毛泽东接连不断地提拔陈伯达，从候补中央委员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使陈成为自己集团中最受信任的人物之一、毛泽东不仅自己常常宣扬陈伯达是“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讲解员，而且竭力使这种状况成为公认的事实。“文化革命”时，毛泽东任命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组长。虽然这个任命只是名义上的 (因为“小组”实际负责人是江青)，然而这一光荣的职务毕竟是政治上对陈特别信任的标志。但是，1970 年 8 月，斯诺来北京后不久，陈伯达就突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再出现了，而在 1971 年“九月事件”时，根据各方面来的消息看，陈伯达同林彪等人一起消失了。

毛泽东常说，从井冈山时期起他就有了四个“亲密老战友”：

罗荣桓、谭政、罗瑞卿、何长工。“整风运动”后，他也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又添了几个新的“亲密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彭真、高岗、陆定一和周扬。1954 年高岗就被毛泽东除掉了；罗荣桓于 1962 年病故；后来，在“文化革命”时，毛泽东对他所有的新、老“亲密战友”一个不剩地统统进行了迫害。

第三节 “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的必然结果

因此，毛泽东变为“孤僧”是他亲自领导的“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公开走上叛徒道路、为了反苏、反共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勾结的结果。

毛泽东执行九大路线的最大失败是“林彪事件”和它所引起的极其严重后果：因矛盾和争执而发生分裂的毛的集团陷人了空前未有的困境，并处于随时可能发生的“风云突变”的状态之中。毛泽东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不过成了一句空话，因为进一步的分裂和更大的失败已经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感到自己是失去了权威，失去了自己拥护者的支持和帮助的“孤僧”，而在十大时他已经成了“太庙中三缄其口的偶像”。

第二章 毛的十大的国内外政策

据中国报纸公布的材料，中共十大于 1973 年 8 月 24 日召开，到 8 月 28 日结束。但是，就各方面的可靠消息来看，它在 8 月中旬就开始了。由于长时间争吵后造成的种种困难和意见分歧，最后仅仅公布了两个报告、党章、公报和一些中央机关成员的名单。大会就这样草草收了场。

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界完全不了解，毛泽东指定的、参加十大的一千二百四十九个代表中(除两个宣读报告的人以外)有多少人参加了讨论，他们都发表了什么意见。也不了解，“主持了这次大会”的毛泽东本人是否讲了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他是否讲了话，然而决定不发表自己的讲话或者根本不讲话，都很明显地说明，他是陷人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根据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十大批准的毛泽东的政策更为反动，其目的则更加卑鄙。因此，贯彻十大路线只能导致比九大以来更大的失败。

第一节 十大对内政策的主要环节

从已公布的材料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十大所采取的对内政策和相应的组织措施旨在维护其个人的反动统治，并为把政权让给江青准备条件。这就是十大通过的对内政策的主要环节。

这一点在十大时被认为是中心问题的所谓“林彪事件”上得到了证实。为什么毛泽东把林彪从自己的“接班人”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引起“林彪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周恩来宣读的毛的“政治报告”中提到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如何解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因此，毛泽东拒绝了他们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而另外起草了一个报告，委托林彪在大会上宣读。

即使根据上面引用的毛的政治报告中的片断也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毛泽东在九大以后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而斗争，这就意味着继续进行反动的“文化革命”，在“反对资产阶级”口号的掩盖下打击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保障他们经济上的资本和利润，政治上给予信任和优待。

第二，林彪和陈伯达反对毛泽东继续进行“文化革命”，九大以后他们主张“发展生产”，以便使“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换句话说，停止“文化革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早在中共八大时，刘少奇同陈伯达和毛泽东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原则的争论。

为什么从四十年代初就受到毛泽东信任的“代言人”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刘少奇和陈伯达，还有三十多年来一直受毛泽东栽培的、他的“接班人”林彪，都一个接一个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了他的对手和敌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他们几十年来天天同毛泽东打交道，不仅了解毛泽东的一切幕后秘密，而且亲眼见到他的“思想”、国内外政策的一连串错误及其惨重的后果，当问题发展到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公开反革命政变——“文化革命”时，连他的“代言人”、“理论家”和“接班人”也不得不起来反对这个反革命和叛徒了。

正如周恩来在同一报告中所述，毛泽东宣布林彪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是因为：林“1970 年 8 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1971 年 3 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9 月 8 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这些文件伪造得如此笨拙，只能使人一笑了之。

因此，十大前，当周恩来接受命令，向美、英记者就“林彪事件”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时，听众就公开地说，这好像是神话。由此可见，毛泽东捏造了假的犯罪材料，作为骤然迫害林彪的口实。然而，仅仅根据这个说法也能使人明白，“林彪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毛渴望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打算，也受到他的“接班人”和“文革小组”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最后，必须指出，毛泽东迫害林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实际上他从来也不愿意让林彪当自己的“接班人”。他口头上抬举林彪，而实际上是准备条件把权让给江青。关于这一点我在 1969 年 3 月写的《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书中已经指出过：“毛泽东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只有几个人。

而其中毛泽东最亲近和最信得过的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因此，毛泽东人为地在他的等级阶梯中把江青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林彪。”

根据十大决议，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的做法是，给林扣上诸如“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一类侮辱性的帽子，而对陈伯达，则宣布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说他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并“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公报中还宣称：大会代表“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这些“其他主要成员”是谁？毛泽东不敢公开讲这件事。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同林彪一起销声匿迹的除了他的妻子、政治局委员叶群外，还有四个政治局委员，并且其中三个是陆、空、海三军总司令，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此外，原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到哪儿去了？

从 1971 年“九月事件”起，毛泽东就在党内、政府机关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大规模地清洗所谓“林彪集团”的成员。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受到了清洗和迫害？关于这一点十大公报的执笔者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透露任何东西。对毛泽东来说，这个事实是很典型的。

从“九月事件”开始到现在，毛泽东经常号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要，三不要”的口号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又被当作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写进了新党章。

用漂亮话来掩盖暴行，是毛泽东惯用的阴谋手段。

例如，他把自己的反列宁主义、反苏、反共的反革命运动称为“整顿三风的运动”；把自己的反革命政变叫做“文化革命”，即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他还把自己反对林彪和陈伯达的阴谋活动说成是被人故意歪曲了的。

一般说来，毛泽东在宣传方面一贯采取随机应变的方法，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以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使他们不能及时而全面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所有这一切都是蒋介石惯用的老办法。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实现了反共政变之后，他声称，这次政变“保卫了国民革命，清除了反动分子”。他勾结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同时却诽谤共产党人是“民族叛徒”。他每天都在从事反革命活动，但在“纪念周”会上却捶着自己的胸脯叫嚷：“我，蒋介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如果你们不论什么时候发现我干了反革命勾当，那么任何人都有权枪毙我！”对此，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说了大实话：“蒋介石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蒋介石是毛泽东常说的三个“教员”之一(其余两个“教员”是“帝国主义者和贫穷”)。毛泽东不仅从蒋介石那里继承了说好话、办坏事的本领，而且在各方面都超过了蒋介石，正如著名的中国成语所形象描绘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后来居上”。

显而易见，毛泽东被“林彪事件”吓坏了。首先，1971 年“九月事件”以后，虽然这一事件在中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很久没有表态，没说一句话。后来，他悄悄地在全国范围内对军事政治于部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和迫害，而在中国报刊上只公开宣布了反对“刘少奇一类的骗子”

的口号。经过两年“大规模清洗”和迫害之后，十大公报中还强调：“大会指出：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而政治报告中则预告“还会出林彪”，还会不止一次地出“林彪事件”一类的事件。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对党、政、军干部不断进行清洗和迫害，才导致了“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林彪事件”的出现又必然引起对党、政、军干部新的不断的清洗和迫害。结果，毛泽东在自己同党、政、军干部的关系方面陷人了无法解决的矛盾的绝境中，这些干部彼此间都抱着不断增长的互不信任和仇视的态度。

其次，这一点还可以从另一个事实上得到证实：毛泽东在十大公开宣称，今后他还要不断侮辱和迫害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

在周恩来宣读的毛的政治报告中这样写道：“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毛还打算“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地重复自己的罪恶行径，侮辱和迫害党、政、军领导人，同时也侮辱和迫害成千上万党、政、军、群众组织和其他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正如他侮辱和迫害林彪、王明、刘少

奇、彭德怀、高岗一样。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和行动，都是他的“吐故纳新”“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这一概念的涵义是，对革命干部和劳动人民的迫害应当像人体中的血液循环一样源源不断地进行。毛所迫害的对象是十大公报中列举的各个时期的干部和党员，其中不仅有“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有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各条战线的干部，解放后至“文化革命”前成长起来的干部，而且还有“文化革命”中刚提拔的年轻领导人和干部，以及这个时期新人党的青年人。

“文化革命”开始时，“文革小组”由十七人组成，而现在只剩下了江青、姚文元和张春桥。关于当时那些十分卖力的领导人和红卫兵的传说，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因此，毛泽东对领导人、干部和党员进行迫害和清洗的打算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现在和“文化革命”初期不同，毛泽东不会命令红卫兵扛着大旗、敲锣打鼓上街去迫使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当众做“喷气式”或让他们头戴高帽、脖上挂牌去游街，以致遭到侮辱和杀害，然而，他的爪牙和密探却奉他之命每天都在工矿企业、运输业中，在机关、各种组织、学校中和住宅区进行搜查，不断拘捕、清洗和杀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毛泽东正是把不断地一批一批地迫害和镇压具有革命经验、政治上有教养、能够识破他的反革命面目的各级干部和社会上的先进人物，作为保障自己反动统治的安全和为自己的接班人准备条件的主要手段。

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残酷迫害“老战友”和他“真正信赖的人”，如林彪和陈伯达，特别是在十大文件中公开宣布的继续迫害干部和劳动人民的计划，使人们终于识破了他的残暴、阴险的面目。他们终于弄清了，毛泽东对任何人所采取的态度都是由他的极端自私的利益决定的。当一个人对他有用时，他的确是推崇他的；一旦他不再需要此人时，他不仅一脚把他踢开，而且还要按照“文化革命”开始时宣布的指示来对付他，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彻底砸烂”。毛泽东对一切的近乎病态的多疑(“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采用的专制和暴力，都大大超过了他推崇备至的、自古以来为多数人所憎恶、以阴险和奸诈而臭名远扬的曹操。

大概，毛泽东现在除了江青之外谁也不相信了。

同时，谁也不再相信毛泽东了。毛泽东同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猜疑，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如此水火不相容的紧张关系，迟早会导致全国性的大动乱。这些动乱必然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胜利和“孤僧”的失败而告终。

第三，这一点已为十大时毛泽东所挑选的全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所证明。早先，毛泽东在选拔候选人到这些所谓高级领导岗位时，不得不吸收党的一些老将参加，因为不打算委派“文化革命”时才当官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担任这些职务，为的是不致引起普遍的愤意。而这一次他却任命王洪文和李德生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任命王洪文、李德生以及张春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因为最近一年中毛泽东稍稍压了一下对他个人的超级崇拜，而十大时又没让江青和姚文元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些观察家对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在十大遭到了失败，因而不得不后退一步。

的确，毛泽东和他最信任的人江青、姚文元在“文化革命”之后，确切些讲，在武装反革命的流血事件之后，确实陷人了人们普遍不满和愤怒的境地，他们的名字成了人们十分厌恶和僧恨的名字，因此，十大时，他们认为还是“稍稍隐退一下”为好。可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行动纯粹是形式主义。

毛泽东依然是独裁者，丝毫也不肯让出自己的权力。而江青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位居第二，仅次于毛泽东。

当时她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的总秘书，按照毛泽东的委托，领导毛的党务工作。现在，不管江青形式上担任什么职务，反正她和从前一个样，还是领导党的工作。毛泽东现在特别强调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想让所有的人只服从他自己和江青。

1.毛泽东让王洪文和李德生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又让张春桥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为的是把江青和姚文元也安插到同样的高级职位上去开辟道路。换句话说，既然王洪文、李德生和张春桥能够占据此等高级职位，那么，为什么江青和姚文元就不能呢？他能在任何情况下把江青和姚文元抬到这样高的地位。

2.毛泽东的这些行动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使全国和世界舆论明白了：中国已经进人了“文化革命”中刚升官的人就能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职务的时代。众所周知，王洪文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才爬上去的。据各方面来的消息看，“文化革命”

时王洪文在上海的诸如“夺权”、砸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造反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仅加入了毛的党，而且火速得到提拔，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要职的原因所在。十大前毛泽东专门把王洪文调到北京，以便提高他的政治威望，并准备让他担任十大的一个主要角色。

他把王洪文排在实际上仅次于自己的第二把手的位子上，主要是为了：一方面，让人们明白，在中国只有“文化革命”时受重用的那些人才能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

也为他正式任命江青当自己的接班人打开了方便之门，铺平了道路。

因此，现在对王洪文用文学语言来形容的话，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用政治语言来说，则是“文化革命”时爬上来的活动分子中最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玩弄这类政治把戏，正是为了向人们灌输一种思想，即：既然王洪文能够坐上第二把交椅，那么江青就更不用提了，因为她有更大的权力爬上这个位子。

毛泽东把反动的“文化革命”视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功劳”。因此他认为，永远坐在第一把交椅上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论功行赏”，那么谁应该坐第二把交椅呢？原先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已经不在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不行了。因而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江青“自然”应当坐上这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接班人，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据毛泽东的盘算，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擅自委派江青坐第二把交椅，并任命她为接班人，而把王洪文从这个位子上推下去，就此了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再利用王洪文来干坏事，相反，他蓄意提拔王洪文，正是为了让他来搞阴谋勾当。他已经利用王洪文来宣读“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必要性。他还有意想让王洪文当“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头头。

第四，这一点也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所证明。在这个名单中九大以前的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更少了，而“文化革命”中刚升官的人却更多了。中央委员中有四十名妇女。此外，据公报报道，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中有三十二名妇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毛集团把妇女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是怀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抬高江青个人的威望，并为她个人培养未来的干部。

至于说到为将近二十名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恢复名誉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又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他企图在十分危机的条件下多少平息一下普遍的愤懑情绪。此外，毛泽东对每一个人都怀有一定的想法：给一些人恢复名誉，是为了把某些军事部队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给另一些人恢复名誉，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的同情；给第三种人恢复名誉，仅仅是为了国外的影响问题。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恢复了名誉的人”来说，还是中国的一句俗话“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道出了真情。实际上这些人究竟是死是活？继续在坐牢，还是在受折磨？在“五七干校”服劳役？在家里监禁，还是在受侮辱？或者，确实重新获得了自由，对他们像对待中央委员一个样？所有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假定他们都还活着，都徒有虚名地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职位，即便有更多的人也将在名义上恢复中央委员或其他机关中的职位，但是，在毛王朝的反动统治下难道他们不会随时又重新受到毛泽东授意的迫害和镇压吗？

第五，这一点还在毛泽东对待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态度上得到了证实。十大前，毛泽东匆

匆忙忙成立了假共青团，而十大通过的毛的新党章中规定，红卫兵和红小兵是青年和儿童的法定组织。毛成立假“共青团”是为了欺骗社会舆论并利用这个名义来搞自己的阴谋勾当。保留红卫兵和红小兵，是考虑到在未来的多次“文化革命”中好利用他们来作为杀害、离间、迫害干部和劳动群众的盲目工具。

至于说到妇女组织，毛泽东本来就一直轻视她们。“文化革命”初他就断言：“妇女组织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后来，所有的妇女组织都被砸了，这些组织的干部均遭迫害。然而从 1972 年 3 月 8 日起他又开始强调说:“必须对妇女工作引起应有的注意”,“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十大以后在锣鼓声中妇女工作又开展起来，各省市都召开了有几千代表参加的妇女大会，建立了各级妇女组织。显然，所有这一切是考虑到能有一些群众组织为他和江青唱赞歌，也使江青有了群众依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切地采取种种直接和间接措施，以便一方面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为江青继承他的王位创造条件。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内国际条件使毛泽东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自己“家庭的世袭领地”的企图只能得到彻底破产这样一个结局。

毛的十大的政治报告，正如九大的一样，没有指出一个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具体“成就”，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数字。

实际上毛集团把相当一部分国民收人、侨汇和大部分外贸收人用来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发展核武器和弹道火箭。不少钱花在分裂和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上，以及花在收买和资助为毛泽东上述利益服务的各国“第五纵队”上。只有一小部分国民收人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以便维持劳动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关于经济建设中获得了哪些“成就”，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他确实想引用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数字，那么他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二十年来和战争时期一样，在日用必需品方面采用了严格限制和凭证出售的办法。就举产品供应为例。每人每月可以凭票购买九到二十公斤的谷物成品(块根植物折合谷物成品为四比一)，一百二十五到二百二十五克的植物油。至于说到布匹一类商品，每人每年只能凭票购买五至九米。甚至在供应水平如此低下的条件下，毛集团还不时地叫嚷，号召人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每人每餐少吃一口”、“备战、备荒”，为此必须“广积粮”。至于住宅问题，从“大跃进”(1958 年)开始整个民房建筑工作就停下了。

文化方面，除了一些大城市还保留下某些缩短了学制、削减了教学大纲、减少了学生名额的高等学校外，中等和初等教育在“转交人民公社经办”的借口下，完全失去了国家的资助，处于可悲的境况中。科学和生产各部门缺少专家。许多专家受到迫害，很多人“被下放到基层”。关于文化建设中获得了哪些成就，毛泽东又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毛集团确实想公布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这类材料，那么所得到的结果绝不是宣传成就，而是自己丢脸。这就是为什么毛的九大、十大报告避而不谈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把大量金钱花在维持毛的帝国和准备打仗上，另一方面是使绝大多数人民遭受悲惨生活、贫穷、困苦和死亡的政策，正是这两个方面导致了毛集团和国内人民日益加深和扩大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第二节 十大对外政策的中心环节

根据十大的材料和围绕大会的外交活动来看，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所追求的目的是，围绕着加紧准备反苏战争和企图挑起世界大战这样一个中心环节旋转。

第一，这一点从十大公报中就可以看到，公报说："……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这恰好证明，毛泽东自己正在加紧准备反苏战争。

还在 1964 年时，毛泽东在同日本客人的一次谈话中就流露出了对苏联辽阔领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觊觎。1966 年"文化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在毛泽东的鼓动下敲锣打鼓拼命叫喊，要"打到莫斯科去，让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随后，中国的大批武装力量集中到苏联边境地区，相当大量的红卫兵迁移到离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很近的地区。

1969 年 3 月，中国军队奉毛泽东之命两次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边防军，导致了中苏边境的流血事件。在当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一方面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于 1969 年 9 月建议中国方面立即开始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由于毛方代表所持的立场，谈判到现在也毫无结果。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群众大会上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1971 年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政府建议两国之间签订不诉诸武力的协定。然而中国方面不把这些建议放在眼里。1973 年 9 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重申，6 月份苏联领导人又一次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签订两国之间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中国方面仍然不予答复。

虽然如此，近几年来毛的宣传机器还是多次叫嚷，似乎"苏联准备突然袭击中国"。毛泽东在必须抵抗虚构的"苏联威胁"

的掩饰下，号召中国人民随时"准备打仗"，要求他们"备战、备荒"等等，以便千方百计加速军事工业的发展，加快核武器和各种不同用途、不同半径的导弹的生产，以及在大、中城市中动员千百万人到处挖防空洞，在城市和农村对民兵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用这样的办法来创造极其紧张的战争歇斯底里环境，迫使劳动人民在军事控制条件下过着可怜的生活。

最近毛泽东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口号的第一句是加强战备，后一句似乎是解释未来战争的目的。然而众所周知，口是心非是毛泽东的嗜好。比方说，他口头上讲"不称霸"，而实际上正意味着他要称霸。

准备反苏战争、力图挑起世界大战是毛泽东对外政策的实质。所有对内政策都服从这一任务。正因为如此，凡是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实现列宁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有联系的事，他都采取敌对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企图竭力诽谤和恶意中伤苏共二十四大提出的宏伟的和平纲领，这个纲领的实现已经带来改变整个世界局势的巨大成果。这一点只能更进一步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毛泽东自己才是战争贩子的丑恶面目。

第二，毛泽东渴望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结成联盟。他用尽一切手段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生联系，同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密切的关系。他还通过各种途径调整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西德复仇主义势力的联系，以及同从反苏、反共立场出发的英国保守党代表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联系。他反对裁减欧洲武装力量和军备，拥护美国第七舰队长期驻扎亚洲，竭力破坏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召开，并反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第三，这一点也可从他对待法西斯政府的态度上去观察。

毛泽东对智利的法西斯政变抱着支持和友好同情的态度。

他从北京派出了驻智利人民统一政府的大使，同时欢迎法西斯委员会的大使到北京就职。他公开站在法西斯专政一边，把以路易斯?科尔巴兰总书记为首的智利共产党、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培育的智利社会党和英勇反抗法西斯的智利劳动人民看做自己的敌人。

采取这种态度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反革命政变和智利军阀的反革命政变反对的目标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劳动农民、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国际上这两次政变都是反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两种情况下实现的政变采用的却是一样的办法，即：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人民的优秀代表人物和野蛮的焚书。

毛泽东公开支持智利的法西斯军事专制，不仅是显示他支持自己的“同伙”，而且显示了他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行动的一致。因此，凶恶的智利军阀不仅对毛泽东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正如报道所述，甚至还准备派代表团到北京专门“学习”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经验”。而毛分子也确实把这件事看做是“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此外，他以对智利委员会的“兄弟关系”为名，竭力把智利变为自己反苏、反共的同盟军，并同其他帝国主义走狗一起建立破坏拉丁美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社会进步及和平运动的根据地。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实现了反革命政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惯用的成语确切地反

映了毛泽东对法西斯专政政体的友好和同情的态度。

第四，这一点也为毛泽东企图在亚洲和非洲建立冲突局势所证明。他对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状况深为不满。他暗中破坏近东军事冲突的和平解决，极力阻挠和平解决印度、孟加拉为一方和巴基斯坦为另一方的争端，因为他渴望实现自己的变任何一个局部战争为世界大战的罪恶计划。

毛泽东敌视对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苏印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他竭力破坏亚洲三个大国——中国、印度和苏联人民之间历史上的传统友谊，一贯在中苏和中印关系方面制造紧张气氛，不断企图破坏印苏之间的合作。

毛泽东还竭力企图分裂和破坏非洲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一运动。同时又和南非共和国的反动种族主义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

他在亚洲和非洲到处散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蛊惑性宣传材料，实际上是进行反苏的破坏活动。毛泽东用“反”美帝作掩饰来反对苏联，企图把某些亚非国家拉到帝国主义阵营，使它们成为他实现亲帝、反苏、反共目的——在亚洲和非洲制造武装冲突的伙伴，这种武装冲突在挑拨世界大战中可能起缓燃导火线的作用。

第五，毛的政策的实质也从十大公报的以下声明中流露出来：“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毛泽东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一般说来，是一小撮靠毛赡养、为他当走狗的叛徒集团，就像托洛茨基把自己的反革命组织称作“列宁的”一样。关于要“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声明的意思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为敌。毛从各国网罗来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资产阶级走狗，托洛茨基余孽，“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分子等等，都听从他的指挥棒，经常为他唱赞歌，还扯着嗓门高唱反苏、反共大合唱。这个合唱队当前的主要节目有：

一方面，大肆吹捧反动的“毛泽东思想”和反动的“文化革命”；另　一方面，吹嘘毛的旨在破坏世界和平、加紧中国战备和挑动世界大战的活动。

十大公报中说：“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就是爆发世界大战。

毛泽东把局部战争(如越南战争、印度半岛次大陆之战、近东战争等等)变为世界大战的企图也遭到失败。他亲自挑起的中印边界武装冲突未能扩大到国际范围的战争。他对苏联的武装挑衅未发展成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是因为苏联有力地回击了侵略者，坚定地执行

了爱好和平的政策。

现在毛泽东改用了另外的办法。他企图把中国引人帝国主义阵营，使它成为帝国主义集团的同盟者，然后试图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新的世界大战中他指望为自己不稳固的反动统治找一条出路，同时也指望建立自己对“第三世界”、进而对全世界的霸权。然而这个荒诞的幻想注定不能实现，因为帝国主义者未必愿意同毛一起充当世界热核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有一个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即：当毛泽东完全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时，他就会狗急跳墙。因此，如果毛得以生产出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和导弹，如果他能从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那里获得足够数量的现代化武器，那么他就可能轻率地进行军事冒险。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对帝国主义者会同毛泽东一起破坏和平的企图经常保持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三节 处于无法解决的矛盾夹攻中的毛泽东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顾一切地力图在国内外政策中实现上述主要目的，才使他深深陷入了既无出路、又无止境的矛盾的泥潭中。他愈是疯狂地企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自己同江青的反动的“家天下”，就愈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极端愤怒和强烈反抗。他愈是清楚地感到千百万劳动人民普遍的不满和准备同他进行斗争，他就愈积极地建立反动的“家天下”，以此作为惟一可能的出路。同时，他愈是轻率地企图挑起反苏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就愈引起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加强烈的谴责和反对，也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的极端厌恶。对他来说，他愈是感觉到他与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为敌的处境，他就愈顽固地力图从国内反动势力和燃起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中找出路。此外，毛泽东认为，同最反动的集团联合并结成联盟，是实现其国内外政策的基础，因为这些集团无论在国际舞台上燃起战争，还是在国内维护其统治方面，都是他最亲密的同盟者。因而，现有的国内外矛盾更加扩大和深化；这就导致他同国内和全世界无数革命力量与进步力量之间更加敌对。

然而对他来说，这些与他敌对的力量愈是不可战胜，他就愈是绝望地抓住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不放。

毛泽东自己制造的这些矛盾不断在加深和扩大，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巨大罗网，毛泽东就像“仙猴孙悟空”一样彻底陷人罗网之中。

从“文化革命”一开始，毛泽东自己就制造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在这些矛盾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而上述新的矛盾使他先前所制造的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他用反动的毛主义来代替革命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造成了他同中国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思想政治矛盾。

他用假共产党来代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组织被砸烂，积极分子遭到迫害；他在某些国家中组织毛式反共产主义的假共产党，因而造成了他同中国和全世界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实行十分反动的、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根本不相容的对内对外政策，这就造成了他同作为利益正相反的一方——中国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在实现其反动的反共、反人民和反苏罪行时利用它；另一方面，使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政工人员不断遭到清洗和迫害，因而造成他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不共戴天的矛盾。

对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少数民族，他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极端沙文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以残酷到野蛮的程度而著称，同时对少数民族表现出完全的歧视、压迫、强使同化和大规模的迫害，这就造成了他同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他实行极端反动的、以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联盟及反苏、反共为基础的国际政策，因而造成了他同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进步运动之间的由于他与这些方面的利益的对立而发生的原则性的矛盾。

他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分裂和暗中破坏的政策，企图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使民族解放运动与真正的朋友和同盟者——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离；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阵营。

所有这一切造成毛分子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由于不能并存的利益而来的矛盾。

他实行反对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缓和国家紧张局势、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和保障世界持久和平的任何建议和措施的政策，公开备战并企图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因而造成了他同在生与死、进与退中选择出路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之间的尖锐矛盾。

这些矛盾中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一眼就能看清：一方面是毛泽东及其集团；另一方面是中国和全世界的革命力量、进步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这些力量处于经常性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之中。其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必然失败。

至于说到毛集团内部的矛盾，那么这些矛盾也是削弱毛分子的力量、加速毛王朝崩溃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总之，执行十大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必然使毛遭到比九大以后他所经受的更多、更快、更大的失败。这就是不以“孤僧”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第三章 毛泽东与秦始皇

十大以后，中国报刊开始大肆吹捧秦始皇。人们为了颂扬秦始皇而咒骂孔夫子，并且滥用鲁迅的名义。

第一节 毛泽东为什么吹捧和怎样吹捧秦始皇

毛泽东赞扬秦始皇，是从赞扬他的专制统治下著名的"焚书坑儒"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开始的。1973 年 9 月 28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焚书坑儒"辨》的专门歌颂"焚书坑儒"的文章。

署名"施丁"的作者在文章的开头说：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历来评论的人很多，意见虽然有些出人，但多数意见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虐行为，反动措施，直接导致秦朝复亡。"

往下，他引用了汉朝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贾谊的著作《过秦论》中的话，这些话说明，"焚书坑儒"的性质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焚文书而酷刑法"，"故其亡可立而待"。

作者承认，"贾谊的这个看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然后，他全文引用了唐朝著名诗人章碣的名为《焚书坑》的一首诗：

竹帛①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②。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作者解释说，这首诗"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朝衰弱了，所以不久就在刘邦、项羽的打击下垮了台。"接着，作者坚决声明，他完全不同意贾谊、章碣等人的看法。作者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进步措施"，并且"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而秦朝的灭亡与焚书坑儒无关"。试问：秦朝灭亡的原因实际上究竟在哪里？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毕竟不能不写出古今一致的正确结论。他写道："秦朝的灭亡是由于用苛法峻刑使天下的人不安宁"，也就是说，"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③往下，他更加明确地写道："秦王朝的灭亡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陈胜、吴广起义，是反对封建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促使了秦王朝的灭亡。因此，秦王朝是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的。"

所有颂扬秦始皇的文章，其作者在撰写文章时，都有意识地使所有赞扬秦始皇的话，同时也

都更加清楚地说明了毛泽东。

人们这样来描写秦始皇，使得他好像现代的毛泽东；而又这样来描写毛泽东，使得他好像古代的秦始皇。

某些外国观察家完全正确地指出：这类文章即便不是毛泽东本人写的，至少也是按照他的命令并根据他的意图写的。否则，任何人也不敢在中国报刊上把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个专制暴君与毛泽东等量齐观。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吹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作秦始皇？

毛泽东吹捧秦始皇，首先是由于他本人渗透了封建的君主主义思想。为了证实这一点，可以举出几个明显的例子。

1.在他写于 1935 年的，形式上是描写雪景的一首词《沁园春》中，他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比作帝王之间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而把自己比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这样的古代皇帝。

2.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在 1937 年以中文出版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引用了他同毛泽东个人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他早在青年时代，在读古代小说时，就崇拜秦始皇、汉武帝和其他古代皇帝。

3.毛泽东常常把党的主要领导人称为皇帝，而把其他的领导人称为皇帝陛下的大臣。早在 1945 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之前，当他还不是党中央主席而只是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他就和封建帝王一样，不许别人称呼他的名字，而要求仅仅称他为主席。

4.1948 年冬和 1949 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进人北京时，毛泽东常常向中央委员们说：“我在青年时代看小说时，常常想：当皇帝，这可多么好呵！然而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皇帝。

现在明白了。我们很快就要进人北京。要知道我们一进人北京，我就成了皇帝，不是吗？”进人北京以后，他开始广泛宣传他是“新条件下的皇帝”。同时，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按照他的命令在军队中专门组织过关于“毛主席是新式的皇帝”这个题目的一些报告。

5.1964 年，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宣布自己是“拿破仑的崇拜者”。

6.他残酷迫害了田汉、吴晗、邓拓、廖沫沙及其他一些作家，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嘲笑和谴责了某些皇帝。同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承认，骂皇帝就是骂他。

毛泽东特别吹捧秦始皇，还因为在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点。例如：

1.秦始皇是州个极端自私的、自命不凡的野心家，也是一个赞成搞极端个人迷信的人。他把自己吹捧为“天下第一”的最伟大的皇帝。难道毛泽东不也就是这种赞成“超级个人迷信”的人吗？

2.秦始皇认为自己在一切问题上都是“惟一的权威”。他是个人独裁的国家的典型形象。“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难道毛泽东不也就是这样的绝对独裁者吗？

3.秦始皇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他自称“始皇帝”，力图使“自家的王朝”通过“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永远统治下去。难道毛泽东不也梦想把中国变为他和江青的“家天下”，并把它一代代传下去吗？

4.秦始皇正是那样一个暴君，在他面前，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因为其他一切人，他都不当作是人。从宰相、大臣到普通臣民，所有他们在秦始皇的眼里都犹如鸡、犬、牛、羊，一切人都是他的奴隶，他可以任意把他们处死、监禁或流放。难道毛泽东现在不也就是这样的暴君吗？

5.秦始皇是“大秦天朝帝国”的狂热的维护者。对于同秦国毗邻的国家和民族，他实行武装征服、强制同化、强迫迁徙和残酷镇压的政策。难道毛泽东不也就是这样的极端大汉族主义者吗？而他对于目前居住在中国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态度，不也就是同秦始皇的态度一样吗？

6.秦始皇建立统一的秦国似后第九年(公元前 213 年)，下令焚书。《诗经》、《书经》，孔夫子以及所有其他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周朝的史书及秦国以外六国的史书一概烧毁。仅仅留下少数医药、卜筮和农作方面的书籍。实际上人们也就无书可读了。而他在第十年时(公元前 212 年)，又下令活埋书生(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同时活埋；甚至在秦朝宫廷内任职的七十多名称为“博士”的儒家中，竟有六十二人被埋掉了，而只剩下八人活着)，从而秦始皇就成了野蛮地烧毁书籍和修无人道地杀害书生的历史上第一个凶残的暴君。就“文化革命”时期烧毁书籍的数量和书目范围以及这时被杀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数目来说，难道毛泽东不是超过了秦始皇吗？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公然吹捧秦始皇并首先维护他的“焚书坑儒”的专制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吹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作秦始皇时，所追求的是阴险的政治目的。让我们看看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以作为例证。

1.按照毛泽东的吹嘘，“秦始皇是坚决制止了奴隶主复辟企图的政治家”(参看《人民日报》1973 年 10 月 31 日署名“陕西师范学院写作组”的文章)。

这种论断证明，毛泽东缺乏古代中国社会发展史方面的基本知识。由于对古代历史事实进行多年研究的结果，中国历史学家证明，在殷商朝代(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十二世纪)，中国经历了从奴隶占有制度的形成和兴盛到奴隶占有制度崩溃的时期。

在那个时代，当统治者或贵族死去的时候，往往以几十人、几百人到两、三千人作为“殉葬”品。早在西周时代(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八世纪)就禁止以人作为“殉葬”品，而用陶俑和木俑来代替人，这是表明西周已经不是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正像历史事实所证明的，西周包括自周武王灭商并奠都镐京至周平王迁都东方以前这个时期(公元前 1122-771 年)，西周基本上是封建农奴制时代。以周平王迁都洛阳为开端的东周初期(即从公元前 770 年起)，约二百年内，农奴制逐渐解体了，农奴解放了，经历了土地所有者——地主这个新兴阶级的形成过程。由于各个不同的诸侯国中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过程在时间和速度上都不相同。例如，鲁国早在公元前 594 年就规定按土地数量征税(初税亩)，而在偏远的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秦国，只是在公元前 408 年才规定按收获量征收地租(初租禾)。

但是所有国家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在孔子生活的时期(公元前 551-479 年)，根据《论语》及其他文献，在鲁国、卫国及其他国家里，农奴制已经解体，农奴已经解放，新的封建地主经挤已经建立，政权已经掌握在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中。所以进人“战国”时代(公元前 403-221 年)以前，社会继续发展，铁制劳动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时经济、文化发达，出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因为其中每个国家都力图消灭所有其他国家并建立自己统一的帝国，各国不断进行内战。

秦国商鞅变法始于公元前 356 年，它限制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改善了农民和军人的地位，废井田(劳役租制)，开阡陌(在贵族和农民的田地之间)。变法后，新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到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时(公元前 221 年)，不仅奴隶占有制度已经成为九百年前的历史陈迹，就连农奴制在秦国也已经是二百年前的往事了①。因此，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奴隶制度复辟”的问题。所以，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

之间关于建立分封制还是建立郡县制问题的争论，以及以淳于越为首的一派儒家和以周青臣为首的另一派之间关于类似问题的争论，涉及的是秦国应当建立什么行政制度的问题，而与所谓的“复辟奴隶制度和反对复辟奴隶制度”的问题完全无关，并且也不可能有关。

既然毛泽东弄不清楚周秦时代社会制度的性质，错误地认为秦朝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奴隶制社会”(这个术语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说中，不存在什么“奴隶制”社会，有的只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因为“奴隶制”按它的意思来说，应该是意味着奴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社会)，由于这一原因，他就把“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争论，曲解为“复辟奴隶制度”和“反对复辟奴隶制度”的斗争。

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秦始皇作为某种“坚决制止奴隶主复辟的政治家”来加以颂扬，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

毛泽东不顾历史事实地吹捧秦始皇，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坚决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家”。大家知道，在所谓“文化革命”

的初期，他把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号召变为污辱和打击刘少奇及全党干部的主要口号，而在最近两年多时间内，又使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家和两面派斗争的号召成为污辱林彪和全党军政干部，破坏其威信的主要口号。毛泽东以所有这一切揭穿了他自己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家，而绝不是“坚决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家”。

“文化革命”时期以来的各种事实尤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状况。毛泽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全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且也完全改变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他摧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机构，暗中代之以毛泽东个人的反动的军事恐怖专政的政权。目前中国的国营经济不是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服务，而是为毛泽东的反动政权，为他的反苏反共的军国主义服务。同时，中国的国营经济在公私合营的幌子下还保留了保障资本家的资本和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资本家冒充经济技术专家，主持许多国营企业的工作。这些事实也清楚地揭露了中国国营经济的真正性质。

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虽然还保留着合作经济的名义，但是，由于农业没有工业和财政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公社完全没有决定生产和分配问题的权力，并且只能按照毛泽东的反动政权的需要来工作，它们没有可能提高自己社员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公社社员至今仍处在“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上。此外，公社事实上成为以食品和原料有组织地供应毛泽东反动政权的农业基地，所以农村人民公社也失去了自己原先的意义。

这样一来，中国国民经济的两个组成部分，工业和农业，仅仅在所有制形式上还保留着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而就其服务对象的内容来说，两者都已失去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一点连毛泽

东本人也不隐瞒。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时常强调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处在毛泽东的反动统治下的中国，甚至也不能认为是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在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殖民政策和新殖民政策的；而这些国家中的先进国家也都致力于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也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毛泽东公然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投人帝国主义阵营的怀抱。

2.按照毛泽东的吹嘘，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雄主”(参看《红旗》杂志 1973 年第 11 期署名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类的论断说明，毛泽东认为，在建立统一的封建的秦王朝的事业中功劳都仅仅属于秦始皇个人。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论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事实：第一，征服了六个诸侯国；第二，建立了郡县制。

首先我们看看征服六国的问题。正像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使秦始皇有可能消灭六国的第一个原因，是他继承了由秦孝公所建立的、在秦始皇的祖先整整六代一百几十年期间内发展巩固了的一份好“产业”。秦孝公实现了商鞅变法以后，不仅奠定了富国强兵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开始实现了政权的集中，把国家划分成三十一个县。范睢为秦国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即分别地拉拢每一个国家，为的是不让六国联合反秦：在对内政策上，他继续并发展了商鞅所开创的事业。秦始皇于十三岁继位。丞相吕不韦总揽国家大事。秦始皇只是到了二十二岁的时候才开始管理国事，到这时国家富强的基础早已奠定，有了足够数量的人才担任文职和武职，所以他只须顺应潮流，发号施令和坐享其成就行了。

使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六国——秦的竞争者没有能够真正建立反秦的联合阵营，同时这些国家本身又发生了许多有利于秦的事件。例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楚国，本来是最能够同秦竞争的对手；然而，由于革新家吴起死于贵族阴谋家之手，楚不仅没有能够实现秦商鞅变法那样的改革，而且也失去了同孙武一样为人所称颂的天才统帅。赵是另一个能够与秦相匹敌的国家，可是在才能出众的赵武灵王家中发生了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悲剧。后来，赵括所率赵军在与秦作战中失败，秦人一下子活埋了四十万赵国俘兵，此后赵国就一蹶不振了。此外，秦国自秦孝公执政以来，每一个君主在位时都侵占了邻国不少领土，因而使自己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充实。而到秦始皇时期，所有六个诸侯国都早已处于衰落状态，对秦来说，各个击破它们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现在我们看看建立郡县制的问题。正像历史所证明的，在消灭六国之后废除分封制而转变到郡县制这一事实本身，也不是秦始皇本人的发明。早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就分为三十一个县。秦国兼并六国之后划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又分为几个县；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商鞅的政策的直接继续。拒绝重新分封并转变到郡县制，促进了秦王朝这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形成，这是符合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的。因为地主阶级需要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有以皇帝为首的集中的最高领导和管理地方行政的郡守与县令。地方行政的使命是在和平环境下，

而不是在小国林立、连续内战的情况下，向地主阶级保证剥削压迫农民的条件。后一情况则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统一的封建君主国与诸侯割据的国家相比，乃是某种进步。

然而，在对具体事件进行了以上具体分析后，我们看到，不能把取得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这一成就的功劳，都算在秦始皇个人的帐上。而毛泽东恰恰是这样做的。这再一次暴露了毛泽东的历史观的极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性质。

此外，当我们评价秦始皇在历史上的功过时，不能只看到他的活动中具有某种进步意义的一个方面，即把诸侯割据的国家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这个方面，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方面：在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后，他实际上究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看来，第二个方面远比第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秦始皇在位二十六年时(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试问：秦始皇从建立统一的封建君主国到他自己死去，做过哪怕一件有利于人民的事码？他想过人民的福利和需要吗？没有。所有他的打算和他的事业都完全以其个人利益为目的，以为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建立“永久的帝国”

为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秦始皇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如何。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其他历史学家的看法，秦始皇的活动基本上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秦始皇以他人之功为己功，认为自己“功迈三皇，德盖五帝”①，并以“始皇帝”的尊号自称。为了颂扬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他“巡游”了国内名山大川，凡是他游历过的地方，他都留有刻石以志其“功”。为了“巡游”全国，他下令在他打算经过的各个地方，修建宽阔平坦的驰道，以供他的豪华的六驾马车和两旁步行的、骑马的侍卫人员通行。有好几百万劳动人民被调去修建这些道路，他们不单是以无偿的劳动，而且是以自己的血汗和尸骨来铺设这些驰道。不难想像，当地百姓因秦始皇出游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其数量该是多么可观。

2.虽然内战结束了，可是秦始皇不断发动对邻近的国家和民族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因此，人民摆脱灾难、战争和兵役的希望完全落空。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百姓的兵役和徭役负担都增多了。

3.秦始皇听信了方士的“亡秦者胡也”①这一预言，他不仅派遣了蒙恬的三十万军队不断开展反对胡人的军事行动，而且经常动用数百万劳动人民修筑绵延数千里的长城。在饥寒交迫、劳动异常繁重和各种疾病流行的条件下，他们绝大多数死于修建劳动中。现在毛泽东认为长城是秦始皇的伟大功绩，经常邀请外宾去参观这一名胜古迹。因而应当提醒一下，在修建长城时，秦始皇并没有给它砌上一砖一石，长城是在几百万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和尸骨之上建

筑起来的。

4.秦始皇为了给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动用了七十多万“刑徒”和工匠。竣工后，为了保守秘密，把所有七十万修建者都活埋在陵墓附近。

5.秦始皇为了使自己不致被打倒，并且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够继承王位，强行收缴了民间的各种兵器，同时杀死了大量不愿交出自己兵器的人。收回的兵器加以销毁后，用来在咸阳(当时的国都)铸成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

6.秦始皇为了镇压对他的专制统治不满的人，以及他认为有不满嫌疑的人，对成千上万的人使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如处死，酷刑，关监狱，流放，罚苦工，派到边远地区去修城等等。他推行极其野蛮的政策，他杀戮了不可胜数的无辜之人。

7.秦始皇企图长生不老，“万寿无疆”，不停地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派遣各种僧徒到天涯海角去寻找“长生之方”和“不老之药”。

8.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荒淫无度的欲望，强迫数百万劳动人民流血流汗，还从国内各个角落聚敛无数钱财和物资来修建史无前例的阿房宫。宫殿的各种建筑物和各个部分占据了方圆数百里的地方，宫中置有从所有六个被征服的国家中掳来的美女，藏有从六国夺取来的各种各样的珍宝。这一宫殿的建筑工程直到秦始皇死去还没有结束。以后项羽率领他的军队占领咸阳，焚烧阿房宫时，火三月不息。可以想像宫殿的规模该有多大，在它上面花费的人民的力量和钱财该有多少！在阿房宫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修建了专为秦始皇行走而设的复道和甬道。

他不敢在地面上行走，他行踪诡秘，这不仅是因为他希望“更加容易遇见”所谓的“神仙气而且主要地是因为他意识到，由于他作恶多端，他已成为全国人民仇恨的对象，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对他的生命的潜在威胁。当秦始皇某次“巡游”经过博浪沙时，虽然戒备森严，张良却试图用铁椎刺杀秦始皇。尽管没有击中秦始皇，然而却击中了他的“替身”(即击中了身穿秦始皇服装、坐在与皇帝的马车同样的车中、与秦始皇面貌相同的角色)。这一事实证明，秦始皇经常为自己的生命担忧是有理由的。虽然他立即下令寻查刺客，并在全国搜捕十日，就是这样，刺客也并未找到。这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向秦始皇行刺的张良，不仅受到了秦始皇的侍卫中一些人的保护，而且也得到了民间一些人的掩护。秦始皇确实是处于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的地位。

至于他所推行的愚民政策——这种政策是他指望用以维持他的暴虐统治的、又是以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这样的野蛮罪行表现出来的，那就更加使他遗臭万年，使他成为上述那种令人憎恶的人。

正因为如此，在秦王朝建立后第十三年，即秦始皇死后一年(公元前 209 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帝国，而再过三年(公元前 206 年)，这个帝国就在项羽和刘邦的军队的攻击之下灭亡了。

为什么毛泽东大捧秦始皇是“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的雄主”？这同他旨在加紧准备对苏联、对亚洲邻国的战争的阴谋策划有关。他像满清统治者和反动的军阀那样，不仅总认为中国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印度支那各国、泰国、缅甸、尼泊尔等国的领土是中国的领土，他还企图把苏联远东的广阔领土列人中国的版图。近年来他大搞军国主义化和备战活动，其目的不仅要侵略苏联的领土，而且还要侵占邻近的亚洲国家，企图以此建立他的泛亚细亚毛帝国，作为今后争取世界霸权的一个步骤。他需要赞扬秦始皇，正是为了在实行这些狂妄的计划时进行自我刺激和自我吹嘘；也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企图吸引他们去为他那极端妄自尊大的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目的效劳。

为什么毛泽东围绕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的问题大发议论？这同他准备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清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有关。大家记得，在“文化革命”的准备时期，毛泽东曾经大力开展“全党全民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运动”，这样做是为了在“文化革命”时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部队反对它的另外一些部队，达到为他“夺权”的目的。当地方党政机构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摧毁以后，毛泽东不得不使各大军区司令员和各省军团司令员兼任所谓“革命委员会”主任，尔后又兼任“党委会”领导人。然而在所谓“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更加不信任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团与地方军团①司令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他又打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他除了利用“民兵”、红卫兵等反对军队，主要的是要照旧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部队反对它的另外一些部队。因此，目前他又在加紧威胁、欺骗、“许愿”和挑起纠纷，以便用这些方式分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战友之间的同志关系，唆使一些军事领导人去反对另外一些军事领导人。他一方面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人民学习”的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大量调动各大军区和各省属部队的指挥人员。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在进一步“批林整风”或第二次“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对他们进行更广泛的清洗和镇压。他大力指责“分封制”的意思，就是要利用反对“独立王国”和“跋扈军阀”的斗争宣言，作为反对地方军事首长的斗争的借口。而他叫嚷坚持“郡县制”的意思，就是要更加强化“中央的绝对权力”，也就是要更加强化毛泽东个人的反动专政，以便为他迫害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干部制造“舆论”，并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名义采取行动。

某些帝国主义集团的报刊近些年来经常叫嚣什么中国地方军事首长拥有过大的权力，毛泽东死后，也像当年在袁世凯死后一样，这将使军阀之间爆发内讧。这种高谈阔论恰恰有助于毛泽东去实现其上述阴谋。

早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之初，人们就指出，毛泽东是秦始皇第二，就其罪行来说，他是比秦始皇更大的专制暴君，而他的新式的“焚书坑儒”，也是同样野蛮的暴行。当时他本人还不承认，还企图开脱自己。可是现在，正像被无数人证物证所揭露的、被迫招认了自己罪行

的穷凶极恶的罪犯——惯犯、杀人犯、纵火犯一样，毛泽东公然在中国报刊上为秦始皇辩护，并且实际上承认自己是现代的秦始皇。

毛泽东大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作秦始皇的主要目的，不仅是要禁止人们谴责既是秦始皇的、又是他本人的“焚书坑儒”之类的罪行，而且要“美化”秦始皇的形象，以便利用秦始皇作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新工具。他已认定“反对秦始皇”和“反对焚书坑儒”的言论是王明的一个新罪行，而“谴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背诵章碣的《焚书坑》一诗则是林彪的一个新“罪行”。他可以任意向他在“批林整风”运动或第二次“文化革命”过程中打算迫害的任何人提出这样的罪状，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秦始皇和他的“焚书坑儒”之类的暴行，只有毛泽东集团例外。然而我们相信，毛泽东抬出秦始皇这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最大的专制暴君作为自己的前驱和精神上的先导，绝不会给他增加威信和力量；相反，这只能增加人民对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统治的仇恨和反抗。

第二节 毛泽东为什么攻击和怎样攻击孔子

真的，为什么毛泽东在吹捧秦始皇的同时要攻击孔子呢？

这首先是因为秦始皇也好，他本人也好，都犯下了“焚书坑儒”这样一些罪行。区别仅仅在于：就烧毁的书籍和杀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数量来说，毛泽东远远超过了秦始皇；而在挖掘孔墓、破坏孔子文物、烧毁孔子故居和孔庙这样一些罪行中，毛泽东则紧步秦始皇之后尘。

其次，这是由于在毛泽东、秦始皇与孔子之间，有着原则的思想政治分歧。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举一些最明显的例子。

1.孔子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然，这种政治思想，在秦始皇和毛泽东这两个专制暴君和主张超级个人迷信的人看来，是一种最大的亵读，因为他们只把自己尊为惯于骑在人民头上向人民作威作福的“天子”。

2.孔子颂扬像尧禅位于舜、以后舜又禅位于禹那样的更换统治者的办法①，或者像汤除掉狂妄的桀以及武王伐纣那样的更换统治者的办法。所有这一切，同“死死抓住”自己的王位并企图使自家的王朝万世永存的野心家秦始皇和毛泽东当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3.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

这里所说的臣，不仅是大小官吏，而且同时又是全体人民，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思想，对于根本不把“臣”

(或者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即工作干部，人民)当作人的所有古代的和现在的暴君来说，正是最可怕的征兆。

4.孔子主张使人民有可能人口兴旺，生活富裕，并且受到教育。关于这一点，在《论语》中有专门的记述：

“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①
孔子也主张关怀劳动人民，不迫使人民疲劳过度。关于这一点，在《论语》中也有一段明确的记述：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
倦。’”②
这种思想，在只关心个人利益和不顾人民死活的秦始皇和毛泽东看来，当然不仅是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必须根除的。

5.孔子主张教育人民，反对愚民政策。正因为如此，他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对于这一说法，历来有两种解释。

(因为按照古代的写法，不加逗号。)一些人把它注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此得出以下颠倒了的结论，即孔子拥护愚民政策。目前毛的报刊上用的就是这种注释。另一种注释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后一种解释才符合孔子说法的原意，因为如上所述，孔子主张在和平时期除保障人民的富裕生活外，还要教育人民。

孔子主张甚至在战争条件下也要教育人民。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④
而秦始皇和毛泽东却用“焚书坑儒”这样的办法实行愚民政策；所以他们仇视孔子的上述观点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和毛泽东两人都反对孔子。孔子的上述思想，不仅比生活在孔子死后二百多年的秦始皇的思想更为进步，而且也比“毛泽东思想”进步，虽然后者同孔子相距二千五百多年。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他能否预料到，今日将以他的口吻说得更正确一些：“后生可耻：竟有来者之不如昔也！”

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攻击孔子，也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例如：

1.在由石仑署名的《论尊儒反法》一文①中，作者断言“孔子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维护者”②。这种论断证明，毛泽东缺乏关于孔子生活时代的历史事实的基本知识。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不仅奴隶占有制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且农奴制也已成为过去。因此，辱骂孔子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拥护者”就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值不得认真加以反驳。

毛泽东不顾历史事实，如此这般地攻击孔子，是有更进一步的打算的，这就是借助于骗人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来指责那些他打算在“批林整风”期间或第二次“文化革命”中像反对“孔子的信徒”那样猛烈加以攻击的人，然后诬蔑他们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顽固维护者”，并且加以镇压。

2.毛泽东指责孔子“企图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统治时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为了“加强”这一指责，他就为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这个说法伪造一个涵义。

署名“劲云戈”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一文的作者曾就这一问题写道：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①。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②
在上述另一篇题为《论尊儒反法》的文章中，署名“石仑”的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同“劲云戈”的说法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说明，两篇文章都是遵照毛泽东的同一旨意写成的。

为使年轻的中国读者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首先必须简略说明，孔子学说中的“仁”和“礼，这两个词原意如何。

“仁”在古代只是意味着“人”。《礼记》的注释中说：“仁者人也。”《孟子》和《说文》③都解释说：“仁也者人也。”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解释。

“樊迟问‘仁’。子日：‘爱人’。”④
在那个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况下，“仁，从人”或“仁者爱人”，具有必须把人当作人那种涵义；也就是说，不能再把人当作奴隶或农奴。在人们之间应当存在人们所固有的关系。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仁”意味着“人道”、“人道主义”。所以许多孔学家自古以来总认为“仁”是儒家思想的进步的核心。孔子本人从这一思想核心出发对各种高尚的行为——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作了论证。在“颜渊问‘仁’”之后，接着是“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和“樊迟问‘仁’”；孔子每次都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这里不仅表现出孔子善于因材施教，而且也表现出儒家学说中“仁”

这一概念的内容的多样性。

“礼”最初的意思是“礼节的总和”、“仪式”、“礼貌”，以及“礼”的发展和概括——“合理性”等等。在孔子学说中，“礼”的内容极广，解释颇多，从中也引申出从修身到治国等行为的合理性。

考虑到本著的篇幅，我们不能在此详细考察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仁”和“礼”的各种意义和解释。然而由以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到，儒家学说中的“仁”和“礼”不含有毛泽东所伪造的意思。

现在我们把毛泽东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同《论语》中这一格言的真正的解释对比一下，以便弄清楚伪造的解释同这句话的原意是多么不能相容。

在《论语》《颜渊》第十五①中，我们可以看到：

“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试问：我们所引用的孔子同颜渊的对话，与“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有什么相干？毫不相干。师生之间的谈话只是围绕着修身的话题进行的，同毛泽东伪造出来的罪状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也就是“劲云戈”的那篇文章，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说法曲解为号召“对待敌人要诚实和宽大。”也就是说，不应当同敌人斗争，而应当宽容他，甚至“指望敌人发慈悲”。

现在我们看一看，《论语》中这些词的真正涵义是怎么样的。

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两次提出这一说法。第一次是在上述“颜渊问‘仁’”之后，紧接着“仲弓问‘仁’”时提出的。孔子的回答是五句话，其中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孔子在回答时说这句话是用来解释“仁”的。第二次是在子贡问及“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一问题时提出的。孔子回答说：“其恕乎”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因此，在这里孔子说这句话是用来解释“恕”的。在同孔子的两次谈话中，绝对不可能找到把这句话解释成号召对待敌人要诚实和宽大的理由。这种解释仅仅是毛泽东伪造出来的。

毛泽东在儒家关于“仁”、“礼"和“忠恕”③的学说方面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歪曲和伪造，再一次露骨地显示出他的特别反辩证法的方法——诡辩法。

“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些伪造的基础上写出的。因此，他蛊惑人心地把孔子关于“仁”、“礼”和“忠怒”的思想描绘成反动奴隶主思想，描

绘成向敌人投降的一种号召，然后，他就把孔子思想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仿佛孔子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来源，他武断地把孔子思想叫做“右倾机会主义者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然后，文章作者利用这些捏造出来的思想观念，用了三大段来诽谤和污辱在不同时期反对毛泽东反革命“思想”和政策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一段专门用以诽谤王明和彭德怀，第二段专门用以诽谤刘少奇，第三段专门用以诽谤林彪。

而实际上正是毛泽东背叛了中国革命并破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可见，毛泽东攻击孔子学说，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证明秦始皇和毛泽东本人的“焚书坑儒”及其他暴虐行为是正确的，而且是为了制造一种迫害人的新工具，借助于这一工具，毛泽东可以在“批林整风”期间或第二次“文化革命”中，随时指责他打算作为“孔子的信徒”而加以迫害的任何人，这等于是控告他们“破坏中国革命和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孔子生活在距今二千五百余年的古代。由于时代的限制和特点，他的学说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以尊王为实质的落后性和以“仁”的学说为核心的进步性。后来一切时代的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军阀都利用他的学说的落后方面；而进步的思想家和学者则主要是发展了他的学说的进步方面。

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刘彻)开始，以后的一切封建王朝，直至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都一贯利用和发展孔子学说的以尊王为中心的落后方面，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打击自己的政敌的工具。“五四运动”(1919 年)在向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封建秩序斗争的同时，也谴责了孔子学说的落后方面，为新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开辟了道路。在三十年代，蒋介石利用孔孟学说、佛教和道教，为他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服务，这一运动本质上是变相的法西斯运动。

我们共产党人，在揭露那利用孔孟学说搞投机的蒋介石的反动伎俩的同时，也谴责了孔子学说的落后方面。这一历史斗争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甚至制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孔孟学说的落后方面的反动集团对群众的影响和作用。

大家知道，在“尊王攘夷”上表现出来的孔子学说的落后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尊王就是说要像崇拜“天子”一样地崇拜他。“攘夷”就是说要把中国列为“天朝帝国”。“天子”的思想正是毛泽东的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而“天朝帝国”思想则是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来源。而且他本人也说过，他是“儒表道里的政治家”，这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满口伦理道德，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政治家”。

因此，毛泽东也利用孔子学说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在这方面他的目的同所有以往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没有区别。

然而目前他采取另一种态度：利用攻击古代孔子学说中以“仁”的学说为核心的进步观念，作为吹捧秦始皇和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的手段。这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一旦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仆从，他就把一切反动的思想和学说，从古代的反动思想派别到现代的法西斯主义，都当作“毛泽东思想”的“伙伴”一样来对待，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代孔子学说的进步观念视为自己的反动“思想”的死敌。实际上，利用孔子学说的落后面同攻击它的进步面是相反而又相成的，这两种行为是殊途同归的，因而两者是同一反动行为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不仅攻击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的“仁”，而且也攻击中国一切传统的道德范畴。——他特别猛烈地攻击人道主义这一为整个进步人类所公认的道德基础。所有这一切，一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早在“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

时期，就说明毛泽东是一个毫无人性、毫无良心、毫无道德和毫不知耻的人；另方面证明，毛泽东本人事实上已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不知人性、正义、诚实、善良、礼仪为何物的人，他的特点是背信弃义、恬不知耻，他打算作出许多更加不道德的残暴行为。现在他认为任何道德范畴都是对他行为的非难、抗议和讽刺。

历史经验教导说，毛泽东的这种行为不仅不能帮助他达到他所提出的目标，相反，却会导致与其愿望相违背的结果。以往的一切反动派，都利用孔子学说的落后方面以戕害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都得到了同一个下场——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反动思想的失败，而革命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则更加光荣地经受了考验并获得胜利。毛泽东对孔子学说的进步方面进行攻击以戕害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必然会像过去一切具有反动思想的反动分子一样，也得到那么一个彻底失败的下场。

目前毛泽东正在利用“指责”对秦始皇的憎恶和对孔子的同情，以迫害中国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这清楚地说明，他的吹捧秦始皇和攻击孔子的运动同他的阴谋是紧密联系着的，他这种阴谋旨在加强国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斗争和国际舞台上反对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

除了已经谈到过的，还必须指出以下方面。毛泽东吹捧秦始皇和攻击孔子，还有两个阴谋目的。其中之一，是为了从当前斗争转移视线并掩盖这一斗争的性质，也就是说，他蓄意制造混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和政策同毛泽东的反革命“思想”和政策之间的斗争，描绘成“维护”和“反对”秦始皇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反对”和维护”孔子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另一目的，是以巧妙地歪曲古代的“深奥的道理”来欺骗人民；因为不仅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而且还有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古文和古代史实都只有极其贫乏的知识，所以

毛泽东以为，他通过玩弄古代文字就得以混淆当前斗争和古代历史，用这种蒙蔽手段使人民不明真相。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伎俩，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且必须加以揭穿。自然将来他还会使用这种伎俩。比如，他会指使一些人撰写文章来为商纣王①和他的宠妃妲己辩护：说什么商纣王不是残暴的专制君主，他没有纵容妲己的刁钻古怪的要求，也没有作出不成体统的事，而妲己也没有助纣为虐；说什么商朝的灭亡同纣王与妲己的残暴行为毫无联系。而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和江青的正确。或者，比如说，他会着手伪造墨子的学说，把墨子称作极其反动的思想家，以便利用“墨子思想的信徒”这一臭名来迫害任何人，等等。然而，无论毛泽东再去着手搞什么样的新老阴谋诡计，只要我们经常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测谎器”，就必定能够每次都识透他的具有一切“奥妙之处”和“细微差别”的真正意图。

第三节 毛泽东为什么滥用和怎样滥用鲁迅的名义

最后，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在他发动的抬高秦始皇、攻击孔子的运动中是怎样滥用鲁迅名义的。

毛泽东为了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辩护，利用了鲁迅在 1933 年写的《华德焚书异同论》这篇抨击性文章。鲁迅这一抨击性文章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他认为，虽然希特勒和秦始皇两个人都烧了书，可是希特勒比秦始皇更加可恶。同样，假如鲁迅能活到六十年代后半期，并能写出抨击性文章《古今焚书异同论》，来论述虽然秦始皇和毛泽东都烧了书，可是毛泽东比秦始皇更加可恶这一基本思想，那么，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鲁迅在自己的抨击性文章中谈到秦始皇烧书时，对这一事实没有进行任何谴责。相反，他写道：“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上述《焚书坑儒辨》、《论尊儒反法》和《秦始皇是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的政治家》等文章中，作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而利用鲁迅的这句话，不仅是为了替过去秦始皇烧书作辩护，不仅是为了替“文化革命”期间烧书的毛泽东的罪行作辩护，而且是为了从实际上替同样也在烧书的智利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罪行作辩护。

毛泽东企图以宣传鲁迅的这句话来替任何反动派过去的烧书、现在的烧书和将来可能的烧书作辩护，自然首先是企图替他自己在多次“文化革命”中不断破坏文化和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作辩护。然而这是徒劳无益的。其所以徒劳，也还在于鲁迅写于 1934 年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实际上已经修改了自己以前对秦始皇烧书的看法。他写道：“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作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勒烧书事件的先例。”可见，这里鲁迅认为，秦始皇烧书也好，希特勒烧书也好，都是一种罪过，区别只是犯罪的时间不同而已。至于毛泽东，他不得不避开这一点，否则，他就再也不能利用鲁迅 1933 年的说法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了。但是事实俱在，鲁迅的著作还在，无论毛派集团怎样回避这些事实，鲁迅著作的广大读者心里是很清楚的。

同时必须指出，为了替“焚书坑儒”一类事件作辩护，所有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援引鲁迅写于 1933 年的论述秦始皇烧书的文章。他们妄图以此使读者相信，仿佛鲁迅也赞同秦始皇坑儒。

事实证明，从古代的秦始皇到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六十年代的毛泽东和七十年代智利的军事法西斯匪帮，一切反动派确实都把大规模的烧书和从肉体上杀害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了。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秦始皇坑杀了儒生，而现代的反动派则以另外的方式杀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帝战士及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代表人物。毛泽东替“焚书坑儒”一类事件作辩护，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其实，鲁迅不仅抗议“焚书”，而且也抗议“坑儒”。例如，《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1934 年)就是明证。鲁迅在这篇引言中写道：“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

殉了他的工作了。”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 1933 年论述秦始皇烧书的话，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错误。他对烧书和杀戮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这样的专制行为痛心地表示了愤怒的抗议。鲁迅在这一作品中抗议蒋介石烧书和杀害知识分子；假如他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更加愤怒地抗议毛泽东和智利法西斯分子烧书和杀害知识分子。

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秦始皇并没有能够通过“焚书坑儒”达到“统一思想”，使他自己的王朝免于覆灭。相反，这只是导致了更大的思想分裂，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所以，毛泽东烧书和杀害知识分子，其下场也将同秦始皇一样。

至于毛泽东利用鲁迅批判孔子的某些说法来支持攻击孔子的运动，这对少数人无疑是会起迷惑作用的。

首先，毛泽东利用鲁迅在 1935 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攻击孔子的理由。这句话就是：“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①
如果通看鲁迅的全文、我们就可以明白，鲁迅在写这句话时，有着怎样的动机和目的。鲁迅正是带有一定的同情去描述孔子学说的遭遇和命运的。他说“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他指出并且证明、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然后他指出，孔子死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接着鲁迅指出，在以往的时代，每个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利用它们做“敲门砖”：门一开，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其实，孔子死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而在文章的结尾，鲁迅写道：“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他嘲笑“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他们也曾企图以显示自己尊孔读经而免于失败。鲁迅正是为了嘲笑那些妄图以求诸孔子而幸免失败的北洋军阀，才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句批判孔子的话。这句话里谈到，孔子的计划是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而且是为权势者所利用的。由此可见，这里鲁迅批判孔子学说的落后方面的动机和目的，与我们上面指出的“五四运动”时期和三十年代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动机和目的是一样的。随着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把孔子学说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工具的做法遭到谴责，孔子学说的落后方面也同时受到了批判，这样做是为了削弱，甚至消除力图滥用孔子名义的反动统治者的影响和作用。

除上述文章外，鲁迅在他所写的称为“杂感”的其他小型文学作品(小品文，特写，随笔)中，有时发表过一些对孔子和孔孟学说的个别的见解。这些著作不是专为研究孔子和孔孟学说而写的，而是为了嘲笑那些在“尊孔”“读经”的把戏中寻找救星的当时的反动派。大家知道，鲁迅在“杂感”中就这些问题发表过个人的看法。他写的东西没有超出“五四运动”时期和三十年代革命者及共产主义者批判孔子的那个界限。

从古到今人们写出的关于孔子和孔孟学说的著作多得难以计数，这些著作的作者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见解，但一般说来，每人都把他独自的看法讲了出来。毛泽东把

鲁迅关于孔子和孔孟学说的言论拿过来，不仅把它们变成“神圣的”、不容怀疑的教条，而且把它们变成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理由”，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最近毛泽东开始把林彪和孔子混为一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运动中特别着意于滥用鲁迅关于孔孟学说的言论。

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鬼蜮伎俩的目的，就在于把他同林彪之间的斗争描绘成毛泽东的反孔同林彪的尊孔之间的斗争，使人们不能看清楚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斗争的真相。

大家知道，毛泽东滥用、曲解和伪造鲁迅的言论，企图使鲁迅的名字为他个人的反动目的服务。这绝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早在多年以前，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他就任意歪曲和伪造鲁迅的言论，利用它们来镇压不合他心意的人。这里就是粗暴地伪造作家的作品的一个例子。鲁迅在自己的遗嘱中曾经特别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陈伯达于 1966 年 10 月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致闭幕词时，援引了鲁迅遗嘱中的上述这些话，并且，看来是代表毛泽东补充说：“我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要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毛泽东分明是在歪曲鲁迅的话，却把事情描绘成似乎作家至死也不宽恕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同他争论过的那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然而，鲁迅一生中有不少事实完全驳斥了这种歪曲的解释。

三十年代时，在左翼作家联盟中，鲁迅与那些在二十年代伺他争论过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曾经肩并肩地在一起工作。不但如此，1932 年，鲁迅在《三闲集》的序言中还热情而感激地对他们进行了评论。鲁迅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还在 1936 年 10 月初，鲁迅就同在 1936 年夏曾经与他争论过的左翼作家联盟①的同志们共同签署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对敌斗争。假如作家不是接着在 1936 年 10 月 19 日就过早地逝世，他一定会同与他争论过的战友们一起为建立和扩大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应当特别强调，鲁迅很好地分清了敌友。他与毛泽东是直接相反的。毛泽东不仅蓄意歪曲鲁迅的遗嘱，而且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理由”，用以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并把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当作敌人加以迫害。

另外一个例子。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围绕着建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两个口号而进行的争论，早在 1936 年夏就结束了。早在当时，论敌们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同时他们就确信，在“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间，没有根本的原则的差别。因此，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文中承认了两个口号“并存”的必要性：“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历史事实表明，在当时的具体政治条件下，“国防文学”的口号更适合于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因此它得到了大家的赞许，受到了文艺界的欢迎，而在许多地方人们还提出了“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

事实上这两个口号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周扬以及中国共产党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中的其他一些人，1936 年初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根据，是 1935 年 8 月 1 日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其中宣布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

《八一宣言》及其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口号，是解决建立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问题的具体方案。亲日派叛徒汪精卫认为，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府和军队，这就使中国不可能抗日，反共分子蒋介石则利用这种状况来“论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党关于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建议，断然驳斥了所有这些“理由”和“论证”，并使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的党派能够看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光辉前景，因而他们大家都热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且以行动来表示响应。因而“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支持。

鲁迅等人于 1936 年 5 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时，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 1931 年 9 月 19 日因日军 9 月 18 日侵占沈阳而发表的宣言。宣言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九一九宣言》目的在于反对蒋介石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这是向中国人民发出的战斗号召，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时我党还没有提出要把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是过了四个多月以后，在 1932 年 1 月 28 日开始的上海抗战时期，与这一政策有关的口号才第一次提了出来。

历史事实证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武装侵略和蒋介石进行反共战争的条件下，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动员和团结全民族力量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斗口号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学说，提出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以后，又根据列宁关于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且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和联共(布)党的帮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达到了国共之间的停战，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且实现了全民杭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历史功绩。

当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期，党在上海提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时，毛泽东正在中国的一个苏区，而且比较晚才得知了这件事。早在 1932 年 1 月 28 日开始的上海抗战时期，

就提出了“工、农、兵、学、士、商，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口号。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及其他武装力量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三项条件”，提出了建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六条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曾提议建立抗日反满民族统一战线，并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在这些文件以及同它们有关的实际行动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逐渐发展了。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及其他一些文件，全面发展了这个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基本政策。所有这些事情，毛泽东也是在事后才知道的。当时，他或是在苏区，或是参加西征；他没有参与也不能够参与这些事情。正如已经谈到的，到 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才在瓦窑堡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那时他第一次依照中央决议谈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然而，他的报告的目的，不在于支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于宣传他个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对党的这一政策。‘但就连他的这个报告也是过了十六年以后才第一次发表的。

虽然有这些历史事实，中国报刊还是在 1966 年 3 月发表了由毛泽东本人三次修改过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①。这个会议是由江青召开的。在《纪要》以及后来为了反革命的“文化革命”的需要而发表的其他一些文件中，毛泽东竟认定周扬等人根据《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什么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出现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等人根据《九一九宣言》提出的口号，则被他称为“符合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无产阶级口号”。

早在 1936 年夏就解决了的，围绕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两个口号的争论，毛泽东现在又把它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口号”和“无产阶级口号”之间的争论，随后又把它说成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和“毛泽东的革命文艺路线’之间的斗争。

至于连毛泽东也知道的历史事实，却是这样的：周扬和鲁迅据以提出各自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口号的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由王明撰写的；其中的两个口号，也都是由王明提出的。但是，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 1931 年的《九一九宣言》，连同其中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冒充为自己的正确路线，而把 1935 年的《八一宣言》和其中的国防政府的口号，诬蔑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口号。难道这不是荒谬可笑的吗？

十分清楚，毛泽东进行这种伪造的时候，不仅力图抬高自己、打击王明，而且把三十年代所有党与非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诬蔑成鲁迅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传播者，以便随后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

毛泽东的最大阴谋和对鲁迅的最大污辱，是他在 1940 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口是心非地吹捧鲁迅，几乎达到了“吓人的高度”(用已经提到过的，鲁迅评论历史上的权势者们为了利用孔子的名义而恣意吹捧孔子的话来说)。毛泽东在鲁迅死后把鲁迅当作“毛泽东分子”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追随者。结果搞成毛泽东形式上是抬高鲁迅，事实上是抬高自己。

毛泽东恐怕人们不相信这种诡计，就强迫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逐字逐句地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毛泽东“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等。可是，大家都知道，鲁迅在世时，臭名昭著的“毛泽东思想”和“红太阳”的比喻还没有问世。

1974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鲁迅全集)重行排印出版》的广告。广告说：“这次出版，对原版编校中的一些讹误作了校正。”这个声明的意思是极其清楚的：毛泽东的喉舌实际上公开承认了按照毛泽东反革命集团当时的需要来曲解和伪造鲁迅著作的事实。大家知道，毛泽东是经常颠倒是非、伪造自己及他人著作的一大专家。

毛泽东企图使用鲁迅的名义谋取私利，把鲁迅的著作变成他搞阴谋的工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要把鲁迅和他的作品从毛泽东的魔掌中拯救出来。

把革命者鲁迅从反革命分子毛泽东的血腥魔掌中解放出来，这也是所有真正景仰这位作家的人们的责任。为此，一方面，必须随时随地揭露毛泽东有关滥用鲁迅的名义和作品的一切鬼蜮伎俩；另一方面，必须使人们认识鲁迅这位革命作家的真面貌。我们应当帮助广大劳动群众了解，鲁迅之所以成为著名革命作家，其基本特征，就在于他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坚定地、不屈不挠地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友好合作的道路。鲁迅以自己锐利的笔锋，和他们共同战斗，维护共同的利益，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既然毛泽东堕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他也就成了鲁迅的敌人。因而他就得把鲁迅的卓越成就全部掩盖起来。

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向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及“围剿”作斗争，支持中国共产党以组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3 年，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谈到北平①各界为李大钊举行的公葬时，写道：“……这是极应该的。”关于李大钊的遗文，鲁迅写道，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革命史上的丰碑。”1936 年鲁迅敬重地纪念瞿秋白，出版了霍秋白译文集两卷本，在每卷之前都亲自作序，以此表示了他对文学战线上这位战友的深切敬意。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毛泽东借助于武装力量完全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大量的共产党员，挠掉了李大钊和瞿秋白的著作，挖掉了这两位革命者的坟墓。他们的亲属，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和瞿秋白的孀妻杨之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假如鲁迅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当面怒斥毛泽东：你犯下的暴行，比蒋介石和汉奸的暴行合起来还要多、就连他们也不能够镇压这么多的共产党员，就连他们也不敢挖掉李大钊和瞿秋白的坟墓！你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的起码的道德！

鲁迅向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诬蔑。鲁迅在 1932 年发表的题为《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文章中写道：“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

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鲁迅在谈到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诬蔑苏联和准备进攻苏联时写道：

“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直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如果在鲁迅写的文章里，在“帝国主义者”一词的后面添上“和毛泽东”，或者以“毛泽东”代替“帝国主义者”一词，那么，这难道不是今日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的真实写照吗？！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完全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进攻苏联的企图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他写道：“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

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蜜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毛泽东现在堕落成了帝国主义的奴才。他迫不及待地要进攻苏联。中国人民对这一点的想法和说法也同鲁迅当时一样：

我们应当“打倒企图进攻苏联的恶鬼”，因为这才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及其创作从来都是关心爱护的。1930 年，中共中央委托鲁迅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席。文学修养很深、经验很丰富的瞿秋白，在转赴中国苏区工作以前，在 1931 年 7 月至 1934 年 1 月期间，按照中央的委托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他协同中国共产党左翼作家联盟党团，在思想意识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了鲁迅。在 1936 年春末夏初，我从肖爱梅处得到鲁迅病重的消息，就请求季米特洛夫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我们派了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委托他代表我们邀请鲁迅偕同全家赴苏，并担负起组织这次旅行的责任。潘汉年是能够完成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的。潘汉年为他们启程赴苏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遗憾得很，鲁迅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作这样的长途旅行。1936 年 10 月 25 日，我因鲁迅逝世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救国时报》①上发表了《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一文。1939 年 10 月 19 日，在重庆各界代表大会上，我代表中共中央就鲁迅逝世三周年发表了讲话。①上述文章和讲话对鲁迅的活动和他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号召文艺活动家和青年向鲁迅学习，学习他著作中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抗日救国事业多作贡献。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的态度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毫无共同之处。对我们来说，鲁迅是革命斗争的战友，他的著作不仅是珍贵的文学遗产，而且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文学武器。可是，毛泽东却利用鲁迅的名义和他的著作来掩盖自己的反革命勾当。毛泽东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而“神化”鲁迅，把鲁迅变为无知的一代的偶像；毛泽东又“神化”鲁迅的著作，极力把它们形容成用来呆读死记的教条。毛泽东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任意滥用、歪曲和伪造鲁迅的说法和意见，并且使任何人都不敢对此有所怀疑。

正因为如此，全面了解鲁迅成了今日中国的迫切需要。必须粉碎毛泽东的卑鄙阴谋，他企图通过自私自利地“神化”鲁迅及其著作，使之为自己的反动目的服务。必须做到每当毛泽东为了掩盖和粉饰自己的反动面目而求诸鲁迅的名义时，人们就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伪，认清毛泽东在哪些地方滥用鲁迅名义，对他的作品进行歪曲与伪造。

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再一次说明，毛泽东是一贯地从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实用主义出发的。

第四节 “批林批孔”和“孤家寡人”的命运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毛泽东为了自我赞扬而吹捧秦始皇，为了替镇压手段作辩护而攻击孔子，为了自己的反动目的而滥用鲁迅的名义。这些活动，不仅是当前残酷进行着的“批林整风”

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预定要大规模实行的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准备步骤。大家知道，“文化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这一论点，专门写进了毛的十大所通过的《党章》。而代表大会关于这一《党章》的报告宣布说，每七、八年进行一次“文化革命”，这是“毛泽东揭示的必然规律”。无论《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无论毛的“三报一刊”①共同发表的元旦社论，都叫嚷：“天下大乱！”

“山雨欲来风满楼。”

目前狂风暴雨已经开始在北京、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里肆虐。

1974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写道：“《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红小兵黄帅的信、日记摘抄和编者按后，引起了北京市中小学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加速了……深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程，推动了教育革命的发展。”

人人都清楚，所谓红小兵黄帅批判教师对她的恶劣态度的信和日记摘抄，不过是一场序幕，它所要起的作用就是充当挑起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场斗争的导火线。报纸还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考试制度”等“流毒”。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随后得出以下的结论：“黄帅提的问题，不仅仅是哪个人，哪个学校的问题，也不是师生关系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反修防修的问题。”

《人民日报》这一报道，一下子就令人回忆起毛泽东在开展第一次“文化革命”时所使用的阴谋诡计，这些阴谋诡计与当前的鬼蜮伎俩至多只有细节上的差别。因而，自然可以预料到，毛泽东很快就会把类似的做法从中小学搬到大学的讲堂，然后，再从教育部门搬到党政军机关，作为加紧进行“批林整风运动”、开展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借口。

真的，不出所料，1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出现了南京大学学生，老军事干部的儿子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和编者按。这一事件本身证明了以下事实，即“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反修防修的斗争”等运动，不仅扩展到了高等教育部门，而且扩展到了党政军及其他各部门。所有这一切使人深信，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风暴很快就要到来。

近来，中国报刊在反苏宣传中加紧造谣诬蔑，与此同时，毛泽东采取了这样一些公开的挑拨

性的反苏行动，如北京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逮捕和污辱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员及其家属。

命令来自“上面”，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果然不出所料，1974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从文章的不容反驳的、粗暴的姿态来看，这篇文章是由毛泽东本人撰写的，或是由他本人审阅过的。其实，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公开宣布在“批林批孔”口号下开始进行第二次“文化革命”。这也是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再一次宣战。

这篇反动文章一开头就宣扬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然后大骂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为了“证明”林彪和孔子之间的联系，他们又搬出了孔子的“克己复礼”这句话，作为“论据”，用以‘证实”孔子企图“复辟奴隶制”，而林彪则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利用这一名言来指责林彪希望“复辟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诽谤。毛派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内容证明，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实际主张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拉向后退”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往下，毛泽东在文章中举出七点以“证明”林彪是“孔子的信徒”。如果毛泽东拿定主意要同时批判林彪和孔子，并且证明林彪的所有言行都是以孔子的言论为根据的，那么只要遵循哪怕是平凡的真理，更不必说科学的态度，他就应当一方面把孔子的言论逐点提出，准确指明出处；同时，逐点举出证据确凿的林彪的言行，以便可以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比较，并且作出适当的结论。

但是，在毛泽东举出的七点“证据”中，只有一句话是孔子曾经说过的，而且这句话的意思还被毛泽东歪曲了。这一点下面再谈。在其他六点中的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不是孔子的言论。

所以，毛泽东不是下决心在援引孔子的话时准确地指明，孔子是在何处并且是怎样谈到某某事情的，而是企图以“孔孟宣扬说”、“孔孟鼓吹说”和“孔孟的信徒”如何如何之类的马马虎虎的“引证”，来使人产生误解。

试问：既然孟子生于孔子死后一百零七年，他又怎么能和孔子一起“宣扬”、“鼓吹”什么东西呢？至于“孔孟的信徒”，那么，在中国近二千五百年内，他们的人数是不可计量的，毛泽东指的究竟是其中哪一个呢？而且无论这指的是谁，难道他能代表孔子本人吗？

从科学态度的起码要求——客观性和具体性出发，在引证孔子的话时，只能援引孔子本人所

说的话。无论孟子的话，无论任何其他孔子信徒的话，都不应当冒充为孔子本人的话。大家知道，孔子死后，甚至在他的七十多个优秀的弟子中，也形成了几派。对于孔子的许多言论、他们各派都有自己的解释。所以孔子是孔子，孟子是孟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把后者的话硬加在前者身上。还应当指出，在上述七点“证明”中，真正的孟子的言论总共只有一句半话。就连毛泽东对这一句半话所作的解释，也完全是牵强附会的。

毛泽东在七点中的每一点的第一部分，都捏造了孔子的言论，并且给以自己的任意的解释；然后，又在第二部分捏造了林彪的言论，并且也任意作出解释。一目了然，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捏造，都是为毛泽东所策划的“批林批孔”服务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他有关林彪言论的某些伪造中，无意中指出，林彪在这些问题上是反对他的意见的。

现在，我们开始对毛泽东捏造的各点中的每一点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点。毛泽东断言：孔孟鼓吹“生而知之”。关于这个命题，《论语》有不同的记述。可是，孔子在谈到他本人时，恰恰说过相反的话。在《论语》卷八，《述而》第七中清楚地写道：“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毛泽东又断言：“孔孟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孔子从来都没有说过任何这类的话。而且，这里引用的不是孟子的一整句话。在这些话的前面，孟子还说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而在这些话的后面，他说：“吾何为不豫 285 第四编“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哉？”促使孟子说出这些话的原因是这样的：孟子离开了拒绝任用他的齐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名叫充虞的人。充虞问他为什么这样忧愁。上面引用的孟子回答充虞的那句话，本身含有一种自我安慰和自以为是，其中并不存在他当真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平治天下”的意思，更不必说去夺取国家权力了。可是，毛泽东利用被他偷换了的孔子的话和被他歪曲了的孟子的话来指责林彪，仿佛他信奉什么“天才论”，并以“至贵”等自居。不但如此，毛泽东又把被他偷换了的这句话说成是林彪的“反党的理论纲领”，甚至是“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的证明。这真是在恬不知耻地胡言乱语！事实证明，自命为“天才”、“伟人”、“特殊人物”、“超人”的，炮制“反党的理论纲领”，准备“阴谋篡党夺权”和“实行独裁统治”的，并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本人。

第二点。毛泽东引用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话，是孔子说过的。然而，毛泽东虽说是引用了它，可是，至于它的意思，毛泽东或者是丝毫也不懂得，或者是蓄意加以曲解。按照孔安国对《论语》《阳货)篇的注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解释的：“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疆贤。”孔子说这句话是为了说明他不愿见阳货大夫①的原因。因此，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阳货不能迫使“上智”的孔子同他一起去为非作歹；而孔子也不能使阳货这样的“下愚”的人，在他人的影响下成为高尚的人。孔安国的注释的意思是正确的，因为他把孔子的这句话与开始叙述这段历史的话——“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②的意思，结合在一

起了。

但是，毛泽东把孔子的这句话解释为某种“‘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说什么这句话含有鄙视劳动人民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书房里的大量线装古书①，这只是用来自吹自擂，伪装“学问渊博”，蒙骗工农兵和青年们的。实际上，连这些古书中的第一本——《论语》，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或者没有认真把它搞清楚。

第三点。毛泽东断言：“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这都是一个个道德范畴，而不是孔子的具体言论。但是，毛泽东利用这些话来“证明”，林彪“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毛泽东就承认了(不过是无意识的)，林彪反对毛泽东在反革命的“文化革命”中的残酷暴力，反对毛泽东对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军事恐怖的个人独裁。

第四点。毛泽东断言：“孔孟鼓吹‘中庸之道’。”大家知道，《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个部分。只是在宋代，为了同佛教和老子的学说作斗争，程颢和程颐才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并把它叫做“孔氏之遗书”；更晚些时，朱熹才从《礼记》中抽出《中庸》篇，把它同《论语》、《孟子》和《大学》合在一起，编为《四书》。只是在这以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儒家的“中庸之道”。

孔孟本人从来都没有宣扬过什么“中庸之道”。

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证明，是以孔子的下面一句话为根据的，这句话就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②可是，这些话不是号召人们遵循“中庸之道”，相反，是证实人们早已很少按照“中庸”行事，或者根本就把它丢掉了。毛泽东认为， “中庸之道”是什么林彪攻击他“反修斗争”、“做绝了”的原因。

在这里，他无意中承认了，看来林彪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同意毛泽东的露骨地亲帝的和狂妄地反苏的反动对外政策。

第五点。毛泽东断言：“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

孔孟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哲学观念。为了“证明”林彪信奉这种“哲学”，毛泽东捏造了一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林彪仿佛从通俗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借用了两句诗：“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这样，毛泽东无论如何是承认了，连林彪这样接近他的人，在他身边也感到“伴君如伴虎”，所以不得不靠自己的“随机应变”，想方设法应付他，否则，任何时候都会被这头凶猛的老虎吃掉。那么，其他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第六点。毛泽东断言：“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是孟子说的，而不是孔子说的。

毛泽东企图从这句话中寻找原因，说明林彪为什么攻击“五七干校”是“变相集中营”、攻击“干部下放劳动”是“变相失业”、攻击“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却无意中承认了以下事实，即毛泽东迫害干部、排斥知识青年，激起了公愤，对于毛泽东的这些罪行，林彪是反对的。

第七点。毛泽东断言：“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与孔子本人更不相干。“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发生于汉武帝时代。在这里，孔子竟因“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而受到指控，这真是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次为了“批林批孔”而进行的这些伪造，与他在三年前捏造出来的所谓《571 工程纪要》相比，特点是更加愚蠢拙劣、更加文理不通、更加厚颜无耻。

毛泽东这个造谣诽谤的老专家，真是弄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显然，毛泽东所批判的“孔子”，是毛泽东本人虚构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孔子。毛泽东所批判的“林彪，，也是伪造的、而不是真正的林彪。因此，毛泽东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是意味着要同他本人伪造出来的“林彪”和“孔子”斗争到底；难道这不是滑稽可笑、恬不知耻吗！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没有起码的尊重、正义和礼貌，这不仅是为了把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真正的政治斗争的内容掩盖起来，而且是为了利用“儒家”和“林彪的拥护者”这种帽子，以便在第二次“文化革命”

期间去迫害人。首先，在第二次“文化革命”进程中，毛泽东打算迫害那些妨碍他实行十大的极其反动的内外政策的人，也就是所有在他看来妨碍他延长自己的反动统治，妨碍他把自己的“王位”传给江青并建立“家天下”，妨碍他加紧准备反苏战争并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妨碍他与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结成同盟的那些人。在帝国主义者和叛徒毛泽东看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拥护者，反帝分子，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革命者，参加革命战争的人，一切善于辨别敌友的、具有知识和革命觉悟的人，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都是他们的死敌，都应算入“必须镇压”和必须惩办之列。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编辑部文章中把他挑起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描绘成了“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描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然后公开威胁所有的领导者：“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同时，他要求：“各级领导都要站

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最后，他严格命令：“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

毛泽东向“每一个领导者”，“各级领导”，“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经受“考验”和“改造”，“站在斗争的前列”并“进行自我教育”。所有经历过“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的人都知道，“考验”、“站在斗争的前列”、“改造”和“自我教育”这些词，从毛泽东的嘴里说出来，就等于宣布他们大家都应受到指责、迫害、逮捕、毒打、拷问、流放和杀害。所以，这些名词的涵义就是命令千百万共产党员、革命劳动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准备去忍受无穷无尽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痛苦，准备去流“痛苦的眼泪和鲜血”，而许多人还要准备丧失生命。

毛泽东在编辑部文章中说：“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他们“批林批孔最内行”。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因为他很清楚：绝大多数工农兵弄不清孔子及其学说是什么。因此，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行事的个别的工农兵，只能辱骂毛泽东所捏造出来的那样的“孔子”，同时又辱骂毛泽东所捏造出来的那个“林彪”。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毛泽东的手技表演：他用一只手“造出”一个假“林彪”和一个假“孔子”，而用另一只手指使人们去辱骂他们。

根据各种消息判断，近些年来毛泽东特别注意训练和装备“民兵”。目前，按照毛泽东的命令，“民兵”由军队系统管理转归毛派的“党委会”和“革委会”领导。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及其他城市，“民兵”已开始执行警察的职务。据报道，毛泽东打算利用“民兵”作为第二次“文化革命胜中的突击队员，指使他们去反对党的、武装力量的、行政机关的、群众组织的和学校的于部，并且把他们逐渐变为正规军，用以代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革命传统很深的那些部队。

据报道，在上海，所谓的“民兵”已经在出大字报，举行街头集会。北京的报纸发表了痛斥“阶级敌人”的大字报照片。在北京及其他许多城市中，正在举行所谓的“批林批孔”大会。‘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指使他为第二次“文化革命”准备好的突击队上街去兴风作浪了。

毛泽东把所有这些反革命行动统统叫做”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表现，叫做“迎着大风大浪前进”。在毛的十大文件中，也有“敢于反潮流”的号召。毛泽东和毛的十大所号召的究竟是反什么样的潮流呢？这就是无比巨大的革命潮流，它发自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员和几亿中国人民的内心，反对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统治和反革命的“文化革命”。

这一巨流奔腾前进，浪峰上涌现出十个“拥护”和十个“反对":

拥护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

拥护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反对毛泽东的假中国共产党和假共青团；

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反对毛泽东的个人的反动的军事恐怖专政；

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毛泽东的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

拥护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反对毛泽东使人民永远贫困落后；

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成为捍卫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军队，反对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反共反苏和反人民的反革命力量；

拥护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共处和繁荣昌盛，反对毛泽东推行的大汉族主义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

拥护与苏联及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对毛泽东与帝国主义势力结成同盟；

拥护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的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反对毛泽东与帝国主义者在“第三世界”共同称霸；

拥护世界和平，反对毛泽东准备和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在这个反毛的革命洪流面前感到恐惧。他企图威胁利诱一部分人同他一起反对这一潮流，借助于反革命的“文化革命”来阻挡这一潮流。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清楚地觉悟到，必须完全彻底地战胜这股掀起狂风恶浪，带来无数灾难的逆流，只有到那时候，中国才能得救。

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必须手拉手、肩并肩地团结一致，英勇果敢、万众一心地反抗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和反革命的“文化革命”。不

要怕狂风恶浪，要勇往直前，直至完全战胜这股逆流，使它再也不能给任何人造成危害。只有到那时候，美好的社会主义之花才能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大地上生长、开放，它将结出丰硕的社会主义之果。

只有到那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才能过上值得人去过的自由幸福的生活。

只有到那时候，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真正成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英勇的革命军队。

只有到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才能和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一起，和各国共产党及各国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斗争，争取全世界的和平、自由与幸福。

毛泽东和在他背后挥舞指挥棒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今都认为不断进行反革命的“文化革命”是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主要手段。但是，时间将会表明，正是不断进行“文化革命”，才引起武装力量的不满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最终将导致毛家王朝的覆灭。毛泽东恰恰是由于进行反革命的“文化革命”，才陷入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孤僧”的绝境。无论他怎样费尽心机使用吹捧秦始皇、攻击孔子和滥用鲁迅名义这样一些骗术，无论他采取什么手段，无论他多么紧密地同帝国主义集团勾结起来，向他们阿阿谀逢迎，指望得到援助和支持，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防止快要到来的垮台。

由于进行“文化革命”的结果，毛泽东陷人了无法解决的内外矛盾之中。十大的反动的内外政策，又使已有的矛盾更加尖锐。任何人都不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必将战胜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将战胜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必将战胜毛泽东的反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将战胜毛泽东个人的反动的军事恐怖专政，恢复被毛泽东集团所破坏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并争取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

纵容国内的反动派，挑拨外部世界的战争，这就是毛泽东的当前政策的典型特征。可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时难道不也就是沿着这样的道路走向他们的失败吗？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结成同盟，对内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对外政策中的反苏主义，这就是今日毛泽东的政策的中心内容。可是，蒋介石难道不也就是通过这样的道路走向了他的失败吗？把自己比作太阳，这一蒙昧无知的做法，被毛泽东用来自欺欺人已有多年了；可是，这也是早在古代就被夏桀王走过来的一条通往失败的道路。

据伏胜(汉朝)《尚书大传》一书所载，夏代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桀，曾把自己比作太阳，他断言：“日亡，吾乃亡矣。”他企图以这些话欺骗和恐吓人民，使人民害怕他死去，祝愿他长生不老。但是，人民痛恨这个独裁者和暴君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对他的说法回答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由此可见，把自己比作太阳并不能使暴君免于灭亡。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和全体中国人民心目中，叛徒和暴君毛泽东就像夏桀王一样，也是冒名的太阳，人们对他也是无比痛恨的。

毛泽东知道，他正坐在一个即将喷出火红熔岩的火山口上，孤独无助的感觉久已伴随着他。因此，他早在 1970 年 12 月就曾经对他的可靠的美国朋友斯诺说过，他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孤僧”，这不过是毛泽东为他自己作的形象化的表述，它是“孤家寡人”的同义语。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暴君曾经被人民称作“孤家寡人”，那便是商纣王和秦始皇。

现代中国也有两个最著名的暴君和军阀曾经被人民“授予”“孤家寡人”的称号，那便是袁世凯和蒋介石。所有被人民称作“孤家寡人”的人，通常都没有好下场，在民间也已经被认为是“孤家寡人”的新暴君、新军阀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最后必然会遭到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这决不是说，毛泽东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相反，他越是接近于自己的死亡，就越是不顾一切地急于作最后的挣扎，就越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来寻求任何有利的条件，以便在对内政策上最大限度地延长自己的反动统治，并把“王位”传给江青；而在对外政策上则加紧准备反苏战争，挑动世界大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只是要把中国变为反共、反苏，反对和平进步事业的反动据点，不只是要使中国逐渐返回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的状况，而且要取得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和援助作为交换。他以进行第一次“文化革命”来争得帝国主义者的信任，为毛帝合作创造条件；而以第二次“文化革命”来扩大毛帝合作的范围并提高毛帝合作的“水平”。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的烟幕的掩护下，实际上宣布了并开始进行了第二次“文化革命”，这正是他的这些阴谋的具体表现。

大家都明白，从 1966 年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开始实行反革命政变时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和困苦；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遭受了严重的危害，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国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却受益不浅！

毫无疑问，毛泽东将以发动第二次“文化革命”使国家遭受新的严重灾难，并在国际舞台上造成新的巨大损失。

可见，毛泽东的第二次“文化革命”，不仅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事件，也不仅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事件，而是关系到整个进步的和爱好和平

的人类的事件。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面临着一场严重、艰巨和复杂的斗争。他们在确定自己的反毛斗争和反对“文化革命”的斗争的计划和行动时，无疑将会以当前国内及国际形势的特点为出发点。他们无疑将会认真地总结反对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斗争，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他们无疑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条件，来团结全国一切反毛和反对“文化革命”的力量。只要一切反毛和反对“文化革命”的力量能够团结起来并且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够给毛泽东的反革命的“文化革命”和他的反革命统治以决定性的、强有力的打击，使他遭到彻底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相信：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及拥护全世界和平事业的战士，一切善良人士，都必将站在他们这一边。

跋

中国有句俗话：人生七十古来稀。王明同志活到了七十岁，他总算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写完了，这是很不简单的事！虽然王明同志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的问世仍是一个重大事件、在这里特别要向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的友谊和支持。

当然，在一本书里要把从三十年代到目前为止的事件进程，多少叙述得详细一点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叙述中国共产党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了。

王明同志写完这本书后，准备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哲学方面的理论错误的书。这种想法的产生，是由于近三十多年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苏和反共的罪恶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文化革命”、实质上是反革命政变时期，，毛泽东及其集团公开宣布说他们的意图是要让“毛泽东思想红旗在世界上空飘扬”。同时，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他不得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来掩盖其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必预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办法来说明，毛泽东怎样歪曲、污蔑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怎样打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幌子，在意识形态方面贩运私货——用反革命的毛泽东主义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近几年，王明同志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是，遗撼的是，由于在四十和五十年代他的健康曾受到摧残，他未能完成下一段计划要做的事就和我们永别了。

王明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十分重大的损失。可是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和人民的支持，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使中国返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孟庆树 1974 年 7 月 7 日